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碩士班

## 碩士論文

新冠疫情下的中國「疫情外交」與國家形象  
——建構主義之視角

China's Coronavirus Diplomacy and National Imag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Theory

指導教授：李明 博士

研究生：解子一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 致謝

產出這篇論文我要感謝的人有許多。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李明老師，是第一次上了老師的“公共外交”使得我對於外交的意義了解的更透徹，也是老師教授我們要時刻自省，才讓我堅定的想選擇這個題目進行論文的撰寫。所以非常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對我的悉心指點，改正以及建議，才讓我可以產出這篇論文。

同時要感謝我的口試委員蔡文軒教授、盧業中教授以及倪炎元教授給予我的修改建議，讓我的論文更完整及嚴謹。尤記得倪炎元教授在去年 2 月時，身處病榻之中還專程前來擔任我的論文大綱口試委員，讓學生感動不已；雖然老師已故，但您的諄諄教誨永遠在學生永心中。同時感謝政大傳播所馮建三教授、韓義興教授的幫助及建議。

此外還要十分感謝我在政大外交系遇到的每個人，感謝湘綦助教一直以來的幫助，感謝外交系的所有師長。我要由衷感謝我在外交系的同窗，感謝我的所有好友們，你們不僅是我的同學、朋友更是家人。沒有你們就沒有這篇論文的產生，是你們隨時的建議、一次次匯報前的聆聽、背後的支持讓我可以完成這篇論文。我真的十分幸運能夠進入政大外交系，結識你們。我的好友程宥秦雖然前段時間離開了我們，讓我十分痛心，但你的正直，對學術的嚴謹，你的美好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的，我會永遠思念你，我的好兄弟。

現在是 2022 年，新冠疫情已經來到了第三年。我現在身處法國，每天新增 30 萬確診的人數似乎已經讓世界麻木，我們嘗試和病毒共處。但是每個數字背後都是鮮活的生命，每個數字對於國家的經濟、形象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希望大家好好保重，疫情早日結束。

## 摘要

2020年1月，中國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擊，在西方媒體負面輿論壓力下，全國投入抗「疫」之中。3月中國疫情得到控制，然而疫情卻蔓延至世界多個國家，開展疫情狙擊成為全球性「衛生行動」。

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形象」並非僅是國家實力的「鏡像」反饋，是通過國家間互動進行影響以及建構的。「國家形象」塑造則分為「自我建構」以及「他者建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通過「自我建構」、「外交」以及「國際傳播」，努力塑造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自我形象」建構方面，中國通過官方信息發佈、對外主流媒體宣傳、社群媒體、自媒體以及西方主流媒體的逆向「二次傳播」達到自我宣傳；「疫情外交」則通過開展「雙邊」及「多邊」的外交活動。「雙邊外交」包括向他國提供醫療物資援助、派遣救援隊；展開電話首腦會議、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多邊外交」包括參加多邊會議，醫生學者開展國際疫情經驗分享。

通過「國際傳播」以及「疫情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提升在媒體層次、國家互動層次以及民意調查層次確實都取得一定成效：表現為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態度有所改變；與中在疫情期間互動頻繁國家政府對中支持率較高；對中國的現在經濟能力以及國家影響力得到公民肯定。但因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國家利益考量，使得「疫情外交」成效不大，在後疫情時代，中國未來還需要長期的外交活動。

關鍵詞：疫情外交 國家形象 新冠疫情 國際傳播 命運共同體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3
第三節、研究重要性及創新性.....	4
一·研究重要性.....	4
二·研究創新型.....	5
第四節、研究途徑.....	6
一·建構主義理論.....	6
二·國際傳播理論.....	6
第五節、研究方法.....	6
第六節、文獻探討.....	7
第七節、研究範圍.....	17
第二章 疫情外交與外交轉型.....	19
第一節、傳統外交轉型.....	19
第二節、疫情推動全球衛生外交發展.....	20
一·衛生外交先行者：英國.....	22
二·衛生外交領軍者：美國.....	23
三·中國衛生外交現況.....	25
第三節、疫情外交：全球衛生外交中的重要一環.....	27
一·疫情外交的發展.....	27
二·「疫情外交」特點.....	28
三·「疫情外交」的重要性.....	28
四·中國：疫情外交現況.....	30
第四節、小結.....	31
第三章 建構主義與國家形象.....	32
第一節、建構主義核心與理論框架.....	32
一·建構主義概述.....	32
第二節、「國家形象」.....	36

一· 國家形象之意涵 .....	36
二· 提升「國家形象」的重要性 .....	38
<b>第三節、「國家形象」的建構過程 .....</b>	<b>39</b>
一· 自我建構 .....	41
二· 他者建構 .....	42
<b>第四節、國家形象建構特點 .....</b>	<b>44</b>
<b>第四章 國家形象建構方式：國際傳播 .....</b>	<b>45</b>
<b>第一節、建構主義載體：國際傳播 .....</b>	<b>45</b>
<b>第二節、 國家形象的自我建構與宣傳 .....</b>	<b>47</b>
<b>第三節、 他者建構與國家形象認同 .....</b>	<b>52</b>
<b>第四節、小結 .....</b>	<b>53</b>
<b>第五章 新冠疫情下中國形象塑造：自我建構 .....</b>	<b>55</b>
<b>第一節、外交目標：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 .....</b>	<b>55</b>
<b>第二節、對外政策：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b>	<b>57</b>
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核心 .....	57
二· 新冠疫情是「命運共同體」理念推行的機遇 .....	58
三· 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	59
四· 「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新冠疫情成效 .....	60
<b>第三節、外交形象建構：為中國抗疫主動發聲 .....</b>	<b>61</b>
一· 官方第一時間發佈信息 .....	61
二· 多角度多平台 講好中國故事 .....	63
三· 對負面輿論正面回擊 .....	66
四· 利用社群媒體——推特 .....	68
五· 自媒體個人力量凸顯 .....	74
<b>第四節、小結 .....</b>	<b>75</b>
<b>第六章 疫情外交階段：他者建構 .....</b>	<b>77</b>
<b>第一節、雙邊互動：首腦電話會議 .....</b>	<b>77</b>
一· 與多國進行通話 .....	77
二· 法德俄三國與中通話最多 .....	78

三· 通話內容多樣 .....	79
<b>第二節、雙邊互動：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 .....</b>	<b>80</b>
一· 疫情初期及時報告 .....	80
二· 積極協助世衛組織開展工作 .....	81
三· 中國獲得世衛組織讚賞 .....	81
<b>第三節、雙邊互動：對外援助 .....</b>	<b>82</b>
一· 派出醫療救援隊 .....	82
二· 向多國捐贈物資 .....	83
<b>第四節、多邊合作：國際交流 合作抗疫 .....</b>	<b>84</b>
一· 地區性多邊組織合作 .....	85
二· 中國在多邊會議上積極發聲 .....	86
三· 專家學者展開多邊外交 .....	86
<b>第五節、小結 .....</b>	<b>87</b>
<b>第七章 國家形象建構成效 .....</b>	<b>89</b>
<b>第一節、媒介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建構 .....</b>	<b>89</b>
一· 西方主流媒體中的中國國家形象 .....	89
二· 非洲主流媒體 .....	94
三· 西方媒體態度轉變：封城問題 .....	95
<b>第二節、其他國家和地區視角 .....</b>	<b>96</b>
一· 官方政府對中國態度 .....	96
二· 中日關係出現破冰 .....	98
三· 歐洲態度不同 .....	99
<b>第三節、疫情後的國家形象民意調查 .....</b>	<b>101</b>
一· 2021 最佳國家調查（Best country） .....	101
二· 皮尤民調 .....	104
<b>第八章 結論 .....</b>	<b>109</b>
<b>參考文獻 .....</b>	<b>113</b>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國家間互賴加深，「國家形象」（National Image）塑造成為重要議題。在國際體系中，「國家形象」不僅決定國家行為，也影響國家間互動方式。在國際社會中，國家力求在各領域樹立較正面的形象。各國不僅在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爭奪話語權，屬於「低階政治」的衛生領域越來越重要。二十世紀 60 年代起，以歐美國家為首的「發達國家」逐漸加大在衛生領域的投入以及將「衛生外交」（Health Diplomacy）納入國家的戰略目標中。

作為衛生領域「領頭羊」的美國一直注重「衛生外交」；從美國總統柯林頓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小布希 (George Walker Bush)、歐巴馬 (Barack Obama) 甚至川普 (Donald John Trump) 都注重衛生方面的投入，歐巴馬還將「衛生外交」作為樹立國家形象的主要手段；美國與其他國家在衛生方面的持續互動，使其在該領域國家形象較好，被認為是衛生領域領導者，<sup>1</sup>同時佔據更多話語權；小布希因提出「總統瘧疾倡議」，在非洲被親切稱為「全球衛生總統」。<sup>2</sup>

中國，作為另一較有影響力大國卻一直面臨在衛生領域「國家形象」不佳的困境。國內對於衛生方面投入較少；國際上雖長期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衛生援助，但援助形式較為單一，並受到西方傳統援助國競爭，使得其「援助外交」效果逐漸減退；<sup>3</sup>2003 年「非典型肺炎」（非典，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在中國爆發，國內早期隱瞞非典疫情，防控不利，拒絕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縮寫為 WHO）合作，使得其「非典」時期的「疫情外交」失敗，對「國家形象」造成十分劇烈的影響。非典後中國意識到「衛生外交」重要性，開始以更加積極的態度與世衛組織合作，並努力開展對外衛生援助。但中

---

<sup>1</sup> Erlanger, Steven. "Another Virus Victim: The U.S. as a Global Leader in a Time of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0/world/europe/trump-leadership-coronavirus-united-states.html> (March 20, 2020)

<sup>2</sup> 晉繼勇，〈美國全球衛生安全戰略及其對世界衛生安全體系的挑戰〉，《國際安全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2020 年 6 月），頁 93。

<sup>3</sup>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29-31。

國一直未走出非典的外交失敗的陰影，國際上對其衛生治理能力存在質疑。中國極需機會重塑「國家形象」，並在全球衛生領域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2020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使「全球衛生外交」再次被拉上國際外交的舞台。1月9日，中國出現首起「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同日，WHO也收到新型冠狀病毒基因序列信息。<sup>4</sup>1月23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開始封城，中國其他重要城市也陸續限制出行，防止病毒的跨省份傳播；2月29日WHO將疫情全球風險級別由「高」上調至「非常高」；3月疫情波及到全球其他國家及地區，首當其衝的是歐洲義大利，隨後3月13日，123個國家報告「新冠疫情」，3月26日美國確診人數首次超越中國。4月中國疫情得到控制，<sup>5</sup>4月7日，武漢市「解封」，而英國「新冠肺炎」死亡案例卻再創新高，美國成為首個確診病例超100萬例的國家；6月27日，全球確診人數達1000萬人；7月中旬，美國、巴西、印度等國家確診人數持續走高，8月底歐洲疫情開始抬頭；9月聯合國大會宣佈《應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決議》，10月15日，美國確診人數超過800萬人，義大利、德國超100萬人；法國超200萬人，全球達4000萬人。<sup>6</sup>

「新冠疫情」一時間成為全球需共同面對的問題，如英、美、中等大國在對抗疫情上受到世界關注。作為衛生領域較有話語權的美國在抗擊疫情方面表現不力，不僅死亡人數不斷攀升，疫情爆發初期，也未對外進行援助，甚至在4月宣佈暫停向世衛組織繳納會費，5月宣佈美國退出WHO；美國智庫學者擔憂地表示：「美國種種作法會對國家形象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研究員克勞婭·梅傑（Claudia Major）表示：「從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看出，美國政治領導力已經出現結構性變化，美國已經無意願和能力去發揮領導作用。<sup>7</sup>」

<sup>4</sup> 「世界衛生組織應對疫情時間線」，世界衛生組織，

[〈https://www.who.int/zh/news/item/29-06-2020-covidtimeline〉](https://www.who.int/zh/news/item/29-06-2020-covidtimeline)（2020年9月9日）。

<sup>5</sup>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81801/1681801.htm〉](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81801/1681801.htm)（2020年6月7日）。

<sup>6</sup> Cumulative Cases By Days Since 50th Confirmed Ca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Medecin,

[〈https://coronavirus.jhu.edu/data/cumulative-cases〉](https://coronavirus.jhu.edu/data/cumulative-cases)

<sup>7</sup> Steven Erlanger, “Another Virus Victim: The U.S. as a Global Leader in a Time of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0/world/europe/trump-leadership-coronavirus-united-state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0/world/europe/trump-leadership-coronavirus-united-states.html)



而對於中國，此次抗疫似乎成為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以及影響力的機會。中國對外與世衛組織合作，並積極開展帶有中國特色的「疫情外交」，多邊互動：同時大力宣傳，通過媒體大量外宣「命運共同體理念」，搶佔新聞輿論制高點，掌握國際傳播話語權。<sup>8</sup>可以看出，中國希望在此次應對疫情中通過肩負起更多責任以及向他國提供援助以及自我宣傳相結合從而塑造中國新的「國家形象」。

確實隨著疫情的發展，國外對中的看法有所改變。例如《紐約時報》1月到4月對中國的報導呈現從負面到中立、正面的變化，並讚賞中國抗疫的成功；<sup>9</sup>東亞地區也出現向好態勢，中日韓也呈現多年來少有的合作跡象，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不斷加深，<sup>10</sup>中國國家形象呈現在新冠疫情下提升之態勢。

## 第二節、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在二十一世紀，「衛生外交」作為低階政治越來越受到國家間重視，其被認為是拉近意識形態相差較大國家距離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希望達成的研究目的是，探求中國在對抗新冠疫情過程中，是如何樹立本國正面的形象以及如何展開「疫情外交」與他國互動；並通過國家反饋以及媒體對中國的輿論走向是否發生改變來探究此次中國疫情外交的成效以及「國家形象」是否提升。

本文將分為以下五個部分。首先，說明傳統外交到「衛生外交」轉型過程及「疫情外交」的重要性。其次，說明「建構主義理論框架」與國家形象之意涵及關聯性；再其次，說明國際傳播在「對外宣傳」及「疫情外交」過程中建構國家形象所發揮的作用；第四，說明在此次新冠疫情下中國如何通過「國際傳播」和「疫情外交」進行國家形象的「自我建構」以及影響「他者建構」的具體作為；最後通過幾個重大國際問卷、多國媒體報導態度、後疫情時代國家間的交往互動說明中國國家形象是否有所提升。

<sup>8</sup> 劉朝暉，〈抵制“政治病毒”，全球戰“疫”〉，新民週刊，第8期（2020年）。

<sup>9</sup> Taplin, Nathaniel. “Why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Can’t Get You a Face Mask.” *WSJ*,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he-richest-country-on-earth-cant-get-you-a-face-mask-11585741254?page=1>>(April 1,2020).

<sup>10</sup> 秦亞青，〈合作：命運共同體發展的鐵律〉，《國際問題研究》，第3期（2020年），頁30。

本文將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 (1) 在新冠疫情下，中國如何進行「負責任大國」國家形象自我建構？
- (2) 在新冠疫情下，中國如何通過「疫情外交」實現和他國的互動從而影響「他者建構」？
- (3) 「對外宣傳」及「疫情外交」是否達到「國家形象」建構的預期效果，從而提升中國在此次新冠疫情下的「國家形象」？

### 第三節、研究重要性及創新性

#### 一、研究重要性

如今，傳統「權力政治」受到挑戰，「國家形象」、「國家聲譽」、「國家影響力」受到關注。各國努力塑造正面形象。評斷標準則取決於國際社會所能接受的普世價值，如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等價值；<sup>11</sup>各國通過積極建構並傳播符合普世價值的形象，獲得國際認同，同時提高政治影響力和國際聲譽。<sup>12</sup>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amuel Nye, Jr.）表示：「若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別的國家就更願意追隨；如果一個國家塑造國際規則並使之與本國的利益相一致，那麼他就用不著昂貴的胡蘿蔔和大棒。<sup>13</sup>」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然而「國家形象」塑造卻面臨諸多挑戰，西方國家將中國冠以「強權崛起」、「不顧人權」、「不顧環境發展經濟」等負面國家形象；中國雖一直進行「自我外宣」或「公共外交」，但和西方文化上的差異總使得「自我認同」和他國對中國的「他者認同」存在偏差，在交互作用下，無法建立一個良性的中國形象；所以尋求有效塑造「國家形象」的途徑與手段則是當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領域重點。

<sup>11</sup>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復興崗學報》，第92期（2008年），頁322。

<sup>12</sup> 湯光鴻，〈論國家形象〉，《國際問題研究》，第4期（2004年），頁19-21。

<sup>13</sup> 約瑟夫·奈，〈從「軟實力」到「巧實力」〉，《南風窗》，第13期（2019年），頁14。

相較於「文化外交」，處於共同疫情背景下的國家更容易產生認同；中國「文化外交」以及「公共外交」進展緩慢，是因中西方的文化差距較大，使其無法理解並認同東方文化，也無法形成喜愛；而新冠疫情的發生，各國之間存在「共情」、「共感」、「共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疫情外交」開展過程中也直觀地展現。獲得「共感」則是獲得「認同」的關鍵。所以探究中國如何運用「疫情外交」樹立國家形象，不僅可以檢視中國的外交成效，也可以延伸到各國，給予各國國際互動及建構「國家形象」之啟示。

疫情也使國家關係打破「西方」與「非西方」、傳統「軍事盟友」的界限，對國家外交關係提出新的要求。<sup>14</sup>疫情中的國家良性互動還能穩定發展夥伴關係網，有助於爭取更大層面的支持。<sup>15</sup>由此可知，「疫情外交」中「國家形象」建立有較強可研究性。

## 二· 研究創新型

國際關係中，通常將「國家形象」認為是國家客觀實力的「鏡像」反饋。但其往往並非靜態，而是通過國家間的不同互動，產生不同認同。本文創新點之一是從「建構主義」的視角，動態分析國家形象的「自我建構」與「他者建構」過程，為該議題研究提供不同思路。

第二，目前對「疫情外交」方式研究較多，而對其效果研究較少；已有外交效果分析的相關研究中，理論分析較多，缺乏量化數據。因為「國家形象」提升、下降較難進行直觀評判，所以本研究運用「國際政治傳播」理論，從「新聞報導框架」與「話語態度」角度分析他國媒體如何建構中國，並檢視媒體的報導導向是否隨「疫情外交」的深入出現變化，從而檢視「疫情外交」對國家形象建構的成效。

<sup>14</sup> 周鑫宇，〈中國的“抗疫外交”：成效與啟示〉，頁 31。

<sup>15</sup> 張業亮，〈美國的全球衛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區域為例的國際政治分析〉，《美國研究》，第 4 期（2014 年），頁 24-27。

## 第四節、研究途徑

為了能夠完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一、新冠疫情下中國如何進行「自我建構」；二、中國如何通過「疫情外交」與他國互動，影響「他者建構」；並驗證本研究假設：中國是否通過「疫情外交」建構正面、積極的「國家形象」。

本研究依循「建構主義理論」、「國際傳播理論」架構。並將文獻檢閱成果當作研究途徑的基礎，結合下述研究方法以求更有效、精確的掌握研究內容與重點，並完善論文的全文。

### 一· 建構主義理論

本研究選用較偏向於可實證性驗證的「溫特建構主義理論」來分析新冠疫情下的「國家形象」建構，並將「建構主義理論」細化為「自我建構理論」和「他者建構理論」兩方面。

### 二· 國際傳播理論

根據「國際傳播理論」，「國家形象」的主要塑造渠道是大眾傳媒，它不僅是民眾獲得訊息的渠道，也是一國形象進入國際社會的重要通道；「國際傳播理論」對「國家形象」塑造分為：構建本國形象的「自我塑造」過程；構建他國形象的「他者塑造」過程。<sup>16</sup>依循「國際傳播理論」框架，探求在「疫情外交」過程中，中國如何運用媒體進行「自我外宣」以及在西方主流媒體中，他國如何形塑「中國形象」。

## 第五節、研究方法

### 一· 比較研究法

#### （一）不同時期比較

通過比較「疫情外交」不同階段的外交作法，分析中國在不同時期的外交方式之異同、外交重點以及外交舉措之成效。

---

<sup>16</sup> 劉小燕，〈關於傳媒塑造國家形象的思考〉，《國際新聞界》，第2卷（2002年），頁64。

## （二）「疫情外交」比較

本文比較中國和他國在疫情中的「疫情外交」做法之相同與不同。

## （三）不同「媒介內容」比較

通過比較不同媒介對於中國疫情報導的不同以及同一媒介在疫情不同階段對中國報導是否有所改變，來觀察不同國外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偏向以及中國面對疫情的做法及與他國的外交過程是否起到改變國外媒體態度的效果。

## 二·內容分析法

運用「內容分析法」對新冠疫情下官方文件，互動形式進行分析。可按以下層次進行分析：

- 1.中國對外針對疫情所出台的相關官方政策、發表的官方發言、官方文件簽署等。
- 2.中國與他國以及國際組織的互動形式，主要為雙邊互動形式、多邊互動形式。
- 3.中國與國際進行的非官方外交，如「公共外交」、媒體外宣等。
- 4.«外交效果»分析可通過2020年「皮尤民調」（Pew Research）官方數據；國家間的合作互動方式，文件簽署，分析「國家形象」建構成效。

## 第六節、文獻探討

### 一·衛生外交相關研究

#### （一）衛生外交發展

「全球公共衛生」以及以衛生領域為載體開展「衛生外交」，近年來，在國內外被廣泛研究。學者張清敏在《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中》對於「衛生」及「外交」的發展過程進行回顧，並強調「衛生外交」不同於傳統外交的四個特點。<sup>17</sup>

<sup>17</sup>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36卷第2期（2015年4月），頁11-32。

學者晉繼勇在《淺談公共衛生外交》中指出當前「公共衛生外交」上的不足，國家間存在傳統主權觀，認為各國對國內事務享有絕對的主權，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不得干涉，未將其提升到全球層次考量；國際公共衛生外交中經濟利益的驅動以及傳統安全觀的束縛。

對西方國家「衛生外交」研究中，學者認為英、美國走在「衛生外交」前列，開始時間長、輻射面向廣且效果較好。學者晉繼勇分析美國各時期「衛生外交」發展，發現從柯林頓時期（Bill Clinton）至歐巴馬時期（Barack Obama）均重視「衛生外交」，美國不同階段雖然衛生外交手段不同，然而均達到服務於公共外交領域，提升國家形象的目的。然而他認為川普時期美國則呈現「衛生外交」的「倒退」趨勢。<sup>18</sup>

對中國「衛生外交」研究上，羅艷華、張清敏、王昱、劉培龍等學者對於中國對外援助歷程進行回顧。認為中國「衛生外交」方式主要以針對非洲地區的對外援助為主。經過半個世紀援助，確實轉換為政治支持，但存在的問題也很多。中國對外援助雖然開始時間早，但因為形式單一，且無法與對外援助經驗更豐富的西方國家抗衡，使得中國對外援助效果較差，衛生援助的影響力較小。

其次，衛生援助主體單一，缺乏與國際發展夥伴的互動與合作。長期以來，中國開展的對外衛生援助項目，絕大多數都是以政府作為行為主體，或者由政府安排公立醫療衛生機構、國有企業實施，鮮有其他社會力量參與。<sup>19</sup>第三，中國對外援助需與其他行為體開展國際合作，通過三方合作和多邊渠道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sup>20</sup>第四，中國在2003年非典疫情防治的失敗也使得中國在衛生外交領域的聲望較低，國家形象較差。

---

<sup>18</sup> 晉繼勇，〈美國全球衛生治理的戰略、實質及問題〉，《美國研究》，第1期（2011年），頁91-109。

<sup>19</sup> 王昱、劉培龍，〈中國對外衛生援助的歷程、挑戰和對策〉，《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7年），頁94-106。

<sup>20</sup> 張清敏，〈援助外交〉，《國際論壇》，第9卷第6期（2007年11月），頁17-22。

## （二）「疫情外交」相關研究

學者張業亮在《加強全球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合作機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重點闡述了應對「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迫切性以及具體措施。根據世衛組織的定義，「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合作機制，指的是為防止傳染病擴散或生物恐怖活動對人類的衛生威脅而採取的情報及醫學應對措施所形成的相應機制，從而減少跨越地理區域和國際邊界、危害集體衛生的嚴重公共衛生事件的爆發」。在開展公共衛生方面活動時，國家應以世衛組織為主導，以《國際衛生條例》為指導原則，並且與其他組織和相關機構形成全球衛生安全夥伴關係，加強國家間合作、共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sup>21</sup>

在面對疫情這類「全球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領導者上，學者晉繼勇認為現在的問題在於衛生領域缺乏領導者，國際上有能力的國家或團體未承擔其應該的責任。美國作為佔據霸權地位的國家卻顯示無能力無意願維護衛生體系現況，二十国集团全球治理能力失靈，新興國家未形成領導力，聯合國在全球衛生治理上失語，久而久之會使得國家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所以必須要國家擔當其重任，<sup>22</sup>引領全球的合作。

從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學者們對中國應對疫情的學術文章激增。主要分為幾個方面，梳理中國自疫情以來的外交手段及建議；疫情中的中國對內部以及對外部的「抗疫」傳播報導特點、共情傳播以及中國戰「疫」形象刻畫；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疫情以來的輿論偏向及話語分析。目前學者們的研究有以下特點：針對「疫情外交」研究的實際作法呈現較多，而缺乏理論依據。

## （三）「衛生外交」效果與目的研究

對「衛生外交」的目標的探討，學者們則分為兩派。第一派認為，「全球衛生外交」是國家、政府間組織和非國家行為共同協商，以應對衛生方面挑戰。<sup>23</sup>其中包括一切基於衛生領域的對外經濟及社會發展援助、人道主義救援，與多方開

<sup>21</sup> 張業亮，〈加強全球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合作機制〉，《世界知識》，第4期（2020年），頁68-70。

<sup>22</sup> 晉繼勇，〈全球衛生治理的「金德爾伯格陷阱」與中國的戰略應對〉，《國際展望》，第4期（2020年），頁42-59。

<sup>23</sup> Lee, Kelly, Richard, Smith. "What is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 Conceptual Review."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2011), pp. 3-5.

展衛生交流以及合作、共同參與全球衛生治理。<sup>24</sup>第二派則認為，「衛生外交」的目的並非著重在衛生領域，而是在國家的政策制定和談判中利用衛生概念或機制以達到其他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目標。<sup>25</sup>

對於「衛生外交」效果，不同學者看法不同。美國學者認為「衛生外交」是全球性的衛生投資，目的有推動經濟以及社會層次的進步，通過幫助衛生實力弱的國家，從而維護美國安全；美國智庫學者還表示，「衛生外交」可以降低國內外政治風險，同時穩定和發展夥伴關係網絡。<sup>26</sup>中國羅艷華等學者認為「衛生外交」不僅影響一國的對外關係及「國家形象」塑造，<sup>27</sup>還是推行其外交政策，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總之中西方學者認為，「衛生外交」是增強「國家形象」的手段。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只針對「疫情」開展外交活動對「國家形象」塑造效果不足。許多國家雖向他國提供援助，但因「人道主義援助」是政治性的，所以在此基礎上外交關係不會產生任何新變化，也難扭轉「國家形象」。<sup>28</sup>伊蘭·凱爾曼 (Ilan Kelman) 也認為，在災難發生階段，與災難有關活動有時在短期內可以促成外交，但不能創造外交，也不會影響長期的努力；在疫情或災難結束後，其他因素將迅速取代自然災害，<sup>29</sup>所以若以對抗災難為出發點，還需著手其他領域的合作，才能真正有效促進外交。

## 二·「建構主義」與「國家形象」塑造

### (一) 建構主義

#### 1· 西方研究

「建構主義」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興起，吸收社會學、語言哲學和其他國際關係等理論，並產生不同流派。如較偏向於可實證性驗證的「溫特建構主義」；

<sup>24</sup> 徐彤武，〈全球衛生：國家實力、現實挑戰與中國發展戰略〉，《國際政治研究》，第 3 期（2016 年），頁 15-16。

<sup>25</sup> 晉繼勇，〈淺析公共衛生外交〉，頁 85。

<sup>26</sup> 張業亮，〈美國的全球衛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區域為例的國際政治分析〉，頁 24-27。

<sup>27</sup> 羅艷華，〈試論“全球衛生外交”對中國的影響與挑戰〉，《國際政治研究》，第 2 期（2011），頁 48。

<sup>28</sup> Ilan Kelman, “Pandemic Diplomacy: Peace in our Time?”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s*, Vol. 1(Dec 3,2020), pp.3-4.

<sup>29</sup> Ilan. Kelman, “Catastrophe and Conflict: Disaster Diplomacy and Its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Vol.1, No. 1 (2016), pp. 26-26.



「後現代建構主義」理論，「批判建構主義理論」等；魯傑將建構主義分為「新古典建構主義」和「自然建構主義」以及「後現代建構主義」。<sup>30</sup>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有雙重特性——「物質性」以及「觀念性」；「物質性」及「觀念性」的強弱是不同「建構主義」之間的差異。「激進建構主義」認為國家的「物質性」因素不重要，「國家形象」完全是「社會性」互動結果；而「溫特建構主義」則認為，「國家形象」是以客觀物質性為基礎，再通過互動、建構形成不同樣貌。

「理性主義」認為「國家身份」是既定的，國家利益也就是既定的；而建構主義則認為，國家身份是由互動產生。身份產生後，國家才會確定本國利益，並以此指導國家的行動；所以「國家形象」的不同會導致國家的利益以及基於利益的外交行為不同。<sup>31</sup>所以「國家形象」並非單向建構，而是「自我建構」和「他者建構」共同作用的過程。<sup>32</sup>

## 2· 中國研究

除了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也進行建構主義研究。秦亞青學者的《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中，介紹了建構主義的不同流派。

學者秦亞青認為，世界並非「無政府性狀態」。國家可以將其重構為「非叢林狀態」，或者將其建構為友好的「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不同於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的預測。以中國為例，若依照「現實主義」的「客觀」規律，中國將通過戰爭在區域稱霸，然而若依照「建構主義」預測，將取決於中日、中美以及中國與國際關係的互動，因其是可發揮能動性的過程，所以中國的國際社會的「國家形象」身份定位以及自身「身份建構」過程十分重要。<sup>33</sup>

<sup>30</sup>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2006年），頁2。

<sup>31</sup> 同上，頁7-8。

<sup>32</sup> 秦亞青譯，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34。

<sup>33</sup> 同上，頁22。

## （二）建構主義與國家形象

### 1· 國家形象

學者楊巧燕認為國家形象可分為「國家形象要素論」和「國家形象印象論」。「國家形象要素論」強調國家形象的「客觀」要件，可以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地理組成；「國家形象印象論」則認為其是主觀產生的印象，屬於心理層面範疇，包括自我認知後的形象和他者認知後的國家形象。<sup>34</sup>

學者約瑟夫·奈伊從現實主義觀點提出「國家形象」概念。他認為，「國家形象」是軟實力的一部分，國家能力的提升導致「國家形象」提升。奈伊最早明確地提出並論述了「軟實力」概念：其是相對於軍事和經濟等「硬實力」而言的，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國家形象」以及「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sup>35</sup>和「建構主義理論」相同的是，奈伊也強調「國家形象」對外交的重要性，當一國能夠使其權力在別國看來是合法的，那麼它在實現「自我意志」時就會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那麼別國就會更願意效仿。<sup>36</sup>《文明衝突論》作者哈佛大學教授山繆·菲利普斯·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和奈伊都認為「硬實力」是「軟實力」的基礎，物質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但他們也強調「軟實力」重要性，一些硬實力並非超強的國家，可以因其文化、科技在某些領域獲得較好的國家形象和話語權，較能感召吸引更多的民眾。所以，國家形象與「軟實力」的關係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軟實力」是國家形象的基礎，國家形象是「軟實力」的再現，當一國軟實力提升，其國家形象則會相應提升。<sup>37</sup> 現實主義觀點認為，「國家形象」是客觀的，是國家實力的反映，有些學者將其稱為「鏡像」反饋。<sup>38</sup>

湯光鴻、楊巧燕等學者也認為，「國家形象」之基礎是主權國家的綜合國力、而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特征都是可以塑造的。「國家形象」是由外部的

<sup>34</sup> 楊巧燕，〈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以《紐約時報》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5期（2020），頁31-32。

<sup>35</sup> 鄭志國、何向東、楊德、唐建文譯，約瑟夫·奈伊（Joseph Samuel Nye, Jr.），《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麼美國不能獨斷專行》（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頁5。

<sup>36</sup>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32-33.

<sup>37</sup> 謝曉娟，〈論軟權力中的國家形象及其塑造〉，《理論前沿》，第19卷（2004年），頁19-21。

<sup>38</sup> 楊巧燕，〈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以《紐約時報》為例〉，頁34。

判斷和評價形成、不同行為體的標準不同其評價也不同，<sup>39</sup>會出現不同國家民眾對於同一國評價不一，觀感不同，在其心中產生國家的積極形象或消極形象。<sup>40</sup>劉小燕認為「國家形象是指國家的客觀狀態在公眾輿論中的投影，也就是社會公眾對國家的印象、看法、態度、評價的綜合反映，是公眾對國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總和。「國家形象」指國際社會對一國的評價。它是對國家政體、外交、文化、領袖、官員、人民等諸方面的綜合形象。同時她強調了公共信息傳播和外交政策實踐在國家形象建構上的重要作用。<sup>41</sup>李壽源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主權國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狀相貌及國際環境中的輿論反映，是國際社會公眾對一國相對穩定的總體評價。<sup>42</sup>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學者雖然對於國家形象的定義有所差距，但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認為國家形象並非是靜態的國家客觀實力的展現，而是經過國家雙方甚至多方的互動，同時借助官方或者非官方媒體力量的宣傳，歷經多維評價呈現出的結果。

而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者持相反的意見，認為「國家形象」並非靜態，而是需要動態評估的。學者秦亞青認為，身份不是既定不變的；<sup>43</sup>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有雙重特性——「物質性」以及「觀念性」；溫特也對「激進建構主義」認為的「社會類別」是完全人為建構，不具客觀性進行反駁。<sup>44</sup>他認為，「國家形象」是以客觀物質性為基礎，再通過互動、建構形成不同形象與認知。

「理性主義」認為「國家身份」是既定的，國家利益也就是既定的；而建構主義則認為，國家身份是由互動產生，身份產生後，國家才會確定本國利益，並以此指導國家的行動；所以「國家形象」的不同會導致國家的利益以及基於利益的外交行為不同。康德文化中的國家形象是「朋友」，國家利益是「共同安全」，

<sup>39</sup> 湯光鴻，〈論國家形象〉，《國際問題研究》，第4期（2004年），頁18。

<sup>40</sup> 李正國，〈國家形象構建:政治傳播及傳媒影響力〉，《現代傳播》，第1期（2006年），頁157。

<sup>41</sup> 傅新，〈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形象——兼對中國謀求發展的思考〉，《國際問題研究》，第4期（2004年），頁13。

<sup>42</sup> 李壽源，《國際關係與中國外交——大眾傳播的獨特風景線》，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305。

<sup>43</sup>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頁17。

<sup>44</sup>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頁6。

外交行為是「互助」，隨著這種文化的內化，國家利益將進一步實現。<sup>45</sup>「國家形象」並非單向建構，而是「自我建構」和「他者建構」共同作用的過程。<sup>46</sup>

### （三）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相關研究

#### 1. 政治傳播與「國家形象」建構

中外學者都認為，「國家形象」的建構是「政治傳播」的重要任務，它不僅是民眾獲得訊息的渠道，也是一國形象進入國際社會的重要通道。不平衡或有偏差的新聞報導會導致錯誤或消極的「國家形象」和國際間的誤解；而客觀的，積極的新聞流動會促進國家間的認知與合作。<sup>47</sup>

法國學者巴柔（Daniel Henri Pageaux）認為，從「形象學」角度反觀國際關係，「國家形象」是一種異己的、涉外的對象(國家、群體或個人)的文化印象，它並非是國家客觀形象，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需求通過一種「意象化」的象徵符號的表述。<sup>48</sup>學者鄭保衛與劉繼南認為「國家形象是在國家的本源基礎上，通過各種媒介，對某一國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強月新，葉欣根據「國家形象」的不同定義，將其歸納為三個面向：一是「國家客觀形象」，是國家綜合國力為內在支撐的實然狀態；二是「國家虛擬形象」，是國際新聞報導中的國家形象；三是「公眾認知形象」，是國家內外公眾通過媒介傳播所獲得的對國家的認定。<sup>49</sup>

#### 2. 西方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塑造

形塑「國家形象」直接關聯到國家利益以及國際社會的接受程度，在當代國際社會中，實力強大的發達國家往往擁有媒介話語權，如美國的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不僅是美國主流傳媒機構，而且在世界範

---

<sup>45</sup> 同上，頁 7-8。

<sup>46</sup> 秦亞青譯，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 34。

<sup>47</sup> 謝曉娟，〈論軟權力中的國家形象及其塑造〉，頁 20。

<sup>48</sup> 李正國，〈國家形象構建:政治傳播及傳媒影響力〉，《現代傳播》，第 1 期（2006 年），頁 157。

<sup>49</sup> 強月新，葉欣，〈西方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的轉變及其啓示〉，頁 102。

圍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因此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輿論傳播優勢常常是「壟斷性」的。<sup>50</sup>

西方媒體對於中國的「國家形象」塑造整體呈現較負面態勢。學者郭小平《在西方媒體對中國的環境形象建構》一文中分析《紐約時報》2000-2009的「氣候變化」相關報道，探究該報所塑造的「中國環境形象」，發現該報弱化中國在環境領域「正面形象」，塑造中國「要經濟不要環保」形象。<sup>51</sup>楊巧燕在《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中以《紐約時報》2008-2019涉華報導中呈現的國家形象進行分析，發現其著重於中國的「經濟」與「貿易」方面，中國「外交形象」報導也以突出其軍事野心的話語策略為主，並弱化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以及「和平崛起」形象。美國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媒體塑造是基於中美所建構的洛克文化中的「競爭對手形象」下。<sup>52</sup>

學者毛利在《海外媒體涉華新冠肺炎報導的話語建構與建構分析》對此次新冠疫情下西方主流媒體涉華框架進行研究，認為其呈現用政治解讀公共衛生事件、情緒化表達超越理性、刻板印象持續加劇現象；<sup>53</sup>學者李嬋對新冠疫情中美國《華爾街日報》媒體呈現進行研究，也認為對中言論呈現誇大，轉嫁責任，設置議題框架，樹立負面形象特徵。學者王勇認為，美國對華輿論在近年來呈現不斷緊縮，此次疫情中加劇，因為中美全面競爭格局形成，選舉及疫情使其加劇。<sup>54</sup>

雖然西方主流媒體長期對中國呈現「輕視」或「俯視」視角，但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危機處理能力提高，自身話語權增強，西方主流媒體也逐漸出現對中國中立客觀的「平視」報導。如2008年《紐約時報》對於中國汶川地震的有效及時救助給予肯定；<sup>55</sup>「伊波拉」疫情爆發時，BBC新聞也讚賞中國的「衛生援助」及時有效。2020年新冠肺炎，《紐約時報》的輿論導向也從1月對中國呈現全

<sup>50</sup> 同上，頁159。

<sup>51</sup> 郭小平，〈西方媒體對中國的環境形象建構——以《紐約時報》“氣候變化”風險報道(2000-2009)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卷（2010年），頁25-28。

<sup>52</sup> 楊巧燕，〈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以《紐約時報》為例〉，頁48-50。

<sup>53</sup> 毛利，〈海外媒體涉華新冠肺炎報導的話語建構與建構分析〉，中國記者，第4期（2020年），頁82-86。

<sup>54</sup> 王勇，〈全面競爭與疫情交織背景下的中美輿論與溝通〉，對外傳播，第6期（2020年），頁4-7。

<sup>55</sup> Andrew Jacobs, “Rescuers struggle to reach China quake victim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8/05/15/world/asia/15ihtquake.2.12917472.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May 15,2008\)](https://www.nytimes.com/2008/05/15/world/asia/15ihtquake.2.12917472.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May 15,2008))

面性負面報導，到 4 月對中國中立、正面報導偏多，對美國的國內應對不利呈現批評。<sup>56</sup> 在疫情期間，學者崔洪建在《「敘事之爭」—疫情期間歐洲涉華輿論的變化及其特點》一文中分析歐洲對華輿論導向，認為其雖然也呈現「敘事之爭」，但不同階段、官方與民間、區域之間也存在對華報導差異化。<sup>57</sup>相較於西方媒體，非洲媒體對中的偏見與污名化較少，但也並未一邊倒向中國，而是基於非洲利益進行「中國形象」的呈現。<sup>58</sup>

根據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大眾媒體對於「國家形象」的塑造是十分重要的。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的議題中，面對負面輿論，需通過國內媒體、「領袖」傳播力量「自我發聲」；同時需要「借勢」，有意圖影響他國媒體報導傾向和重點。雖然在西方報導中中國呈現較負面形象，但並非無法改變，可以通過增加國家間良性互動、注重身份互動的「共同話語」，建構共同的身份認知，加強話語的回應性和執行力從而建構國家積極形象。<sup>59</sup>總之，大眾媒體既是建構國家形象的「手段」也是檢驗國家形象變化的「途徑」。

### 3. 中國的國家形象建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並非以傳統大國方式擴張發展，而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然而中國卻一直處於國際社會的認同困境中，而「國家認同」則是「建構主義」的核心。<sup>60</sup>

學者莊國平認為中國應將塑造「國家形象」作為安全與發展的核心要素，並提出對中國的重要性：（1）「國家形象」是國家安全以及發展的一部分；（2）有助於中國實施國際影響力；（3）成為中國積累與配置對外戰略資源的目標；（4）成為國際各國及國際組織制定「對中政策」的考量因素。<sup>61</sup>

<sup>56</sup> 周鑫宇，〈中國的「抗疫外交」：成效與啟示〉，頁 25-27。

<sup>57</sup> 崔洪建，〈「敘事之爭」？—疫情期間歐洲涉華輿論的變化及其特點〉，對外傳播，第 6 期（2020 年），頁 55。

<sup>58</sup> 李洪峰、趙啟琛，〈新冠肺炎疫情時期非洲法語主流媒體涉華報道研究——以塞內加爾為例〉，《對外傳播》，頁 74-78。

<sup>59</sup> 楊巧燕，〈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以《紐約時報》為例〉，頁 54。

<sup>60</sup>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頁 21。

<sup>61</sup>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頁 331。

不同與「現實主義」觀點，「建構主義」認為國家間的關係是通過國家互動產生，所以中國的發展方式一方面取決於中國與他國的互動，另一方面取決於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進程。<sup>62</sup>若國際所認同中國的正面「國家形象」，和平發展是完全可行的，<sup>63</sup>對於中國，形塑「國家形象」是必要也有意義的。「國家形象」的重要性已經得到充分應證，2003年「SARS 非典」疫情使其在日後的國際事務中也處處被動；危機事件傳播能力差，在西方報導中呈現較負面形象。<sup>64</sup>

#### 4. 新冠疫情下中國的「國家形象」建構研究

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的關鍵首先需要準確的角色定位；其次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做到與其形象相吻合的行為；第三，提升中國對外外宣方式。<sup>65</sup>學者袁靖華、李安娜認為，國際傳播十分重要，而針對疫情這類公共安全事件的報導應注重報導策略以及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關注受眾差異以及話語角色、立體呈現「全球化」理念下的國家形象；建設「命運共同體」共同話語，傳播整體性、普遍性、多元對話思維。<sup>66</sup>學者張生祥在《新冠疫情下 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對策》中提出如何在東西方傳播不平等的國際傳播秩序下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的方法及途徑，所以提升中國的外宣方式成為中國國際傳播學者的研究重點。

### 第七節、研究範圍

本研究著重於在新冠疫情發生當下，中國的官方行為以及與他國及國際組織所進行的以應對疫情為目標所展開的「疫情外交」過程。根據外交參與者類型的不同分為「雙邊外交」及「多邊外交」。

時間範圍上，遵循中國疫情發展時間軸，從2019年12月27日，中國報告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為研究起點；以中國6月後，中國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在發言中提到「中國目前進入後疫情時代，防疫轉為常態化」為研究終點。重點探求，中國在2020年上半年「國內疫情嚴重期」至「國內疫情平穩，國外疫情爆發」期，中國多角度、多平台進行對外宣傳的「自我建構」過程以及不同階段的

<sup>62</sup> 同上，頁22。

<sup>63</sup>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頁22。

<sup>64</sup> 夏倩芳，葉曉華，〈從失語到喧嘩：2003年2月～5月國內媒體「SARS 危機」報道跟蹤〉，頁64-65。

<sup>65</sup> 謝曉娟，〈論軟權力中的國家形象及其塑造〉，頁21。

<sup>66</sup> 袁靖華，〈建設共同體話語：後疫情時代國際傳播的思維與路徑〉，頁57-60。

「疫情外交」過程。並結合民意調查、此階段媒體報導、他國評價分析中國整體國家形象的變化。

重點選擇國內及國外疫情均處於高峰階段是因為在後疫情時代，許多非「疫情」因素會同時影響「國家形象」建構，變量較難排除。所以希望針對疫情所展開的國家行為進行重點研究，故框定受疫情影響最大的階段作為此次研究的重點階段。





## 第二章 疫情外交與外交轉型

### 第一節、傳統外交轉型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家間「外交」的屬性和特點也不斷改變，「外交」方式也不斷轉型。本章節將梳理國家間「傳統外交」、「全球衛生外交」、以及「疫情外交」的轉型及發展過程；同時定義「疫情外交」範圍，以及明確「疫情外交」重要性。

《外交學概論》一書中，認為「外交」的產生基於以下三個條件：民族和國家的產生、一定程度的生產力；各國之間開始交往；隨著社會發展產生了一套各國共同認可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

「外交」是國家間溝通對話的手段，而外交的指導核心則是「對外政策」。「對外政策」是國家政府開展外交互動所遵守的法則，是實現某一時期的特定外交目標的「內核」。<sup>2</sup>外交是一國家落實和實施「對外政策」的方式。所以外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目標宗旨，而是方法。

全球化讓國家邊界不再是「神聖且不可侵犯的」，如今新的國際趨勢正改變傳統對「外交」的看法，「外交」在逐漸轉型。布賴·恩霍金( Brian Hocking)等長學者研究了「外交轉型」的特點，提出「整體外交」( integrative diplomacy) 的框架。<sup>3</sup>該框架從四個方面闡述了外交轉型方向以及趨勢，在學術及外交領域產生了很強影響作用。包括：外交的環境和位置( context and location) 、規則和規範( rules and norms) 、行為體和角色( actors and roles) 、溝通和交流方式( communication patterns) 。<sup>4</sup>外交的行為體更加多樣且豐富，這是「傳統外交」和「現代外交」的一大不同。

<sup>1</sup> 魯毅等，《外交學概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4 版，第 19 頁。

<sup>2</sup>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13。

<sup>3</sup> 布賴恩·霍金等：《外交的未來》，《國際政治研究》第 4 期（2012 年），頁 65。

<sup>4</sup>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頁 15。

「傳統外交」行為主體是外交官，他們是國家「守門人」和國家間的「談判者」，有外交領域排外特權。而「現代外交」主體則是由多個外交攸關者組成，有官方行為體如政府；也有非國家行為體，如企業家、專家、菁英甚至民眾。這些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到外交活動中，而且外交影響力越來越大。此外，外交環境和位置的不同使得不同外交議題上最有話語權的外交主體不同，不再單一只有外交官，而是該領域最具切身利益的團體，或該領域的專家。比如在「公共外交」領域，其外交主體是國家與他國民眾；經濟領域則是依靠企業家們的互動，衛生領域可以是醫療工作者及與衛生領域多邊組織成為外交主力。隨著數字化及新媒體大規模滲透，外交的溝通方式也發生改變，政府並非只能面對面溝通，而可以通過電話進行「雲端會議」，外交官可以利用社交媒介開展「推特外交」。隨著國際傳播爆炸式增長，各個外交行為都在媒介下被檢視，伴隨著媒體的力量將外交行為二次傳播至民眾耳中。

## 第二節、疫情推動全球衛生外交發展

1990年，公共衛生還被看作是醫學或公共治理問題，和外交並無直接關聯。但上個世紀傳染病及特大公共衛生災害頻發，使得各國對全球衛生領域凝聚起共識。任何國家無論實力多麼強大，都無法獨善其身、也無法單獨解決全球化的衛生問題，國家間的合作以及外交成為在該領域必須的行為方式。在2000年的「八國首腦高峰會議」上，八國首腦峰會敦促國際社會就糧食危機和衛生問題採取行動，發達國家也表示履行在國際衛生議題，衛生體系的建設等內容上的承諾。2007年3月20日由法國、巴西等7國聯合發佈的《奧斯陸部長宣言——全球的衛生：當前緊迫的外交政策問題》中強調公共衛生是當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之一。2009年4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召開了全球衛生外交會議。同年12月，第64屆聯合國大會就「全球衛生和外交政策」議題舉行了辯論會。<sup>5</sup>至此，全球衛生領域受到重視，「外交政策」與全球衛生問題聯繫在一起。「全球衛生」不再被看作是邊緣問題，「衛生外交」成為國際外交重要一環。<sup>6</sup>

「全球衛生」範圍廣泛，包含三個部分：全球衛生發展、全球衛生安全以及全球衛生外交。中國學者晉繼勇提出了「衛生外交」概念，將其概括為各行為主體

<sup>5</sup> 羅艷華，〈試論“全球衛生外交”對中國的影響與挑戰〉，《國際政治研究》，第32卷第2期（2011），頁45。

<sup>6</sup> Harley Feldbaum, Kelley Lee, and Joshua Michaud, “Global Health and Foreign Policy.” *Epidemiologic Reviews*, Vol. 32 (2010), pp. 83-84.

為解決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問題所採取的一種全球治理行動。<sup>7</sup>對「衛生外交」的目標的探討，學者們則分為兩派。第一派認為，「全球衛生外交」是國家、政府間組織和非國家行為共同協商，以應對衛生方面挑戰。<sup>8</sup>包括基於衛生方面的對外經濟及社會發展援助、參與全球衛生治理、國家間的衛生交流及合作。<sup>9</sup>

第二派則認為，「衛生外交」的目的並非著重在衛生領域，而是在國家的政策制定和談判中利用衛生概念或機制以達到其他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目標。<sup>10</sup>所以，綜合不同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衛生外交」是基於衛生領域，而其效果卻可以外溢至其他領域。筆者總結為以下幾個目標，其一，「衛生外交」通過外交手段實現提升全球衛生活動及完善全球衛生機制；二，利用外交手段促進與衛生有關雙邊及多邊協議的簽署；其三，利用「衛生外交」追求其他外交政策目標及其他外交領域合作。<sup>11</sup>

「衛生外交」不僅目標多元，而且相對利用文化及經濟開展外交活動，「衛生外交」行為主體也更多元，包括國家行為體以及非國家行為體。政府通過雙邊互動進行國家層次外交活動；非國家行為體包括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s），私營慈善機構及專家、學者等。因為其行為體的多重性，也被稱為「多利益相關方外交」。<sup>12</sup>

中國學者張清敏表示，作為全球關注問題，「衛生外交」是藉由衛生問題來改善人民，國家之間的關係的重要手段。所以衛生外交可以有助於提升國家在國際上的「國家形象」<sup>13</sup>，其外溢效果使得大國積極投身於「全球衛生外交」實踐中。這在「衛生外交」發展過程中的國家實踐上已有體現。作為較早開展「衛生外交」

<sup>7</sup> 晉繼勇，〈淺析公共衛生外交〉，《外交評論》，第4期（2008年），頁83。

<sup>8</sup> Lee, Kelly. Richard, Smith. "What is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 Conceptual Review."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2011), pp. 3-5.

<sup>9</sup> 徐彤武，〈全球衛生：國家實力、現實挑戰與中國發展戰略〉，頁15-16。

<sup>10</sup> 晉繼勇，〈淺析公共衛生外交〉，頁85。

<sup>11</sup> 晉繼勇，〈淺析公共衛生外交〉，頁85-87。

<sup>12</sup> P. J. Hotez, "Vaccine Diplomac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LOS Negl Trop Dis*, Vol. 8, No. 6 (June 26, 2014), pp. 2.

<sup>13</sup>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36卷第2期（2015年4月），頁22-24。

的英國與美國，其在該領域的投入也使得其擁有更多話語權以及較好的國際形象。

## 一· 衛生外交先行者：英國

國際「衛生外交」領域從西方發展起來；主要代表國家為英國及美國。英國，作為19世紀初期的全球霸主，是「衛生外交」領域先驅國家。其「衛生外交」和發展援助相結合，深謀遠慮，成效頗佳。1929年英國的第一部《對外發展援助法》；1997年成立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sup>14</sup>標誌其國家援助重點轉向衛生外交，為21世紀衛生外交做準備。<sup>15</sup>英國政府2008年發佈的首份《國家全球衛生戰略》，<sup>16</sup>可以看出，英國是首個真正從戰略高度將「全球衛生」貫徹於國家政策之中的大國。

英國的「衛生外交」成果斐然。在西方七國集團（G7）中，英國是唯一達到了聯合國倡導的「官方發展援助（ODA）占國民总收入（GNI）0.7%」的國家，並保持至今。英國在應對兒童健康、傳染病疫情等全球性議題上也發揮領導者作用；英國對外援助的部門國際發展部（DFID）每年的衛生援外支出高於12.67億美元，2018年向WHO捐贈2.48億美元。<sup>17</sup>

英國也是在美國後向世衛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 GAVI）、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以及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第二大捐助國。英國還在政府支持下設立了國際醫院集團（International Hospitals Group Limited, IHG），已經在50多個國家實施近500個項目，從而強化當地

<sup>14</sup> 2020年，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與外交部合併，成立外交、聯邦和發展部。

<sup>15</sup> 徐彤武，〈全球衛生：國家實力、現實挑戰與中國發展戰略〉，《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2016年），頁17。

<sup>16</sup> Health is global: a UK Government strategy for 2008-201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134705/>>

<sup>17</sup>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rofit 2020—United Kingdom, oecd-ilibrary.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ff4da321-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5e331623-en&\\_csp\\_=b14d4f60505d057b456dd1730d8fcea3&itemIGO=oecd&itemContentType=chapter#section-d1e41484](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ff4da321-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5e331623-en&_csp_=b14d4f60505d057b456dd1730d8fcea3&itemIGO=oecd&itemContentType=chapter#section-d1e41484)>

醫療衛生系統。<sup>18</sup>這些衛生外交方面的舉措有力鞏固英國大國地位以及在受援國家中對方影響力。

## 二· 衛生外交領軍者：美國

美國十分重視「衛生外交」。因為美國認為「衛生外交」是其在衛生領域的投資，目的有促進社會以及經濟進步，穩固盟友、維護美國周邊安全，也能服務於其他領域，提升國家形象。<sup>19</sup>

1881 年至 1949 年，美國「衛生外交」主要為防止外國傳染病蔓延到本國以及通過促進國際衛生合作機制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sup>20</sup>將衛生納入「國家外交戰略」是從冷戰後開始。冷戰後，美國「一超多強」局面形成，國際局勢趨於平穩，使美國開始注重「衛生外交」等較低階政治，這一時期美國外交的特點是「衛生外交」維度的全球化、理念的安全化以及機制的一體化。<sup>21</sup>

美國的衛生外交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特定。1960 起，美國通過對外援助形式開展「衛生外交」。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簽署《1961 年對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美國主要的對外援助機構同時成立。柯林頓時期（Bill Clinton）在「衛生外交」領域較關注「愛滋病」防控，將其納入「國家戰略」，並建立「全球傳染病監測和應對系統」。1996 年至 2001 年不斷增加財政支出應對全球愛滋病傳播。小布希時期（George W. Bush）著重於「對外衛生援助」；對非典，禽流感疫情進行有效應對。2003 年 3 月 21 日世界衛生組織向全球發出 SARS 警告後，小布希立刻將 SARS 列入檢疫傳染病名單中，使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可強制對疑似感染 SARS 患者進行隔離，狙擊疫情在美國的擴散。疫情災難期過後，小布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應對未來出現類似傳染病：2004 年 4 月 28 日頒布了「21 世紀生物防禦」總統令；2005 年 11 月 1 日又公佈「應

<sup>18</sup> 徐彤武，〈全球衛生：國家實力、現實挑戰與中國發展戰略〉，頁 18。

<sup>19</sup> U.S.Department of State, About the office of Global Healthy Diplomacy, <<https://www.state.gov/policy-issues/global-health/>> (Jan 9, 2016)

<sup>20</sup> 晉繼勇，〈美國衛生外交：一種歷史與現實的考察〉，《太平洋學報》，第 5 期（2012 年），頁 29-30。

<sup>21</sup> 張業亮，〈美國的全球衛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區域為例的國際政治分析〉，頁 11。

對流感大流行國家戰略」，並撥款 71 億美元的預算，用於日後對傳染病疫情的緊急開支。同時出台「總統瘧疾倡議」，並加強對非洲地區對抗瘧疾疫情的投入，從 2003 年起，五年內為 15 個非洲國家提供 12 億美元援助。<sup>22</sup>歐巴馬時期 (Barack Obama) 大力開展「全球衛生外交」並兼顧「對外衛生援助」，並將其作為「國家巧實力」以及提高「美國形象」的最優先工具。2009 年，歐巴馬提出「全球衛生倡議」，6 年內外撥 630 億美元用於建立一體化的「衛生外交策略」。同時，注重 WHO 地位和作用；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建立多邊和雙邊衛生夥伴關係。<sup>23</sup>2014 年伊波拉疫情爆發時，歐巴馬會見來自 43 國的衛生部長及政府官員，商討「全球衛生安全議程」實施，以提高國家應對傳染病疫情的偵測以及快速反應。

1990 年至今，美國一直是全球衛生發展援助的第一大捐助國，1990 年共捐助 19 億美元，佔全球衛生發展援助總量的 28.2%；2014 年捐助金額提升到 124 億美元，佔總量的 32.5%。另外相較於其他國家，美國用於全球衛生領域的官方發展援助佔 28%，英國為 17%，德國日本為 3%。<sup>24</sup>

在川普時期 (Donald John Trump)，「全球衛生外交」雖不是美國最優先議程，但在 2017 年「聯合國大會」上川普仍表示全球衛生安全仍是美國重要議程，<sup>25</sup>但相較於前幾位總統在衛生外交領域的投入，川普政府則呈現明顯的倒退趨勢。2017 年 3 月 16 日，川普公佈了其首份《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預算藍圖》，該預算草案計劃在 2018 年財政年度把美國全球衛生活動資助削減 26%，其中包括完全削減對發展中國家女性的計生項目的資助，將國際艾滋病項目援助削減 17%，將抗瘧疾項目資助削減 11%。<sup>26</sup>2019 年 5 月 9 日，川普政府正式發佈了《2019 全球衛生安全戰略》(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sup>27</sup>晉繼勇等學者

<sup>22</sup> 同上，頁 12-18。

<sup>23</sup> 晉繼勇，〈美國全球衛生治理的戰略、實質及問題〉，頁 94-96。

<sup>24</sup> 徐彤武，〈全球衛生：國家實力、現實挑戰與中國發展戰略〉，頁 19-20。

<sup>25</sup>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September 19, 2017).

<sup>26</sup> 晉繼勇，〈美國全球衛生安全戰略及其對世界衛生安全體系的挑戰〉，頁 93。

<sup>27</sup> 《全球衛生安全戰略》(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 於 2014 年在華盛頓正式提出。是美國倡議並主導、旨在強化全球衛生安全合作，並落實全球安全議程的協議。主要發達國家，中國、印度等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以及世衛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等均出席。

認為最新一版的《全球衛生安全戰略》的修改反映了川普政府在全球衛生領域的「負擔分擔」、「美國優先」和反多邊主義思維。<sup>28</sup>

此外，川普政府在 2018 年撤掉由歐巴馬 2015 年建立的常設機構「流行病預防和應對理事會」，國土安全部的「衛生安全架構」也被撤銷，此舉受到批評，甚至有全球衛生安全專家認為，「如果美國面臨傳染病威脅，美國的應對措施將會因川普對科學的無知而處於被動。<sup>29</sup>」2018 年，世衛組織宣佈伊波拉(Ebolavirus) 疫情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時，川普政府宣佈收回對世界衛生組織的 2.52 億美元應急項目資助；<sup>30</sup>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世界衛生組織在資金方面啟動「戰略準備和應對方案」，以此幫助 13 個疫情防控能力令人擔憂的非洲國家時，川普提交的 2021 年預算草案中卻將美國對世衛組織應急支出預算削減 50%。<sup>31</sup>2020 年 4 月 14 日，川普政府更是宣佈暫停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川普政府一系列在「衛生外交」領域的倒退受到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國際諸多著名學者批評，他們認為美國在開倒車，美國的國家形象會受到打擊。

### 三· 中國衛生外交現況

中國在「全球衛生外交」上有較長的歷史，互動形式豐富，有單邊對外援助也有參與國際組織的多邊互動，中國對亞非拉地區的「單邊衛生援助」長期扮演重要角色。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向非洲地區國家派醫療隊、建設醫院、培訓醫療技術人員，設立瘧疾防治中心等，使非洲當地許多國家的公共衛生狀況有所好轉。據統計，中國向160餘個國家及國際組織提供了四千億元人民幣的援助，同時共向外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sup>32</sup>

<sup>28</sup> 晉繼勇，〈美國全球衛生安全戰略及其對世界衛生安全體系的挑戰〉，頁 77-80。

<sup>29</sup> Laurie Garrett, "Trump is in a Coma on Public Health," Foreign Policy, May 21,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21/trump-is-in-a-coma-on-public-health/>>.

<sup>30</sup> Laurie Garrett, "Ebola is Back. And Trump is Trying to Kill Funding for It," Foreign Policy, May 9,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09/ebola-is-back-and-trump-is-trying-to-kill-funding-for-it/>>

<sup>31</sup> Robbie Gramer and Colum Lynch, "Trump Seeks to Halve U.S. Funding fo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Coronavirus Rage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0,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2/10/trump-world-health-organization-funding-coronavirus-state-department-usaid-budget-cuts/>>

<sup>32</sup> 徐彤武，〈全球衛生：國家實力、現實挑戰與中國發展戰略〉，《國際政治研究》，第 3 期（2016 年），頁 25。

衛生援助確實加深了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友誼，並轉化為政治上的支持，在中國重獲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可以體現，這說明「衛生外交」對改善中國外交形象起重要作用。此外，中國積極支持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的衛生活動：加入WHO的全球虛擬實驗室研究網絡，與他國分享公共衛生信息，參與衛生交流及合作。作為國際衛生領域最有話語權的國際組織，中國通過與WHO的積極互動，參與全球衛生活動以及在依波拉疫情爆發時中國提供的及時援助等行為都獲得WHO好評，從而逐漸在國際衛生領域享有一定的話語權。

但是，中國在「衛生外交」方面還是遠不及英美國家，主要有以下問題：第一，以衛生援助為手段的外交方式太過單一，與如英美這些投入時間更長、力度更大的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外交援助效果不明顯。且對外衛生發展援助未處於「國家發展戰略框架」下，在國內外的透明度極差，導致「國外掌聲小，國內罵聲大」的反常現象。<sup>33</sup>第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可以做出更大貢獻，承擔更多責任。1990年中國衛生費用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5%，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還差一個百分點；2015為5.96%，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sup>34</sup>雖然中國目前衛生支出從2000年的不到5000億元人民幣激增至2019年的6.5萬億美元，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佔GDP相對較低份額。在全球最佳國家(Best Country)調查中，中國在「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Well-developed public health system)指標在2016年中僅獲0.6分，2021年得分上升為19.4分，<sup>35</sup>雖然有顯著進步，但相較於發達國家得分較低，這顯示國際對於中國的衛生治理能力普遍存在不了解以及不信任，這體現出中國目前仍面臨全球衛生能力和衛生話語權和大國地位不相稱的困境。第三，中國雖然積極投入衛生領域，努力希望改變國際形象，但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中國政府初期瞞報疫情狀況，導致疫情擴散對中國形象的影響極大，國際對中國的偏見仍未消除。

所以若提高中國在衛生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形象，必須改變「衛生外交」的方式，不能再只侷限於單一外援助投入上；其次還需要制定衛生方面的對外政策，

---

<sup>33</sup> 同上，頁36。

<sup>34</sup> 同上，頁26。

<sup>35</sup> Best-countries—quality of life, U.S.News&World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quality-of-life-rankings,2021>.



並將其提升至國家層次上；第三，杜絕在衛生合作方面存在的「冷戰思維」，以更全球化及負責任態度認識全球「衛生外交」；第四，中國需要制定國家衛生戰略並且樹立全局意識，各個部門統籌共同助力；第五，需注重非國家行為體及善用此領域專家學者之作用，<sup>36</sup>只有這樣才符合現代「衛生外交」特點，也能提升中國在衛生領域的話語權以及影響力。

### 第三節、疫情外交：全球衛生外交中的重要一環

正如上一節所述，「衛生外交」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建立全球流行病防控系統，對外衛生援助，國際間合作的衛生防治、國家間傳染病疫情的應急處理及控制，大部分是長年累月積累的結果。但對於傳染病疫情的全球性狙擊，相對於其他「衛生外交」領域活動則更緊急、迫切，對國家形象影響更大。因是緊急狀態下從事的外交活動，也有學者將在傳染病發生當下展開的外交行為稱為「非常規狀態下的應急外交」，或「疫情外交」。

#### 一· 疫情外交的發展

隨著全球化發展，各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互賴不斷加深，傳染病傳播也越發迅速。傳染病最早可以追溯到鼠疫引起的「黑死病」，在1347年從意大利蔓延到西歐國家，而後傳到北歐，再到俄羅斯，最終席捲了整個歐洲，奪走超過2500 萬人的生命，但因為交通不便利，所以疫情還未擴展到全球。「疫情外交」重要性提升是上個世紀70-80年代，傳染病及公共衛生安全事件不斷發生且範圍越來越大，除流感、瘧疾、霍亂、黃熱病等疾病捲土重來外，新型的傳染病也速度出現，對全球造成災難性影響。2003年4月爆發的非典很快傳播到全球20多個國家，當年造成800人死亡、數十億美元的貿易和旅遊損失。<sup>37</sup>2009年1月，墨西哥爆發新型甲型H1N1禽流感疫情，11月則有207個國家出現病例；2016年爆發的巴西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的非洲依波拉疫情，以及2020的「新冠肺炎」的傳播速度更是令人猝不及防。每一次傳染病的突如其來都使得人類措手不及。儘管半個世紀以

<sup>36</sup>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36卷第2期（2015年4月），頁29-32。

<sup>37</sup> 張業亮，〈加強全球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合作機制〉，頁68。

來，各國的衛生體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加強，但如何在疫情來臨之時，有效應對新型流行病仍是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面臨的巨大挑戰，無論多美強大的國家都無法獨自處理，而是需各國互相幫助，共同對抗。

疫情應對上，國家的危機處理速度，處理效果直接導致國內及國際的疫情蔓延態勢，所以開展外交活動及合作應對疫情變得尤為重要。以史為鑒，疫情促進國際衛生合作外，國家還會藉由抗擊疫情產生經濟、政治、以及國家形象的「雙向認知」的互動。

## 二．「疫情外交」特點

「疫情外交」和常態下的外交活動相比，具有不同特點。呈現出「跨國性」、「全覆蓋性」以及「非排他性」特點：<sup>38</sup> 抗疫行為覆蓋於全球範圍內，傳統的國家邊界逐漸模糊，「跨國性」多國合作是常態，即使是經濟和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都需要通過國家間合作來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其次，「疫情外交」對以主權為核心的傳統外交形成挑戰。<sup>39</sup> 在全球衛生外交領域，活躍且具有話語權的國家不是政治或經濟影響力最強的國家。第三，全球衛生領域合作不再局限於國家之間，也不再局限於政治夥伴及同盟的國家間；發生疫情之時，即使是敵對國家也需謀求衛生領域的合作。<sup>40</sup>

此外，「疫情外交」行為體並非只限於國家政府，還包含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等非國家組織、企業、社會菁英團體、科學領域專家學者以及各國公民，他們的聲音都因為「疫情外交」被聽到，一國的外交做法也被放置與陽光下被充分放大檢視。對於一國來說，疫情外交是一次與多層次行為體的互動過程，需要國家第一時間做出應對，對於國家的實力是極大考驗；也要求國家要更加誠實，並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其外交效果劇烈，對國家形象是一把「雙刃劍」。

## 三．「疫情外交」的重要性

<sup>38</sup> 秦亞青，〈合作：命運共同體發展的鐵律〉，頁 28。

<sup>39</sup> LEE K., Smith R (2011).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 conceptual review,"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2011, pp. 3.

<sup>40</sup>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頁 9-10。

「疫情外交」的重要性之一是能夠促進國家間的合作，疫情治理的急切性及全球性會使國家暫時擱置爭議，共同應對。在冷戰的高峰期，美蘇之間危機不斷，但雙方仍然能夠合作推廣天花疫苗接種，共同消滅了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疫情使國家關係打破了「西方」與「非西方」、傳統「軍事盟友」的界限，給國家外交關係網絡提出新的要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國與日本、韓國積極合作，中國也在 2 月 20 日向日本提供新冠病毒檢驗試劑，日本也成為中國首個援助國家；而對於較緊張的中美兩國，在疫情初期國際也期待兩國可以放下成見，聯合應對疫情。

屬於衛生領域的「疫情外交」還可以使東西方在同一時空背景下獲得更強情感連結和認知。東方和西方存在意識形態的差異，是公認的事實。雖然 21 世紀以來，東西方持續進行文化交流，但因為意識形態差異大難以形成理解，所以很難形成認同，「公共外交」投入大卻收效甚微。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則是全世界人民都不願意看到的現象，對早日擊敗疫情的期許也是全球無論何種族群的人共同的心願，人民也知道只有合作才是對抗疫情的唯一方法。所以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開展的「疫情外交」，因受固有意識形態影響小，較容易開展也較易產生「同感」。

「疫情外交」開展的成效會導致國家形象的上升或下降，如中國與美國在非典中的外交行為的不同使得國際對兩國的評價呈現「兩極」，且持續影響了兩國在國際上的得分。在這次新冠疫情中，美國的不作為也使得其國家形象大幅降低，根據《外交政策》調查顯示，91.7%學者認為美國完全沒有做到受尊重大國應履行的責任，美國 75.5%的國際關係學者認為美國疫情中的不作為會大大折損美國的國家形象。<sup>42</sup>由此可知，疫情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巨大。另外，疫情中國家良性互動還能穩定發展夥伴關係網絡，有助於爭取最大層面的支持。

---

<sup>41</sup> 張清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重塑中國外交議程〉，頁 86。

<sup>42</sup> Emily Jackson, et. al., “Snap Poll: What Foreign Policy Experts Make of Trump’s Coronavirus Respons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8/snap-poll-what-foreign-policy-experts-think-trump-coronavirus-response-election/>>(May 8, 2020)

#### 四·中國：疫情外交現況

2003年「非典型肺炎」（非典，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體現中國「疫情外交」的失敗，對國家形象造成毀滅性打擊。2002年11月，非典病例在中國出現，至2003年2月11日，廣東已經出現305例，疫情逐漸嚴重，但政府及中國國內媒體在2月都保持緘默狀態，廣東《羊城晚報》等主流媒體在2、3月報導較少，《人民日報》在4月3日才首次報導非典疫情。然而4月時非典已經呈現幾近「失控」狀態，從廣州傳播到全國多省，進而擴散到全球，截止到4月，共侵襲26個國家與地區，全球感染病例達8098件。<sup>43</sup>

對非典疫情的政府防控不力，隱瞞事實真相導致疾病擴散，使得中國在國際上討伐聲不斷。國際媒體出現許多指責中國的言論，同時質疑中國國家體制。世衛組織在2006年5月18日出版的一本題為《SARS: 一種全球流行病是如何被阻止的》書里，也直接批評了中國在「非典」出現的早期階段封鎖消息和否認「非典」爆發的過失。<sup>44</sup>非典爆發當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 CNN），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等著名國際媒體各節頭條均以報導非典為主。<sup>45</sup>在這階段，中國的國家形象一落千丈，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建立的一些互信關係也因此而面臨巨大考驗。這一定程度的反應「疫情外交」及「疫情治理」對於「國家形象」的重要性。非典後，中國意識到「疫情外交」重要性，開始以積極的姿態與世衛組織合作。在地區上，中國通過多邊渠道開展衛生援助，加強非洲及中國周邊區域後疫情援助及合作，<sup>46</sup>2007年，中日韓簽署「對抗禽流感疫情備忘錄」；2009年，東盟與中日韓衛生部長就甲型流感(H1N1)疫情進行討論。中國也在應對伊波拉疫情中的貢獻，受國內外媒體上報道和稱讚。<sup>47</sup>這也推動中國「衛生外交」的開展，使其逐漸從單一走向多元。

<sup>43</sup> 夏倩芳、葉曉華，〈從失語到喧嘩：2003年2月～5月國內媒體“SARS危機”報道跟蹤〉，《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期（2003年），頁56-60。

<sup>44</sup>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復興崗學報》，第92期（2008年），頁327。

<sup>45</sup>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頁328。

<sup>46</sup> 張清敏，〈援助外交〉，《國際論壇》，第9卷第6期（2007年11月），頁21。

<sup>47</sup> 王昱、劉培龍，〈中國對外衛生援助的歷程、挑戰和對策〉，《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7年），頁101。

## 第四節、小結

本章節中，主要闡述了「傳統外交」到現代外交方式在環境和位置、規則和規範、行為體和角色、溝通和交流方式四方面的轉變，「衛生外交」則是著重於衛生領域所開展的促進國家間衛生合作以及依託衛生問題從而影響如國家形象、經濟領域的現代外交的體現。

作為「衛生外交」領域中重要的一環的「疫情外交」，在全球性傳染病頻發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也因為其強大的傳播力，使得對疫情的治理非一國可以完成，「命運共同體」背景下的合作成為「疫情外交」的中心思想。「疫情外交」打破國家間的壁壘，使世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讓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國家在同一抗疫背景下合作；也因外交行為體的豐富，使得「疫情外交」行為會受到諸多檢視，外交的做法和效果會對國家形象產生影響。



## 第三章 建構主義與國家形象

### 第一節、建構主義核心與理論框架

#### 一· 建構主義概述

約翰·魯傑(John Gerard Ruggie)在《建構世界政體》中寫到，「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包括身份、觀念、規則以及認同。行為體的利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行為體身份不斷改變的。不同於「現實主義」認為「觀念」是無足輕重的，「建構主義」則強調「觀念」本身的巨大影響力，並認為觀念建構了身份，身份確定了利益。「建構主義」開拓了國際關係領域中相對狹窄的理論空間，讓學者聚焦在國家的身份、「認同」問題上，強調了行為體的主動性。<sup>1</sup>

主流「建構主義」認為「物質」是基礎，認為社會世界包含「物質」和「理念」兩個方面。然而「物質」本身沒有社會意義，只有在行為體之間進行社會互動時，才產生社會意義。這是不同於「理性主義」理論的最明顯之處，也是所有帶有建構主義標識的理論的共同之處。

#### (一) 「社會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起正逢其時——20 世紀80 年代冷戰結束進程加速，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爭鳴的強勁勢頭逐漸衰弱，使得人們反思這兩大理論的闡釋和預測能力。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及語言哲學的引入，建構主義應運而生。1989年，尼古拉斯·奧努弗(Nicholas Onuf) 首先將「建構主義」這一概念引入國際關係學界，此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維爾(Friedrich V. Kratochwil)、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 和彼得·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 等學者發展了這一理論框架。建構主義又可以分為認為：社會類別具有極大的人為建構性質，不具有客觀性質的「激進建構主義」，或是以溫特為代表的「溫和社會建構主義」。<sup>2</sup>以溫特為代表的「社會建構理論」強調「整體

<sup>1</sup> 秦亞青，《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經典導讀》，頁 196。

<sup>2</sup> 談東晨、鈕維敢，〈公共外交原理：基於建構主義視角的闡釋〉，《戰略決策研究》，第 4 期（2019 年），頁 65-66。

主義」與「理念主義」。<sup>3</sup>在方法論上，強調整體對個體的作用，既國際體系對國家的作用。在本體論上否定純粹的物質主義，提倡重視觀念的作用。他認為，社會世界包含「物質」和「理念」兩方面，但「物質」本身沒有社會意義，只有在社會互動之中，產生「共有觀念」，才能產生影響行為的社會性意義。

溫特強調，「建構主義理論」是結構理論，強調國際體系對體系單位的作用，體系單位是國家，是國家關係的行為主體。其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識」。卡爾在《The twenty years crisis》一書中寫到：事實是大部分人相信的東西，一切的國際制度都是在主體相信的情況下所建立的，這種大家共同相信的事物或觀念被稱為「共有知識」。<sup>4</sup>溫特也認為，「共有知識」是對於體系的共同的「理解」與「期望」，可以構建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sup>5</sup>所以，溫特認為，「安全困境」及「安全共同體」就是對「共有知識」的不同選擇而建構出的不同結果。

「無政府狀態認是國家造就的」，<sup>6</sup>所以在國家互動中可以造就不同「無政府文化」，從而造就不同「國家形象」和「國家身份」。溫特歸納了三種無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由此產生三種不同「國家形象」：霍布斯文化創造的「敵人形象」，「洛克文化」創造的「競爭對手形象」以及「康德文化」創造的「朋友形象」。<sup>7</sup>在康德文化中，國家之間是以朋友為基本特徵的體系文化，國家不會使用暴力解決利益衝突，而是互相幫助。這實際上是「安全共同體」的形式，這種文化體現著「非暴力」與「合作」。<sup>8</sup>

根據中西方對於建構主義的不同解讀，我們可以發現，其相同性在於「建構主義」強調的三個要素是：「身份」、「共同價值」及「認同」。首先「共有知識」建構「行為體」的身份，身份的不同則決定利益的不同；除了身份，建構主義也並未忽視「物質性」因素的作用，如國家的實力；所以物質性因素可以說是國家

<sup>3</sup>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歐洲》，第3期（2001年），頁5。

<sup>4</sup> Carr, E.H.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4), pp. 36.

<sup>5</sup>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頁7。

<sup>6</sup>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2), pp. 391-425.

<sup>7</sup>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頁16。

<sup>8</sup> 同上，頁7。

形象的基礎。第三是社會性結構。溫特認為，社會結構是什麼樣的並非無政府狀態這樣簡單的定義，二十行為體之間互動的結果，好的互動造就良性社會結構、消極的互動則可能引發「安全困境」的社會結構。而且溫特認為，行為體可以建構一種結構，也可以分解結構、再建立另一種結構。<sup>9</sup>

## （二）其他理論在「國家形象」研究缺陷

相較於「建構主義」對於解釋體系行為者的身份、利益變化以及行為方式上，「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存在不足。台灣學者邱坤玄認為目前研究中國外交政策與國家形象研究中，較多沿用現實主義架構。<sup>10</sup>「新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與安全，為保持安全而追求權利的最大化。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經濟合作以及國際建制能規範國家的行為，促成合作。然而兩理論均無法解釋在某種情況下，為何國家寧願讓利給他國而為了在他國心中樹立好的形象；或是國家間即使沒有制度約束仍遵守國際秩序，從而獲得在國際上「體系維護者」的良好形象；也無法解釋對於同樣擁有核武器的兩個國家，因為其被國際社會公認的形象不同，被認為持有核武器的危險性也不同。

學者邱坤玄認為，在中國發展過程中，若按照理性主義觀點，中國應出現如「現實主義」以及「自由主義」預言的朝著「中國威脅」或是「中國崩潰」方向發展，但隨著全球化發展以及中國參與全球性議題的深入，中國慢慢有了「理性負責」角色認知，中國的角色身分逐漸改變，這些理性主義無法解釋的，所以「建構主義」從社會結構以及主觀建構出發解釋。<sup>11</sup>國家身份建構的例子屢見不鮮，如二戰後德國、日本從兩個好戰的國家的身份形象，努力「建構」愛好和平的國家形象；將「反軍國主義」融入進兩國的規範、制度以及行為中。<sup>12</sup> 現實主義學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認為，單靠基於利益權衡的外交戰略是不可能

<sup>9</sup>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歐洲》，第3期（2001年），頁4-11。

<sup>10</sup> 邱坤玄，〈台灣的中共外交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東亞研究》，第40卷第2期（2009年），頁3-22。

<sup>11</sup> 邱坤玄，〈台灣的中共外交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頁16-17。

<sup>12</sup> Berger, Thomas U.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1996), pp. 320-32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的，還必須讓美國人民有自己的國家意識，產生美國自己的理念價值，從而來塑造其外交政策。<sup>13</sup>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主要發現並討論「客觀條件」以及假定國家利益是給定的客觀因素，從而去解釋事件的規律；「建構主義」則是如何通過自己的理解行動，因之創造「客觀條件」，形成集體意識。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雖然都強調結構對國家的影響作用，然而新現實主義考慮的是國際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而溫特考慮的是「文化性」結構、或者說「社會性」結構對國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構。建構主義學者認為，如果沒有「共同認同」、以集體意向為基礎的規則，就沒有相互理解的國際關係行為。所以「身份」以及「認同」則是建構主義的核心面向，也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研究中所欠缺的。所以當研究國家形象的塑造以及他國對於本國形象認同時，從建構主義的視角出發才更加全面。

### （三）結構建構主義：中國視角

除西方建構主義之外，學者秦亞青在西方主流建構主義基礎之上提出了「過程建構主義」。他認為，「結構建構主義」雖然強調行為體和結構中的互構關係，但仍有缺失，就是忽視國際體系中的社會要素：關係與過程要素。溫特的「結構建構主義」理論認為行為體的互動會影響結構，結構反過來形塑行為體的行為以及身份認同，所以結構是解釋施動者身份和認同的原因。當結構形成之後，互動的過程再次成為一種背景、一種場所；雖然過程在結構建構主義中不可或缺，但不是分析的主要對象。「過程結構主義」強調的是社會互動過程，以及在互動中形成的關係網路；其互動關係具有三個特點。其一，國家間通過互動，從而確定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身份；其二，物質權力通過國家間的互動之後產生意義，通過關係發生作用；其三，身分不是一成不變，互動使國家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因而也調整本國利益。和「結構建構主義」相比，更加強調「關係本位」，而非西方主流理論以個體為核心的「個體本位」，認為國家之間只有存在互動後，才有身份。關係性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個突出概念，幾千年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經驗，

---

<sup>13</sup> 秦亞青，《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經典導讀》，頁 200-202。

此理論強調的也是互動的過程，而非結果，學者秦亞青認為互動不一定會產生結果，互動的過程更加重要。

此理論雖然是將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關係理論和建構主義相結合，但一些學者認為其存在不足以及可能無法廣義解釋問題。首先，這種意義上的關係忽視人的個體性、忽視普遍性規則（契約）。因此，無法作為一種具有普適性的理論進行推廣。其次，如果「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完全取決於「單元之間的關係類型而不是行為單元的自身特徵」是不可能也不現實的，國際關係應當是國家行為體主體性和關係性的結合。第三，有學者認為，此理論強調過程，卻未追求確定性結論以及因果關係，雖然其中包含了中國特有的文化因素，但是沒有具體分析方法，對建構結果解釋力度較弱。<sup>14</sup>

## 第二節、「國家形象」

### 一· 國家形象之意涵

國際關係中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在 20 世紀就開始了，冷戰後「國家形象」議題越來越重要。西方學者 Thomas Schelling 曾指出，「聲譽是國家值得為之一戰的因素之一。」一個享有絕對主權的國家，其基本需求就包括取得尊重和自我實現等，而「取得尊重」和「自我實現」就是國家形象塑造的核心。

「國家形象」的本質是國際社會對一國的評價。它根植於於國家政治制度，外交戰略，國家治理，國家領導人，政府，人民，文化，歷史等諸因素之上，通過「國際傳播」和外交政策實踐共同作用，從而形成的綜合形象。

「國家形象」概念在不同學科之間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概念移植和挪用。它最初作為社會心理學概念，由耶魯大學著名心理學家柴爾德（Irvin Child）在 20 世紀 40 年代提出。柴爾德稱之為「national stereotype」，指他者對某一民族國家的刻板印象，本質上是一種與民族文化和國民個性相關的認知行為。20 世紀 50 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以「national image」一詞表述

<sup>14</sup> 尚會鵬，〈關於國際政治「關係理論」的幾個問題：與秦亞青教授商榷〉，《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第 2 期（2017 年），頁 141-143。

「國家形象」。20 世紀 70 年代，「原產國研究」成為經濟學中的特殊研究領域，國家形象作為與商品原產國密切相關的概念被正式引入經濟學領域。在英語學術界，英文短語「country image」則更廣泛地取代「national image」用以對應「國家形象」一詞。21 世紀初，瑞士學者布曼（Alexander Buhmann）融會社會心理學與經濟學有關國家形象的研究成果，提出國家形象的「四維模式」理論，並將之引入公共外交研究領域。

布曼認為國家形象包括四個維度。功能維度（functional dimension）包括國家治理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體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勞動力市場和教育體系發展水平、政治體系完善程度、科技和研究水平五個方面。標準化維度（normative dimension），體現在國家倡導的價值理念上，特別是國家在社會和生態環境方面的責任感。美學維度（aesthetic dimension）是人們對國家文化和自然景觀的看法和感受。情感維度（emotional dimension），體現在對某一國家整體的感覺和情感。布曼的研究表明，功能維度、標準化維度和美學維度是人們對國家形象的基本認知，是國家形象情感維度生成的基礎，而情感維度則影響國外民眾的具體行為。

國家形象可以分為「形」以及「象」兩個部分進行討論，其一是「形（identity）」，即對國家客觀要素的真實呈現，如國家治理能力、政治制度、經濟水平、衛生及醫療保障等。其二是「象（image）」，其中又可分為「自我建構」的「象」，即本國人想要外國觀察者感知到的國家形象；二是「他者建構」的「象」，既外國觀察者腦中所認知的形象，而「象」的建構過程則是外交以及大眾傳播所針對的重點。「形象」是一個複合名詞，所以「形」與「象」而者無法脫離。國家若自身實力較弱，再如何宣傳都無濟於事。國家客觀自身實力是基石，好的國家形象也是靠自身實力贏來的。而有了強有力的國家實力作為後盾，則可以進行「象」的建構過程。為什麼國家已經有強大的硬實力，還需要「象」建構呢？因為「形象」本身並非客觀的實力體現，而是對他國形象的認知。國家之間會因為文化、社會背景、政治制度、國家交往現況、媒體塑造等諸多因素，影響民眾對於該國「象」的建構，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一千個人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心中對同個國家有一千個印象」。

以色列心理學家巴塔爾（Daniel Bar-Tal）提出了「民族和國家形象形成模型」解釋影響「他者建構」的影響要素有哪些。在這個模型中，三重因素決定了社會群體腦中的他國形象：其一是宏觀社會變量（macro-societal variables），包括群體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以及現實或歷史上與他國群體間的關係。這是他國形象形成的背景性因素和基礎。其二是傳輸機制（transmitting mechanism），也就是那些將他國形象相關信息傳送至個體接受者的社會渠道，如新聞報道、社交圈、家庭和公共教育等，以及個體與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觸。其三是中介變量（mediating variables）。人們對他國形象的認知處理過程受到個人知識、閱歷、價值觀念、情緒態度、人格、動機、認知技能等一系列個人因素的影響。這些個性化的中介變量最終決定著本國民眾頭腦中的他國形象。所以宏觀社會變量、傳輸機制、中介變量形塑著對他國的形象認知，從而影響對其他事物的看法。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希望只通過一國的文化改變他國對其的看法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兩國之間沒有相同的文化及社會背景，所以難以產生認同。正如博而丁認為，國家形象的形成有賴於共同的經歷，這種經歷成為人民間情感聯繫的紐帶。而如果沒有共同的經歷，國家形象就難以被認同與分享。正如歐洲國家間較容易基於相同的民主價值觀產生認同；學者謝韜與美國學者佩奇（Benjamin Page）也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中國運用文化外交如開辦孔子學院、增強文化交流與投資以提升國家軟實力的許多做法，對於提升中國國際形象並無裨益。<sup>15</sup>

## 二·提升「國家形象」的重要性

提升國家形象的目的是在今天並非只有為了獲得他國尊重，其與國家政治、經濟、軍事、貿易、利益之間具有複雜的關聯性和影響力。「宏觀社會變量」、「傳輸機制」、「中介變量」形塑著對他國的形象認知，內化到國家、企業、個人的內心之中，從而影響對該國其他事物的具體行為方式。所以，「國家形象」關係一個國家能否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實現自己的短期和長期目標。影響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地位，經濟參與程度以及憑借

<sup>15</sup> T. Xie & B. Page, "What affects China's national imag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3, 22(83): 850-867.

自身實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sup>16</sup>較正面的「國家形象」在軍事上可以降低兩國間“安全困境”<sup>17</sup>出現的可能性；提升貿易上本國產業在海外的影響力及競爭力；吸引外資進入本國，以及增強國家間的信任程度等。總而言之，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公眾對這個國家的態度，影響著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對該國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所以「國家形象」對每個國家都十分重要。

國家形象在國際社會上的重要性屢次被證實。美國儘管是超級大國，擁有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強大國力，但由於 911 事件後肆意推行「單邊主義」政策，不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展开对话的國家，許多阿拉伯國家認為其是狂妄、虛偽，忽視穆斯林世界的聲音，其國家形象在多國國民心中一落千丈，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反感度甚至高達 70%-80%，即時是美國的盟友國家，其民眾對美國好感度也有所下降，那一階段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壁壘增加，美國的國際交往能力大幅降低。中國在進入 21 世紀初期經濟開始崛起後，其逐步被國際認可，但 2003 年的「非典」疫情，因中國政府前期隱瞞事實，未在第一時間公布真相使得他國及包括國際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對其討伐不斷，其國際公信力及「國家形象」大幅下降。不被信任的形象影響到貿易領域以及中國的國際事務參與度上，中國被認為是愛說謊的國家，「中國製造」的品質受到懷疑。二戰後德國，日本積極樹立「反戰」國家形象，在 1964 年東京奧運會上，一位於美國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當天出生的大學生點燃聖火，目的是向全世界宣告日本已經記住戰爭教訓，這都體現日本重建「愛好和平」形象的苦心，而隨著日本形象的提升，與世界他國的貿易往來也加大；前往日本旅遊的民眾激增從而帶動了其旅遊業及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所以，國家形象的建構對於國家十分重要。

### 第三節、「國家形象」的建構過程

國家形象是否是可以「建構」的？筆者認為是可以的。國家在以有「形」的基礎上，通過強化國家間「宏觀社會變量」的共通性，創造共同記憶；借助「傳輸

---

<sup>16</sup> 傅新，〈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形象——兼對中國謀求發展的思考〉，《國際問題研究》，第 4 期（2004 年），頁 13。

<sup>17</sup>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由國際關係學者赫茲（Hans Hermann Herz）提出。當行為體兩方在安全問題上互相不信任，彼此的資訊不透明，他們就會對對方可能產生的行為做出最壞的評估，從而不斷的通過增加軍備和建立預防舉措來維護國家的安全。

機制」：大眾傳播以及國家間的官方以及非官方的外交從而展現出前文所提到的國家形象的「功能緯度」，如國家治理能力、國際競爭力、政治體系完善度等以及國家價值觀念，責任感等「標準化緯度」及「美學緯度」從而達到「情感緯度」的生成，達成在他國民眾心中「國家形象」的認同和提升。

但需要強調的是，國家形象的「建構」並非從無到有，而是「強化」及「優化」的過程，必須有強有力的「形」做支撐，才能進行「象」的建構。若連地基都不穩，哪裡來的高樓大廈的建造？到頭來也是豆腐渣工程。

具體來說，國家形象的塑造其實是對於「象」的建構過程。具體來說，則是國家「形」的基礎上，進行「象」的「自我建構」，塑造自己想要外國觀察者感知到的綜合「國家形象」；通過「大眾傳播」以及國家間官方及非官方的外交過程進行「形象」的傳輸，受眾結合個人知識、閱歷、價值觀念等因素對他國形象進行建構，對於該國來說，是形象的「他者建構」過程。



觀察「國家形象」建構的過程，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是可變化的、其二是參與者眾多、其三是多層次性。

今日，隨著國家互動及國際傳播的飛速發展，誰參與「國家形象」的塑造呢？其中包括本國政府確定「國家形象」之內涵。國家間直接接觸過程中，本國外交官與他國外交官進行互動；本國政府參與國際組織開展的事務中；本國政府與他國公民進行直接的「公共外交」；企業之間進行經濟活動等。在傳播方面，本國的官方媒體、新興的自媒體進行本國形象的塑造，相應的他國媒體在這同時也會

進行形象的傳播，其傳播過程方向可能與本國媒體或相同亦或相反，其結果是加強民眾對該國的正向認同或是抑制或狙擊該國正面形象的建構。

其一是可變化性，可分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一）是本國的「自我形象」建構目標的改變；隨著時代的不同，一個國家對自我在國際上希望展現出的形象的要求不同。各國「國家形象」塑造均希望符合國際社會所能接受的價值與期待。<sup>18</sup>因此，國家都以國際準則為塑造國家形象的標準，並對外傳播符合普世價值的良好形象。例如中國在 21 世紀初期希望展現出經濟快速發展形象，而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展現經濟騰飛已經不是首要目標，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則是形象建構的首要重點，國家行為體具有能動性，隨時調整形象建構的方向並進行行動。（二）是國家間互動的不斷變化，基於不同時期，國家間的互動則是不同的。例如中日在上世紀「二戰」後，兩國呈現劍拔弩張的態勢；而進入 21 世紀兩國互動增加而且較平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國首先向日本開展對外援助，提供病毒檢驗試劑。同時國家也會在不同時期會根據形象的變化制定符合其「國家形象」的不同外交政策。（三）是國際傳播的「議題設置」不同。根據新聞報導中希望呈現國家形象的不同，所選擇的「議題框架」，態度以及用詞均不同。所以「形象建構」是一個可變化的動態過程。

### 一．自我建構

國家形象的「內涵」是「建構」的核心，其建構需考慮到「國家實質」以及「普世價值」兩方面。<sup>19</sup>簡單來說，是本國希望對外呈現的明確形象，如美國的“星條旗永不落”、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歐盟的「人權之上」。而中國希望從上世紀的體系制度外的挑戰者，轉變成為制度內負責任的國家，所以近年來也努力建構符合國際期待的「負責任大國」形象。澳大利亞前總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陸克文( Kevin Michael Rudd) 在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上指出：「2014 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後，中國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調整，中國在外交上更為進取，在戰略、經濟和人權領域更為強勢」<sup>20</sup>。「國家形象」內涵的明確，不僅有助於

<sup>18</sup>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頁 322。

<sup>19</sup> 張法，〈國家形象概論〉，《文藝爭鳴》，第 7 期（2008 年），頁 23。

<sup>20</sup> 劉文博，〈“戰疫”期間我國外交形象塑造的轉變傾向——以話語秩序理念為頁 35。

本國國民向心力的增強，形成內部的共識；同時明確了對外強化「國家形象」的方向，向外傳播。

「國家形象」內涵的確定也決定了國家的利益、對外外交政策、對外外交行為以及國際傳播的方向。本國國家形象塑造主體是多面向的。首先，最主要的則是政府，其在塑造國家形象上發揮主導地位：政府代表國家開展政治、經濟等多領域外交，政府於民眾間開展「公共外交」，在外交中展現本國的風采。另外政府通過媒體直接發佈信息，如中國的「政府白皮書」，「藍皮書」等文件，從而對社會大眾進行主流價值觀指引，對國際社會展現本國的政策及優勢。除政府外，本國媒體會通過「國際傳播」渠道進行國家政策、行為的對外宣傳工作，來凸顯本國政策的優越性，讓本國的聲音被傳播出去。有時媒體的作用對於人民比政府來的更有效，因為即時公共外交已經存在，但本國政府與他國一般民眾之間還是存在斷層，無法直接獲取資訊，所以媒介的橋樑作用就顯得尤其重要。本國公民也是塑造國家形象的一部分，他們可以通過自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另外國民在他國的行為舉止也影響他國對這個國家的認知，所以有時一國民眾在國外的不良表現會被媒體大肆報導，從而使得他國對該國產生連帶的不良印象。

## 二·他者建構

「他者建構」體現他國對本國的認同以及從他國角度如何塑造「國家形象」。學者們認為，他國政府、學者、企業、民間組織個人對國家形象的形成和認同至關重要。<sup>21</sup>和「自我建構」一樣，一國的「他者建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時間及特殊事件變化的。學者陳開和指出，911 事件後國際對美國的態度從同情急速下降變為敵意，其國家形象轉變為「自大」、「狂妄虛偽」。2002 年底就美國的形象問題對來自全球 44 個國家 38000 多人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美國的形象比兩年前下降 20%-30%，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只有 4%，在約旦和摩洛哥只有 6%，這說明即使是同一個國家，也會基於不同的時空背景或事件使得他國對其的看法有迅速的轉變，在國際上的國家形象會影響巨大。所以在 2002 年當下，美國政府做了一系列努力，如設立「全球外交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Diplomacy），

<sup>21</sup> 李安山，〈為中國正名：中國的非洲戰略與國家形象〉，《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 期（2008 年），頁 6。



通過傳播渠道，傳遞關於美國的正面信息；各項國際合作與人員交流計劃，出版各種宣傳美國價值觀的圖書、散文集等等，並向國外民眾贈送，從而試圖改變他國對美國的認知。<sup>22</sup>

「他者認知」是反應他國政府、菁英團體及民眾對於一國認知。本國都希望向外釋放良好的國家形象，但因為各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文化背景等固化因素的不同，所以「他者建構」結果並非均能朝著本國期許方向發展。比如對中國來說，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因為本國利益的考量其所塑造出的中國形象一直較差；而作為霸權國家，美國在國際上較有話語權，對其他國家有影響力，並且能夠主導國際輿論的能力，從而掌握了為其他國家設置「國家形象」的權利，並通過美國佔絕對優勢的國際媒體產業傳播出來，並在其他國家中形成資訊的「二次傳播」；正所謂「三人成虎」，往往西方國家依靠自己在國際強大的話語權塑造他國形象，如 2003 年美國發動“倒薩”戰爭前對伊拉克的輿論攻勢，正是如此。

所以，當兩國間並無密切交往時或深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時，民眾就會相信西方國家對該國所建構出的形象而產生偏見。所以國家之間直接外交互動對於「他者建構」過程則尤為重要。直接的交往互動，則可以消除國家間的偏見，避免人云亦云而產生的偏見。而且雖然各國希望能搶佔輿論話語權，讓本國的聲音被世界聽到，但面對西方強大話語權壁壘，短期成效甚微。所以通過外交使得外交形象被樹立，依靠他國替本國發聲，而不是“自說自話”。如此次新冠疫情下，塞爾維亞總統收到救援物資親吻中國國旗一事被全球各大媒體爭相報導亦或是 WHO 召開記者會對中國疫情防控的及時直接讚揚，都是有效的由他者塑造「中國形象」的實例。

---

<sup>22</sup> 陳開和，〈試論政府國際公共關係〉，《國際廣告與跨文化傳播》，第 4 期（2006 年），頁 81-82。

## 第四節、國家形象建構特點

「自我建構」與「他者建構」看似是翹翹板上的兩極，是主體和客體的抗衡過程，其實非也。這兩個過程實際上是通過外交及國際傳播而被有機的連結起來，且不斷改變的。當 A 國塑造其國家形象 T1,並通過國際傳播將其傳播至 BCD 三國。若存在國家 E，其在國際上聲量極大，不斷輸出對 A 的負面形象 T2；若 A 在國際話語權較低，BCD 則容易接受 E 所塑造的 T2 形象；若 A 國因實力增強，聲量也不斷提升，足以與 C 抗衡，且同時與 BCD 國互動，其表現與 T1 相符合，他者建構的形象很有可能從 T2 轉化為 T1。至此，A 國實現「自我建構」和「他者建構」的統一，國家形象提升。

以上是理想的狀態，也有學者提出，「國家形象建構」中的「他者建構」過程較難改變，因為建構的過程是觀念、文化的分配。而文化是自我實現、自我加強的過程：對一國的認知是一種文化，一旦形成，個體就會被這種文化建構，較難改變。但本質上，國際體系中的文化是由國家建構的，所以國家也可以對文化進行分解以及重構。<sup>23</sup>

但需要強調的是，國家形象的重構並非一蹴而就，必須經歷一些階段。負面形象與正面形象無法直接跨越，在實際中也是不現實的。首先必須減少負面形象的國際能見度，或避免負面形象的再次發生；然後再不斷的向正面形象逐漸積累，再國家進入正面形象時，再不斷強化，從而提高正面形象的能見度，國家形象的轉變強調連續性，持續性。在「自我新形象」重構過程中，許多因素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媒體行動是「形象建構」最重要的元素，其次是政府行動和非政府行動。另外，報導客觀性在媒體行動中具有最重大的分量，政府行動中的政府恢復措施的執行和國內外非政府組織援助也是國家形象建構的重要面向。<sup>24</sup>

i

<sup>23</sup>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頁 7-8。

<sup>24</sup> Xue, K., Deng, Y., & Wang, S. What factors influence national image in disaster re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 *Quality and Quantity*, Vol. 49, Iss. 3 (May 2015), pp.1264-1265.

## 第四章 國家形象建構方式：國際傳播

### 第一節、建構主義載體：國際傳播

在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哪國國民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只關心本國所發生的事件，而不關注國際新聞。為了瞭解國際目前局勢，對民眾來說最直接的方式則是通過新聞媒體。所以，「國際傳播」則成為連結國內民眾與國外時事的重要橋樑及紐帶。在國家形象建構上，大眾傳媒十分重要，因為它不僅決定對外宣傳的規模、範圍、力度，更決定輿論的主動權及方向，決定傳播的最終效果。<sup>1</sup>在傳播過程中，新聞的產製不一定中立客觀，媒體可以對事實選擇性報導從而影響受眾的認知，甚至形成操控力，使受眾對他國最終形成媒體所塑造出的「國家印象」。

在網絡未發達時，受眾只能通過本國的媒體瞭解世界。而隨著數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受眾不僅可以通過本國媒體，也可以通過電視、網路得到他國媒體的資訊及新聞報導，並進行判斷，從而選擇性的接收資訊。正因為報導載體以及國家立場的不同，同一個事件不同國家「建構方式」不同，報導內容也會不同。所以，正如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所言，「新聞是建構的現實」。媒體打造的擬態環境影響我們如何認識世界以及他人的互動，媒體可以通過新聞報導進行自我建構同時建構他者，國際傳播則成為建構國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及途徑。

國際傳播中的「自我建構」過程以及由他國進行報導的「他者建構」過程代表著建構主義的兩種視角——「內視角」以及「外視角」。有時可能較為相似；有時可能有所偏差，但何種視角為「真實」，是較難進行評判的，因為在後真相時代，真實是一個完整的圖景，而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呈現出的新聞不同可能是對事件了解不全面的結果。從新聞敘事視角來看，內視角比外視角更貼近真相，限知視角又比全知視角更符合客觀實際，多元視角往往比一元視角更符合平衡報導要求。

---

<sup>1</sup> 李正國，〈國家形象構建:政治傳播及傳媒影響力〉，《現代傳播》，第1期（2006年），頁159。

然而雖然國際傳播在諸多視角下會呈現不同的新聞，然而並非每個國家的傳媒聲音都可以被聽到，佔有更多全球媒體資源的國家，就擁有主導國際輿論話語權的能力，則可以更多的掌握了建構他國形象的權利，而目前國際舞台上的輿論操控權多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sup>1</sup>目前全球傳播領域的新聞，90%以上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所壟斷；電視節目方面，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每年向國外輸出幾十萬小時的節目，而其中美國則控制了全球電視節目生產和製作總量的75%，許多發展中國家約60—80%的電視節目內容來自美國；目前互聯網80%的信息也是由美國提供的，80%以上的網絡用戶也在發達國家。所以發達國家不但可以通過覆蓋全球的國際化媒介將自己的聲音傳播出去，還因為其新聞產值的權威性使得其他國家會將其傳媒產品轉載、轉播，形成內容的「二次傳播」。

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媒介的國內傳播實力最強，等同於美國的89%；然而國際傳播能力和傳播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分別只相當於美國的14%和6.5%，<sup>2</sup>這就體現了中國在國際傳播領域遠落後於西方國家，這就使得西方的聲音和信息可以擴散到更廣大的地區，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地进行着西方國家「自我形象」塑造，同時也塑造別國形象，而中國則因為聲量小而長期處於國際輿論上被動地位。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已經飛速發展，外國民眾對中國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國功夫、長城、京劇等；2003年非典時，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也對中國各地棄養寵物進行深度報導，並播出湖南民眾打死流浪狗影片，被歐美媒體紛紛轉載，一時間中國被世界塑造為吃保育動物，虐待動物的負面「國家形象」。<sup>3</sup>

國際新聞產製特徵是發達國家新聞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國際主流媒體報導向一般性媒體流動，反向流動的情況很少發生。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不僅是美國主流媒體而且也在世界範圍內有重大影響，其傳播地位在西方是無法撼動的，這也是短期內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所以對於中國來說，思考如何與西方媒體互動，借助他者之力進行傳播，制定正確的傳播策略。比如《紐約時報》等媒體若發表一篇中國人權問題的負面文章，在《人民日報》反駁是無

<sup>1</sup> 李安娜，〈後真相時代主流媒體公共安全事件報導策略研究——以新冠肺炎報導為例〉，《新聞研究》，第11卷第18期（2020年），頁81。

<sup>2</sup> 李正國，〈國家形象構建：政治傳播及傳媒影響力〉，頁159。

<sup>3</sup>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頁328。

用的，因為若希望影響美國讀者，還是應從美國的報紙雜誌著手，從美國視角建立好的「中國形象」。

所以在不平等的國際傳播環境下，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若希望被聽到，首先需要提升綜合實力，打造可以獲得更多話語權的通道，不要讓言論淹沒在西方媒體的漩渦中；其次，必須參與到形象設置之中。首先開展「自我形象」建構過程中，主動傳播，同時思考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及新方式，用更生動方式主動展現自我，從而減少誤解以及「他者」視角的報導偏差，從而突破西方「他者建構」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在國際環境下塑造更好的「國家形象」。第三，努力與他國進行外交，利用他國媒體的傳播優勢及廣度，利用他者力量宣傳中國形象。

## 第二節、國家形象的自我建構與宣傳

「國家形象」在廣義上包含一國對自身形象的認知，同時也包含國際體系中他國對該國形象的認知，所以在「國家形象」塑造上，行為者並非單一。但「自我建構」過程十分重要，因為其奠定了在這一時期本國對「自我形象」的基調與期許。「自我建構」是「國家形象」塑造的第一步，建構之後通過國際傳播通路傳播到海外。

「自我形象建構」的方式是多層次、多維度、快速的、有效的。傳播類型可以分為「官方」及「非官方」；傳播手段可分為「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在發生重大事件時，國家是最主要行為體也是最重要的傳播者；國家必須第一時間進行官方消息發佈，從而避免事件發酵以及抑制不實言論產生。官方信息的及時發佈，可以大大減少信息不確定性，減少國家內部民眾恐慌，以此建立信譽，會在客觀上起到輿論引導的作用，不會使得國家陷入被動，也讓外部不實言論沒有可乘之機。

從 1980 年開始，中國的宣傳體系開始區分為「對內宣傳體系」以及「對外宣傳體系」，並且建立獨立官僚系統推動。「中共中央宣傳部」(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CCPD)負責國內宣傳事務，外部宣傳則由「外部宣傳領導小組」(External Propaganda Leading Group, EPLG)負責。「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簡稱國新辦)以及「對外宣傳領導小組」是中國對外宣傳工作龐大系統中的神經中樞和領導機構。它全面規劃了中國的海外「宣傳」工作,分配不同的官僚實體承擔具體任務,實施年度對外宣傳計劃。<sup>4</sup>

美國學者 David Shambaugh 認為中國外宣目標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宣傳中國政府政策以及外交政策;宣傳和平崛起、中國在國內外建立和諧社會的願望、中國不會成為威脅等觀點;對抗有敵意的外國宣傳,如中國威脅論等。<sup>5</sup>

在對外宣傳上,官方政府、官方發言人是重要宣傳主體,官方媒體在本國形象塑造上,其能動性和建構力量也不可小覷。在後真相時代,主流媒體是「把關人」,也是「守望者」,將官方的權威信息多角度的輸送到各個地方。相較於官方的信息發布要求嚴謹且權威,官方主流媒體在報導形式上可以更加多元,以文字,圖片,影音等形式呈現;報導題材上更多樣化,針對國內外閱聽人實際情況,讓本國民眾及海外民眾可以產生更多連結及共鳴。

國內等學者把「政治宣傳管理機構」劃分為「縱向」、「橫向」兩個系統。縱向系統主要有三個層次:中央高層機構,如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地方中層機構,如各省、市、縣的黨委、黨委宣傳部等;基層宣傳機構,如農村鄉鎮、城市街道等基層政權單位的黨委、黨委宣傳部門等。橫向系統中的部門主要有四部分:黨政組織和黨委宣傳部;各類宣傳職能部門;進行政治宣傳活動的業務單位、社會團體和群眾性組織以及社會組織、經濟實體中主管宣傳的部門。<sup>6</sup>

可以看出,中國的宣傳工作的實體機構是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各級管理機構和執行機構組成了黨的宣傳思想工作機構的層級系統。所以對於無論是對外及對內的宣傳上,各級黨組織是宣傳思想機構的主體,所以「黨管宣

---

<sup>4</sup> Diamond, Larry.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Hoover Institution, 2018. Appendix 1, pp.162-163.

<sup>5</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Vol.57(2007), pp.25-58.

<sup>6</sup> 劉李勝,時永松,〈政治宣傳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頁 352-354。

傳」的原則是中國宣傳的方針，具體來說，中央以及地方宣傳出版工作均應受黨的領導，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sup>7</sup>無論是對外的宣傳體系或者是對內的宣傳體系均是在黨管宣傳的框架下進行。

目前中國的傳播媒體有廣播、電視、報紙及通訊社。人民日報( People's Daily )、新華社( Xinhua News Agency )及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China Media Group, CMG )並列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三大傳媒機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RI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China Media Group, CMG )及中國中央電視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組成。CRI 和 CMG 為廣播，共 43 種節目，使用閩南話、廣東話、客家話等向台灣及港澳地區每天播出。

CCTV 為電視台，目前在中國國內有最多收視人群，共有 49 個電視頻道，是目前全球擁有電視頻道數量最多的電視台，同時還有各種語言的國際頻道。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以及中國環球電視網<sup>8</sup> (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CGTN ) 旗下有英、法、西、阿拉伯語、俄語頻道；其中「英語紀錄頻道」在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人民日報》被稱為中國第一大報，在中國國內有廣泛影響力，其中也分為內地版、香港版、海外版以及藏文版，下屬《環球時報》也在 2009 年推出英文版。

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國家通訊社，是中文媒體的主要新聞來源之一。其發布的內部規範也在中國傳媒領域佔據主導作用。新華社還提供實時文字新聞、經濟信息、圖片等。同時會用多種語言發佈稿件。

今年中國十分注重利用官方媒體在海外開展中國國家形象自我宣傳。2016 年 2 月 19 日，主席習近平提出「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優化戰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外宣旗

---

<sup>7</sup> 董興杰，才華 〈中共宣傳思想工作機構建設的歷史考察——以宣傳部系統為例。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CPC publicity institutions〉，《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 1 期（2012 年），頁 143-144。

<sup>8</sup> 中國環球電視網又名中國國際電視台。2017 年更名為「中國環球電視網」，前身為前身為中央電視台英語國際頻道。多語種、多平台媒體集群，它將由 6 個電視頻道、1 個視頻發稿通訊社和新媒體機構等組成，同時擁有北美、非洲及歐洲分台。

艦媒體」。<sup>9</sup>CGTN 也在 2016 年因應而生，被認為是中國媒體影響國際、爭奪國際話語權的又一舉動。CGTN 設立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向外傳播中國形象的渠道，塑造中國更有利的形象，並且藉此淡化中國人權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上的負面形象。<sup>10</sup>

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傳播能力提升，各大媒體對海外報道的原創率、速度、以及頻率都有較大幅度提升，初步扭轉了重大事件中國際輿論完全由西方媒體全面主導的局面。然而由於歷史、文化、政治的多重原因，中國媒體在傳播觀念、傳播技巧、話語體系等方面還是存在明顯劣勢，難以真正擺脫「說了傳不開」的窘境；且傳播聲量無法抗衡西方媒體，導致「說了聽不見」局面，另外西方媒體也對中國海外傳播窗口進行封殺。CGTN 作為中國對外宣傳窗口，是中國自我宣傳重要一環。2020 年 2 月 18 日，CGTN 被美國國務院認定為「外國使團」，將其作為北京當局的「宣傳新聞機構」。並在每時整點和半點在屏幕上打出一行英文藍底白字，提醒觀眾：「該頻道由中國環球電視網資助提供，該機構已被美國國務院認定為「外國使團」。<sup>11</sup>此外，2021 年 2 月 4 日英國媒體監管機關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撤銷 CGTN 在英國及歐洲多國的節目播出執照，因為認為其受中國中產黨控制，違反英國法律。<sup>12</sup>以上都可以看出中國對外宣傳道路困難重重。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網路新聞傳播速度快且資訊豐富，所以民眾越來越傾向於通過網絡新聞平台、社交媒體獲得訊息。在《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20）》中，指出目前居民傾向於通過微信、微博、抖音等渠道獲取信息，50% 以上中國手機用戶裝有新聞客戶端。同時傳統媒體逐漸滲入新興直播領域，積極探索媒體融合發展新模式。這就使得國家自我形象建構上，網路平台也成為不能放過的陣

<sup>9</sup> 張泳，〈習近平訪問官媒 呼籲增強國際話語權〉，*BBC 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2/160219\\_china\\_xi\\_media](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2/160219_china_xi_media)>. (2016 年 2 月 19 日)

<sup>10</sup> Paul Mozur, <Live From America's Capital, a TV Station Run by China's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Times*,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301/cctv-china-usa-propaganda/zh-hant/> (Feb. 28, 2019)

<sup>11</sup> 鄒宗翰，羅法，〈美列中國官媒為「外國使團」有什麼影響？〉，*德國之聲中文網*，  
<<https://www.dw.com/zh/%E7%BE%8E%E5%88%97%E4%B8%AD%E5%9B%BD%E5%AE%98%E5%AA%92%E4%B8%BA%E5%A4%96%E5%9B%BD%E4%BD%BF%E5%9B%A2-%E6%9C%89%E4%BB%80%E4%B9%88%E5%BD%B1%E5%93%8D/a-52427282>> (2020 年 2 月 19 日)

<sup>12</sup> 〈英國通訊管理局 Ofcom 吊銷 CGTN 牌照 中方反應強烈〉，*BBC 中文*，2021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946384>>.



地。習近平也強調：「要推動融合發展，需主動借助新媒體傳播優勢。」<sup>13</sup>。中國央視媒體網路客戶端主要有央視新聞，新華社，人民網。<sup>14</sup>對於海外用戶，除了官方的海外客戶端之外，中國也借助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進行宣傳。

除傳播方式上的不斷多元，自我傳播的形式也需順應時代的發展。學者莊國平曾指出，21世紀初中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海外版70%內容，中央電視台第四頻道60%內容均屬於政治性很強的報導，總給閱聽眾強行灌輸的感覺，其傳遞資訊的接受程度較低。<sup>15</sup>目前傳播內容有了改善，不同於意識形態宣傳，而是側重文化、飲食、中醫、中國經濟的發展等方面向世界介紹中國，努力樹立正面形象。

雖然「國家形象」的評價主體是他國政府以及他國民眾，而他國民眾對於該國的認知更多來自他國媒體，但本國媒體的影響力以及「自我建構」內容可以影響「他者建構」過程。本國媒體可以通過自我宣傳形塑較好「國家形象」，其宣傳效果則取決於宣傳的方式、宣傳的頻率以及媒體聲望以及國際話語權。

除了需主動「自我建構」且豐富宣傳模式外，增加本國媒體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以及該國在國際上的公信力直接影響其宣傳效果。若國家在國際上享有較高話語權以及公信力，「自我建構」的國家形象的傳播效果會更好；反之，若該國的國際上聲量較低，傳媒媒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處於邊緣位置，其自我塑造出的國家形象則不一定會被他國民眾認可。學者劉嫦和任東昇將傳播媒介塑造「國家形象」的過程比做天秤，一國傳媒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地位是加在天秤兩端或重或輕的砝碼：一國傳媒若在國際話語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砝碼就重；一國傳媒若在國際話語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砝碼就輕。重砝碼無論添加在天秤的哪一端，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天秤的傾斜方向。也就是說，一國傳媒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對該國的「自我建構」和「他者建構」都是一大助力，所以一國在豐富傳

<sup>13</sup> 張泳，〈習近平訪問官媒 呼籲增強國際話語權〉，（2016年2月19日）。

<sup>14</sup> 李雪欽，〈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20）出爐短視頻走上發展新賽道〉，人民日報海外版，〈<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20/0805/c1004-31810445.html>〉（2020年8月5日）。

<sup>15</sup>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頁330-331。

播方式同時更需要的是提升其在國際上的公信力以及和努力與他國樹立好的夥伴關係。<sup>16</sup>

### 第三節、他者建構與國家形象認同

「他者建構」指他國媒體建構別國形象的過程。因媒體傳播過程會考慮本國意識形態，所以對「他國形象」建構結果取決於本國政策及態度，對他國的認知以及兩國的利益關係。所以媒體報導會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報道方針，選取自己認為重要的部分並進行加工整理，再用「報道事實」的方式傳遞給受眾。有學者將此稱為「環境再構成作業」(或「議程設置」)。<sup>17</sup>例如一些美國人從兒童時期就形成討厭「俄國人」根深蒂固的觀點，他們相對於俄羅斯的負面形象建構多來自於媒體中對俄羅斯的描述。<sup>18</sup>

在政治傳播形式上可以通過「現實符號化」以及「政治修辭化」實現不同的「議題」以及「形象」塑造。「現實符號化」是指傳播者對某議題向公眾提供若干「符號」及「關鍵詞」，符號的選取將會給公眾提供不同的信息暗示，從而使傳播結果變得有效以及可以預期。「政治修辭化」是利用不同的修辭，將政治信息的內容及思想感情固定化、模式化，以便達到醜化或美化對方的目的。通過對信息的比喻式描述、概念式定性等技巧把各個政治事件與「國家形象」聯繫起來，或者賦予某些事件不同政治含義。<sup>19</sup>所以，國家「他者建構」和「自我建構」是存在偏差的。

但是，「他者建構」存在可變性。國家或該國民眾會根據不同的價值標尺來衡量這個國家，「國家形象」如同在刻度尺上游移。其衡量標準則取決於兩國的交往程度，相互認知以及基於不同時空背景之下。如在 2001 年 911 事件前，各國對美國的國家形象較好，將美國描述為「負責任強國」，而 911 事件前後，多國尤其是穆斯林國家將其描述為「自大」、「狂妄」、「虛偽」的國家。BBC 等國際主流媒體也對美國進行批評。負面的媒體報導使得越來越多國家認為美國應進行檢討，其國家形象在「媒體輿論」中一落千丈。2002 年底，皮尤民調 (Pew

<sup>16</sup> 劉嫻、任東升，對傳媒「自塑」和「他塑」國家形象的價值學思考，《天府新論》，第 4 期 (2014 年 4 月)，頁 130-133。

<sup>17</sup> 劉小燕，〈關於傳媒塑造國家形象的思考〉，頁 70。

<sup>18</sup> 楊巧燕，〈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以《紐約時報》為例〉，頁 31-33。

<sup>19</sup> 李正國，〈國家形象構建:政治傳播及傳媒影響力〉，頁 158-159。

Research) 就美国的形象问题对来自全球 44 个国家的 38000 進行調查，都反映出美國國家形象下降的趨勢。約旦對美國反感度高達 65%，即使是美國的盟國，其民眾對美國好感度也有所下降。<sup>20</sup>

在國際社會中，「他者建構」除了取決於本國的意識形態，還取決於兩國的關係及互動。比如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因為近年來交往越來越密切，關係逐漸深化，所以對中國的印象也產生改變，從最初的「合作」逐漸走向「夥伴」關係。所以當兩國通過互動和交往，改善對雙方的認知時，他國則更容易接受該國自我建構的「國家形象」，同時對於該國的認知會朝著對其更有利的方向邁進。反之，若兩國關係較為緊張，該國則不會接受其「自我建構」的形象，而是朝著有利於本國利益情況建構，結果多是與事實不符。所以，「自我建構」和「他者建構」並非「零和關係」也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通過互動加以影響的，有所改變的。

#### 第四節、小結

國家形象的塑造要求兼顧國家的「自我建構」和「他者建構」兩方面，形象「自我建構」需要大眾傳媒進行「自我發聲」，二者是無法分開的。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傳播現況及未來方向，筆者通過此章有以下總結。

國家「自我形象」的國際宣傳固然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的客觀實力是形象建構的基石，如果客觀的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國內民眾「怨聲載道」，民不聊生，其塑造的國家形象不會令人信服，那麼多麼高超的自我宣傳都無法達到其效果。另外塑造的國家形象必須符合國際規範、道德標準如「反對戰爭」，「維護和平」。在國家形象傳播上不能偏離這些原則標準，同時利用國際傳媒一齊發力時，才有可能達其效果。

在傳播方法上，國家需要及時、準確傳播信息，以此建立信譽客觀上起到輿論引導作用；二是緊跟熱點問題，積極主動發聲，充分表達國家看法；三是在全球化環境下，宣傳手段也不侷限於大眾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也應一齊發力，

---

<sup>20</sup> 同上。

如通過網路力量、社群傳媒；菁英團體、國際組織；專家學者等，立體的全方位的與他國互動，展現本國的優勢以及形象。正所謂「做得好也要說的好」，以此讓他國民眾了解本國的樣貌和形態。

「他者建構」方面，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需認清國際傳播不平衡的問題，與主流媒體接觸及交流，適時借助國外的媒體力量說話講出「中國故事」。另外在本國媒體自我宣傳同時，可以引導他國媒體進行轉載形成反向「二次傳播」，實現聲音的擴散。另外，「他者建構」主體也不侷限於傳媒，可以通過「雙邊外交」與他國政府進行互動；通過「多邊外交」參與各類型國際組織、國際會議；通過「公眾外交」與他國民眾多互動。在這更直接的互動交往中增進國家間政府關係、民眾瞭解，增加國際的公信力，獲得更多認同，則可減輕西方議題設置造成的偏見影響，從而達到提升該國在國際上的「國家形象」之目的。

ii



## 第五章 新冠疫情下中國形象塑造：自我建構

新冠疫情，對各國的「疫情外交」都是重大考驗。然而西方及東方在此次新冠疫情應對上方法及態度不同。美國作為「衛生外交」大國，此次做法卻讓人陳目結舌，川普在應對疫情方面進一步「後退」，《紐約時報》報道稱：美國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以及 2014 年伊波拉疫情做到表率，受到「盟友」甚至「敵人」的感激，而這次美國已經放棄其在衛生領域的領導地位。<sup>1</sup>

作為當今國際強權，美國本應發揮全球領導力來協調全球抗疫行動，然而卻退回到「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也折損美國在該領域的「國家形象」。<sup>2</sup>學者晉繼勇認為，更嚴重的是，當霸權國既無能力、又無意願維護全球衛生安全體系時，全球衛生治理體系面臨著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 的風險，國際秩序將出現混亂。<sup>3</sup>所以擔當維護「衛生安全體系」之國家的出現在此時期是重要且必須的。

相較於美國，中國在此次新冠疫情下的「疫情外交」確實呈現出以上特點，中國外交理念以及外交實踐從「國家核心利益」轉向強調「人類共同利益」；外交目的也並非傳統的國家間的互動，而是更高層次的藉由多國合作幫助解決全球所應對的疫情危機，甚至在疫情之後，幫助他國面對疫情所帶來的衝擊。

### 第一節、外交目標：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

在此次新冠疫情下，中國開展「疫情外交」的外交政策是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原則，外交核心與目標則是中國「負責任且有擔當」的大國形象。

---

<sup>1</sup> Steven Erlanger, "Another Virus Victim: The U.S. as a Global Leader in a Time of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0/world/europe/trump-leadership-coronavirus-united-states.html>> (March 20, 2020)

<sup>2</sup> 張清敏，〈新冠肺炎疫情與全球衛生外交〉，《當代世界》，（2020 年 4 月），頁 37。

<sup>3</sup> 晉繼勇，〈全球衛生治理的「金德爾伯格陷阱」與中國的戰略應對〉，《國際展望》，第 4 期（2020 年），頁 44。

「負責任大國」形象並非中國在此次新冠疫情下首次提出，而是中國一直希望在國際樹立的目標。在二十世紀末發生的國際性金融危機時，面對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同樣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給當時中國的外貿出口等帶來較大的壓力，在經濟上也造成一定影響。但同時，此舉也在國際社會樹立起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良好形象，為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迅速的騰飛以及國際間合作打下基礎。所以「以史為鑒」，「負責任大國形象」符合國際規範以及國際認同，此形象的樹立可以增加國家互相信賴程度，以此增加國際間的合作意願。在此次疫情下，美國不斷奉行「單邊主義」，「美國至上」原則，拋開其他國家於不顧之下，中國「負責任形象」建構尤為重要，和美國形成鮮明對比，也能獲得更多認同。

另外，中國此次挑起「負責任大國」重擔，在並非中國的「一廂情願」，客觀層面上也是為了解決當下全球衛生治理協調機制的缺位。新冠疫情爆發當下，作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美國，應該在疫情治理中發揮領導力，提供全球衛生「公共財」，協調全球抗疫行動。然而美國卻退回到「孤立主義」以及「單邊主義」之中，不僅向東歐及亞歐國家施壓，要求其生產並向美國出口相關醫療防護設備；同時還試圖向德國一家製藥公司購買對抗新冠病毒疫苗的專利權，意圖將疫苗這種公共產品私有化。<sup>4</sup>不僅如此，還在2020年4月停止對WHO的全部資助，並退出WHO。學者晉繼勇認為，當霸權國無能力也沒有意願維護全球衛生安全體系時，全球衛生將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國際衛生體系將失序，所以必須有一行為體願意發揮其全球領導力，然而疫情發生當下，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失語；二十國集團（G20）的全球治理功能失靈；金磚國家的全球領導力尚未形成都讓「金德爾伯格」陷阱加劇。<sup>5</sup>中國雖還不具備領跑衛生領域的能力，但在危難之時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援及協作，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全球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也是大勢所需。

在「負責任大國」形象上，主要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中國對本國國民「生命權」的重視，是積極應對疫情的「實幹者」；勇於承擔大國責任，積極參加並主

<sup>4</sup> 〈德媒爆川普搶購武漢肺炎疫苗專利 美官員批報導誇大〉，法新社，2020年3月16日。

<sup>5</sup> 晉繼勇，〈全球衛生治理的「金德爾伯格陷阱」與中國的戰略應對〉，《國際展望》，第4期（2020年），頁42-45。

導多邊會議，是無私分享抗疫經驗的「貢獻者」；提供人道主義救援，參與疫苗研發並將其作為國際公共財的「援助者」；在後疫情時代繼續支持WTO、並參與建立全球衛生體制的「保障者」。一系列形象的建構很好的體現了中國對「負責任大國」的詮釋，以及回應了國際對中國作為大國的期待。

## 第二節、對外政策：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冠疫情將中國推向世界聚光燈下，全世界再次開始審視中國行動力以及中國價值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從2013年開始推行的價值理念，目的是突破西方傳統意識中一成不變的話語框架，在世界發展新態勢中鼓勵世界各國求同存異，打造由中國提出的話語優勢。新冠疫情的爆發，是中國通過具有說服力的「疫情外交」建構並通過國際傳播宣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機遇。學者程曼麗認為，無論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如何，在它由弱向強轉變的時候，都伴隨著逐漸被認可的過程。在被認知的過程中，思想的開掘、話語的提升和理論的建構不可缺少。<sup>6</sup>

###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核心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首次提出，其內涵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地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2017年12月1日，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再一次提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國人民前途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強調，「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四個重點：「建設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設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建設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建設一個山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sup>7</sup>可以看出中國期望將其「命運共同體」價值觀構建於國家安全上的守望相助、全球經濟的合作共贏、人類價值取向的平等互信、以

<sup>6</sup> 程曼麗，〈談中國特色國際傳播理論體系的構建〉，《現代視聽》，12月（2020年），頁88。

<sup>7</sup> 趙成、杜一菲、楊迅，〈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人民網，

<<http://dangjian.people.com.cn/BIG5/n1/2017/12/04/c117092-29683581.html>>（2017年12月4日）。

及自然環境上的多元共構、有機一體，以整體性、普遍聯繫性和多元對話性的思維來認識世界。<sup>8</sup>許多國家首腦也慢慢接受共同體理念，並加以解讀，義大利前總統普羅迪表示，「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存的時代。儘管意識形態不同、政治格局不同，但我們是一個共同體。」<sup>9</sup>

## 二· 新冠疫情是「命運共同體」理念推行的機遇

「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多年，落實於中國諸多對外實踐中，如「一帶一路」國家「經濟共同體」、「區域命運共同體」等。雖國家利益考量逐步被多國政府認可，但其理念卻很少影響他國民眾，因為其理念背後顯示的其實是思維方式的不同，而中西方的意識形態差異較大且沒有相似的時空背景所以很難將中國理念推行至西方。

而此次面臨新冠疫情這樣的全球性危機時，樹立「命運共同體」價值觀重要性凸顯。疫情當下，要求全世界團結、合作、共建、共享、共同渡過難關，這些行為的理論源泉就是「命運共同體」價值觀。所以「命運共同體」價值觀也因為疫情的全球性被世界各國更深入理解及實踐。

在新冠疫情下，「命運共同體」在理念上是突破西方傳統價值觀的束縛，在世界發展新態勢中為全世界打造強調「整體性」，「普遍聯繫性」，「多元對話思維」的人類共同抗疫價值觀。「整體性」，強調疫情當下，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相聯繫，國家命運與全球化命運相連的整體理念，要求人民在國家利益面前先以國家作為考量。二是普遍聯繫性，強調了「沒有誰是一座孤島」，各國需要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多元對話思維」，要求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的通力合作及對話，這加強了疫情治理的國家間的交流以及交往，而非一國獨大的「單邊主義」思維。<sup>10</sup>

對中國來說，此次疫情是實現「命運共同體」價值觀凝聚和認同的契機，中國也應該以「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開展中國的「疫情外交」及對外宣傳以達到

<sup>8</sup> 袁靖華，〈建設共同體話語：後疫情時代國際傳播的思維與路徑〉，對外傳播，第6期（2020），頁57。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袁靖華，〈建設共同體話語：後疫情時代國際傳播的思維與路徑〉，頁57-58。



理論強化。從目前國家實踐看，中國確實進行這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三· 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在此次新冠疫情給推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歷史性的機會。該理念廣泛體現在中國實踐的各方面，也因中國「言行合一」被越來越多國家接受。所以樹立全球化理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核心價值觀不僅符合國際價值觀也是中國的國家戰略的考量，對中國有以下幾個重大意義：推動中國向「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邁進，破除美國「霸權主義」壟斷話語權，與全世界各國形成「利益共同體」，佔據道德制高點，改善中國國家形象；和西方國家民眾產生共鳴。

#### （一）符合國際價值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形態界限，著眼於國際社會和平、發展、合作大局，符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成員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原則。<sup>11</sup>所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人類社會為一個整體」的價值觀。在當今世界不斷的調整，國家風險日益增多、傳染病全球化傳播、危機四伏的情況下，這一價值觀意義尤顯重大，因為許多問題已經不是一國可以獨自應對，也很難獨善其身。其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框架，有助於全世界人民放下歷史的包袱，國家間的分歧，攜手面對疫情考驗。<sup>12</sup>

#### （二）破除「霸權主義」壟斷話語權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一直掌握主導國際的話語權的能力。中國為了破除「霸權主義」、「孤立主義」主導的國際壟斷話語，需要建設由中國所提出的更具普適性和更高認可度的合作共享型國際話語體系。<sup>13</sup>所以「命運共同體」強調的「多邊主義」、「人類休戚與共」與美國的「單邊主義」及「美國優先」意識形態上呈現抗衡。另外，此理念也對抗以西方「以人為本，人民至上」的西方民主價值觀取向，通過疫情之中中國管控的到位，形塑「社會主義制度」優於「民主制度」，

<sup>11</sup> 袁靖華，〈建設共同體話語：後疫情時代國際傳播的思維與路徑〉，頁 59。

<sup>12</sup> 程曼麗，「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對外傳播，現代視聽，第 6 期（2020），頁 83。

<sup>13</sup> 袁靖華，〈建設共同體話語：後疫情時代國際傳播的思維與路徑〉，頁 57。

人民應該以國家為重的理念。西方一直認為中國對人權問題予以打壓，並將疫情時的「封城」也解讀為對人權的侵犯，中國借助疫情，將「人民在危難面前以國家為重，國家以世界為重」與對人「生命權」的尊重進行連結。筆者認為這是潛移默化的淡化西方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負評，重新利用疫情建構「人權」的定義，從而降低中國的負面形象。

### （三）建立共同利益感

「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解讀為國家間的「利益共同體」，這裡的「利益」並非狹義上的金錢，而是多方面的國家所獲得的好處，比如疫情快速的控制，經濟早日復甦，政權穩定等。疫情中的從政治家到學者的多方互動，國家間外交到公共外交的展開，這些交流合作行為使得各國疫情得到有效緩解，各行為體因踐行「共同體」的思維方式獲得好的成效，從而形成「共同利益感」，以此激發各合作夥伴更願意共同發聲，共同表達關切，共商解決難題的意願。

### （四）道理制高點，建立好的國家形象

此次國際普遍認為，美國在新冠上退回到「孤立主義」，「退縮主義」，認為其沒有履行大國責任。同時，也拋棄了其盟友，讓各國失望。而「命運共同體」建立則是呼籲在最危難時候全球攜手共進。在此時此刻，這是全球的共同心願，在道德上佔據了制高點也會被更加認可。從建構主義角度看，一國在被全球認可的過程中，價值觀的認同有助於他國對本國的形象建構，佔據道德制高點則有助於他國的認同與想法。長遠來看，此價值觀的深入，有助於提升中國與世界的全球溝通力，擺脫西方霸權的輿論擠壓，從根本上扭轉國際話語權失衡；並且通過與「命運共同體」理念所統一的國家行為，增強國際認同及「國家形象」塑造。

## 四．「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新冠疫情成效

根據《Foreign Policy》2021年5月對982位國際關係學者進行調查，92.6%學者認為美國沒有在全球危機中提供公共財；對於提供國際援助，9成以上的的學者們認為美國不應該以「美國優先」的自私想法為考量，而是應該提供國際援助；其

中93.3%學者認為應提供經濟援助，97.6%認為提供國際衛生援助十分必要且迫切，可以看出全世界互幫互助的思想已經因為疫情深植於人民心中。<sup>14</sup>

此外，「命運共同體」理念確實影響他國民眾。哈薩克斯坦歌手迪瑪希·庫達依別列根（Dimash Kudaibergen）演唱的全球第一部原創抗疫英文音樂短片《在一起》（We Are One）在美國影片分享網站油管（Youtube）獲好評，48小時引來1.5億人次觀看，各國樂評人轉發、評論。世衛組織聯手美國歌星卡卡（Lady Gaga）及130多位重量級巨星在各大社交媒體同時演唱「四海聚一家」（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sup>15</sup>在全球反響熱烈。這些數據以及實例，反映出世界越來越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中國形象」認同及改變有積極作用。

### 第三節、外交形象建構：為中國抗疫主動發聲

#### 一、官方第一時間發佈信息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處理外交問題是對外建構自我的過程，而對國內疫情的控制，第一時間滿足國內民眾的疫情現況知情權，從而保障社會安定，因為信息的短缺或盲區會帶來社會恐慌或者人心的不安，也會為謠言四起提供溫床。

在疫情這種公共危機發生之時，官方信息的主體必須是政府，因為媒體固然有新聞報導以及輿論監督的職責，但媒體沒有權威性的信息源，其報導很大程度上會存在修飾，可能會造成恐慌。所以在疫情發生當下，政府需及時發佈信息，但需要做到「有控制開放信息源」，舉辦新聞發佈會，向國內以及國際發佈信息，滿足全球公眾的知情權。<sup>16</sup>

#### （一）避免重蹈 SARS 覆轍

此次疫情中國汲取了2003年非典疫情政府「完全封閉信息源」所造成的國內恐慌，國外職責的信任危機。2003年1月中國廣東地區非典疫情慢慢出現，截止到2月11日，廣東已有305例案例，但在當下廣東話媒體以及政府均保持沈

<sup>14</sup> Emily Jackson, et. al., “Snap Poll: What Foreign Policy Experts Make of Trump’s Coronavirus Respons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8/snap-poll-what-foreign-policy-experts-think-trump-coronavirus-response-election/>> (May 8, 2020)

<sup>15</sup> 袁靖華，〈建設共同體話語：後疫情時代國際傳播的思維與路徑〉，頁59。

<sup>16</sup> 程曼麗，〈災害中的政府輿論管理〉，國際公關，第4期（2008年），頁88。

默，這使得信息源完全被封閉，這兩個月政府的「失語」情況，未對疫情消息管控起到積極作用，反而造成謠言滿天，誤導了民眾，引發了搶購白醋、板藍根等風潮。<sup>17</sup>政府也面對較大輿論壓力，而且一度掩蓋使得全國疫情擴散，國家形象受到極大影響。相反，4月下旬隨著官方信息發佈，治理措施透明，政府行為被置於公眾監督之下，民眾情緒才日趨平穩。從非典疫情中的經驗教訓可以看出，政府客觀官方信息發佈以及政府的有效防疫措施是穩定國內社會以及外部輿論的關鍵。

所以在疫情發生下，政府需要第一時間做到開放「有控制信息源」，不能「完全封閉信息源」也要規避信息源「無控制開放」，使一些假訊息流傳，或是爆炸增長的信息量也會造成恐慌。而是利用政府的權威信息源優勢，通過調度媒體及時發佈信息，傳達政府的抗疫指令以及措施，從最開始掌控輿論方向。同時建立完善信息發佈制度，在最快時間發佈政府官方信息，回應民眾關切問題。信息的發佈需要建立嚴格且完善疫情發佈機制、建立分級分層新聞的發佈制度、以及利用多平台發佈以及傳播信息。<sup>18</sup>

## （二）內外新聞發佈及時 內容呈現客觀

自2020年1月20日至5月31日，外交部共舉行約82場例行記者會，對疫情有關情況作出答復回應。截至到2020年5月15日，國家層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共舉辦約161場，其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新聞發佈會21場。地方層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共舉辦約1120場，其中北京佔105場、上海78場、湖北96場、其他省份共572場。<sup>19</sup>

除了對國內媒體，對國外媒體從1月16日就召開了「對外媒體記者會」，同時外國記者可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問及疫情，這期間共回答中外媒體1400多個提問。此外除了召開記者會，中國政府也積極向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有關國家通報相關疫情信息，保持著密切溝通。

## （三）建立疫情發佈機制 多渠道傳播信息

<sup>17</sup> 夏倩芳、葉曉華，〈從失語到喧嘩：2003年2月～5月國內媒體“SARS危機”報道跟蹤〉，《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期（2003年），頁57-58。

<sup>18</sup>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頁16-17。

<sup>19</sup> 同上，頁17。

中國政府從2019年12月31日起就開始發佈疫情相關信息，並逐步增加信息發佈次數。2020年1月21日起，「國家衛生健康委」在官方網站、政務新媒體平台每日發佈前一日的全國疫情信息，各省衛健部門在每天同一時間也發佈前日本省疫情信息。<sup>20</sup>

2月3日起，衛健委設立中英文官方網站、並在政務新媒體平台疫情時時發佈每日疫情信息、解讀防疫政策措施、報告防疫進展、同時澄清謠言。<sup>21</sup>通過政府疫情信息的發佈使得媒體可以有官方數據、官方信息源作為新聞消息來源，加強社會及國外媒體的輿論引導，防止資訊的不透明而讓國內外媒體產生胡亂猜測，同時向各媒體提供抗疫的正向的素材。

## 二·多角度多平台 講好中國故事

### (一)「軟新聞」產生更多共鳴

僅管中國在世界上知名度已經提升，但西方世界對中國存在的結構性無知以及誤解仍存在，在此次新冠疫情下因為政治性而產生的中西方政治抗衡不斷加劇。

中國第一家全數字英文媒體網站「第六聲」(Sixth Tone)服務於海外讀者，官方政治形態較弱，主要是向國際讀者科普今天的中國，在海外讀者中接受度較高。在疫情期間，也積極投入於「講好中國故事」的陣營之中。然而不同於其他官方外宣媒體多側重疫情數據以及疫情現況，「第六聲」則是將其關注點聚焦在人與疫情中的故事，推出「看點稿」及「普通人報導」。報導聚焦疫情最相關的人如武漢病患、醫護人員、在武漢封城期間的民眾、民間志願者團隊等，用西方最熟悉的語言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以求國際讀者比較容易感同身受。這樣的「軟新聞」在海外獲得成效。在疫情爆發初期的短短一個月內，在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兩大國際社交網絡上的總覆蓋量達到了 1054 萬，互動量達到了 301 萬。臉書互動率增長 330%，推特覆蓋率增長 151.4%。<sup>22</sup>

<sup>20</sup> 同上，頁 16。

<sup>21</sup> 同上，頁 17。

<sup>22</sup> 吳海雲，〈堅持與應變—英語媒體網站「第六聲」的抗疫報道〉，對外傳播，第 5 期(2020 年)，頁 36-37。

這說明西方對於中國發生的新冠疫情在初期就呈現較高關注度，而且通過人物特寫的「軟新聞」首先因其意識形態不明顯，從而增進讀者間的親密度；其次滿足讀者獵奇心理，因具有人與人的連結更容易產生共情，從而增加西方對中國疫情期間民眾所作所為的瞭解，更多的瞭解可以減少因無知而產生的敵對情緒，潛移默化改變其對中態度。是疫情中「注重實效」的外宣方式。

## （二）影音報導

中國對外宣傳一直面臨的問題是缺乏感染力。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宣傳工作不僅要做到「內外有別」，而且要明確「中國故事能否講好，關鍵是要看受眾是否願意聽，能否產生良性互動和更多共鳴。」<sup>23</sup>

此次抗疫過程中，中國借助「短視頻」及「動畫」進行中國「自我形象」塑造手段。為講好中國抗疫故事，「國家廣電總局」國際合作司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以「守望相助、共同戰疫」為主題推出中外聯合抗疫系列短視頻，包含「中韓鄰裡情，肝膽兩相照」、「親情中法，因愛同行」等10集，並通過境外電視台、網路平台、推特等社交媒體渠道播出，中國駐相關國家使領館在其網站和臉書、推特賬號也發布推廣。<sup>24</sup>

4月30日「新華社」推特推出動畫「病毒往事：中美疫情對話」(Once upon a Virus)，以卡通動畫「兵馬俑」與「自由女神代表中美，講述中國積極抗疫，且提醒美國防範新冠病毒，但美方先是傲慢地無視勸告，等到疫情失控又攻擊中國以推卸責任的故事。這條動畫短片，一經播出迅速走紅推特、臉書等各大海外社交媒體平台。截至5月10日，在「新華社」海外社交媒體平台賬號，總瀏覽量就達到697萬人次，臉書瀏覽量92萬人次，在推特平台，此視頻互動量高達131萬人次，轉發2.5萬人次，點贊近5萬人次，評論超過6500條。<sup>25</sup>有中國網友笑稱「幹得漂亮，這才是外宣應有的樣子」，獲得2.4萬次讚。美國網友說，「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看到這個動畫一點也不生氣，我真心希望這個視頻能讓我們的官員感到羞恥。」

<sup>23</sup> 〈做好宣傳思想工作，習近平提出要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8/0821/c164113-30242126.html>> (2018年8月21日)。

<sup>24</sup> 〈守望相助，共同戰疫 中外聯合抗疫短視頻引關注〉，人民網，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20/0513/c14677-31707028.html>> (2020年5月13日)

<sup>25</sup> 楊定都，黎藜，〈把故事講好—《病毒往事》動畫走紅海外社交媒體的啟示〉，對外傳播，第7期(2020年)，頁68-69。

此動畫還獲得了西方主流媒體反向「二次傳播」的效果。《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CNN、法國《費加羅報》紛紛跟進報道，引發大量轉發和討論。路透社以及拉美部分國家媒體還希望購買此動畫片版權。<sup>26</sup>以此借助了西方主流媒介將中國想講的故事傳播的更遠也更增強其效果。

不同以往，目前中國的「自我形象」建構的形式更加多樣且兼顧新媒體的傳播屬性，以短視頻形式獲得短時間的大範圍覆蓋。風格上也以動畫為載體，在「趣」上做文章，將西方對中國的污名化言論以自我調侃方式展現，方式上的創新收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另外，其動畫播出的時間節點為2020年5月，當時疫情已經在全世界爆發，美國已經出現確診病例而且每日新增人數持續增加，5月10日新增人數為1萬9千人，<sup>27</sup>而美國政府在當時並未提出有效措施應對疫情。所以在此時間點上，美國國內民眾及他國都對美國的不作為已經感到失望，美國所捏造的謊言以及建構出中國的負面形象也越發站不住腳，所以在當下該動畫則是對污名化的最好及最及時回擊。

### （三）《大國戰「疫」》圖書出版

中國此次也出版圖書進行「自我形象」宣傳，但效果不佳甚至形成反效果。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出版《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一書，預計於2020年3月在中國大陸上架。全書10萬余字，是目前國內外第一本跟進式介紹中國疫情防控階段性工作的多文版圖書，也預期出版英、法、西、俄、阿等五種語言文字版本。

據新華網2月26日報導，本書從200余萬字主流媒體公開報道中精選相關素材、有機整合編繪。本書呈現以下幾個重點：「反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為大國領袖的為民情懷、使命擔當、戰略遠見和卓越領導力；介紹中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緊急動員、齊心協力，打響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階段性進展和積極向好態勢，彰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

<sup>26</sup> 同上。

<sup>27</sup> 〈美國 COVID-19 疫情每日統計圖〉， NCHC，  
<[https://covid-19.nchc.org.tw/dt\\_002-csse\\_covid\\_19\\_daily\\_reports\\_city\\_unique\\_mycountry.php?countryCode=US/%E7%BE%8E%E5%9C%8B](https://covid-19.nchc.org.tw/dt_002-csse_covid_19_daily_reports_city_unique_mycountry.php?countryCode=US/%E7%BE%8E%E5%9C%8B)>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展現中國積極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維護全球和地區公共衛生安全的巨大努力。」<sup>28</sup>

此書預發售信息傳出，並未受到全世界甚至國內人民的喜愛，甚至遭到人民抵制以及外國媒體大肆報導，認為在疫情未結束之時，此做法十分不妥當。<sup>29</sup>未防止民眾情緒反彈，此書於3月1日下架，這本弘揚中國疫情的圖書最終以僅僅上架4天的「鬧劇」收場。

筆者認為，這可以反映出中國自我宣傳目前存在的問題。自我宣傳是從內視角講好中國故事，呈現抗疫進程。但，對外宣傳應做到「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首先，內宣時間性十分重要，急功近利，錯誤掌控宣傳的時間可能適得其反，在疫情還處在不明朗階段，民眾更期待更專業的知識解答以及更客觀的消息，而非具有「個人崇拜」色彩的「歌功頌德」。另外，我們可以看出，所有外宣都需要有客觀事實相輔助，雖然3月中國已經清0，但是國內疫情還未結束，國外疫情抬頭，民眾還處於緊繃狀態，其宣傳內容和民眾所認知的疫情現況不符合，所以民眾無法產生共情共感，也無法接受。另外，中國對於防疫工作的宣傳逐漸出現「大國戰疫」個人化趨勢，一方面雖然體現了領袖的領導力及個人魅力，但抗疫並非一己之力，以長遠來看疫情宣傳「個人化」可能會造成國內外的相反宣傳效果。

### 三·對負面輿論正面回擊

輿情是國際政治走向的風向標，而西方對於中國的形象設置一直較負面，例如對於「一帶一路」建設對非洲援助被認為是「新殖民主義」，中國經濟的崛起被稱為「中國威脅論」，使得中國一直處於輿論漩渦之中，而且由於東西方不平等的傳播聲量及影響力度，西方在輿論中佔據高位。

此次疫情之中，西方對於中國的污名化分為以下四種：「病毒源頭說」，將疫情爆發「甩鍋」給中國；二是「數據隱瞞說」，妄稱中國數據的造假；「東亞病

<sup>28</sup> 〈《大國戰「疫」》近期出版〉，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26/c\\_1125627516.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26/c_1125627516.htm)（2020年2月26日）

<sup>29</sup> 〈大國戰役〉，法新社，<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0229-%E5%A4%A7%E5%9C%8B%E6%88%B0%E7%96%AB>（2020年2月29日）



夫說」，醜化整個民族形象；「政治物資論」，認為中國的救援有明顯的政治目的。<sup>30</sup>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話來說，「新冠疫情期間，不斷傳播的虛假信息也是我們的敵人」。

而此次新冠疫情下，面對西方的負面指控，中國打破了以往「貴人語遲」的傳統，打破對於中國「安靜外交」的固有印象，逐漸敢說話、先說話。其中一大轉變就是對於污名化態度強硬，對於西方的不實指控提出嚴重交涉。

2020年2月26日，「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就《華爾街日報》發表辱華標題文「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提出強烈警告。<sup>31</sup>華春瑩指出，「《華爾街日報》的錯誤是嚴重的，該報必須為此承擔責任。美方無理冒犯、挑釁中方在先，中方正當防衛在後。」<sup>32</sup>而後又對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三家媒體提出交涉，態度十分強硬。

《環球時報》也在2月4日發出題為「誰造謠誰舉證，請BBC拿出證據」的社評，批評BBC的報導「極其聳動」，但卻「沒有任何對那些描述的佐證」。<sup>33</sup>此篇文章被紐約時報等國際較有話語權報紙轉載。

2020年5月9日在外交部網站發佈官方文件《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列舉了美國對中國的24項指控，並一一用事實進行佐證與回應。<sup>34</sup>這是中國首次如此強硬的回應西方的言論，中方也表示若有新的謊言出現將會繼續告世人以真相。此文件一發出，不僅獲得國內官方媒體轉載報導、網路上討論熱度也極大，民眾紛紛回覆，「解氣，爽快，這才是大國有的樣子。」國外主流媒體也跟進報導。

除了在官方平台上對西方指控進行回應，中國的政府發言人也接受外國採訪，通過外國的媒體渠道矯正中國的形象。2020年4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

<sup>30</sup> 張生祥，〈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對策分析〉，對外傳播，第10期（2020），頁17-19。

<sup>31</sup> Mead, Walter Russell.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WSJ,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Feb 2,2020).

<sup>32</sup> 〈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就美官方為《華爾街日報》發表辱華標題文章張日向美方提出交涉〉，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49761.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49761.shtml)>（2020年2月26日。）

<sup>33</sup> 〈社評：誰造謠誰舉證，請BBC拿出證據〉，環球時報，<<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1nUM0pR8X1>>（2021-02-04）

<sup>34</sup> 〈美國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外交部，2020年5月9日。

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電視專訪時，針對外界質疑中國刻意隱瞞疫情數據進行回擊，並且表示：「有的國家把新冠肺炎說成是流感，這才是隱瞞。」<sup>35</sup>

#### 四·利用社群媒體——推特

在全球信息傳播的新媒體浪潮下，每個人都使用社群媒體。社群媒體使得個體、機構、社群、企業、政府都可以表達自我，個體的多樣性則會呈現出不同的特徵——理性的自我，情緒性的，個人化的或是權威性的。<sup>36</sup>不同類型的「自我」能夠通過網路引發「群聚效應」，引發對議題的討論及事件的快速發酵，正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次新冠疫情是社群媒體全面滲透的過程，我們甚至進入「信息比病毒傳播的快」的新媒體時代。世界衛生組織甚至將其稱為「信息疫情」。<sup>37</sup>

自媒體在全球公共危機事件處理中是一把「雙刃劍」。民眾對現況的恐慌，情緒的堆積與壓力釋放需要窗口使得自媒體在疫情時爆發式傳播，使其成為多元觀點集散平台。在中國國內社群媒體上，有「騰訊醫生」，「丁香醫生」等微信公眾號，「新華網」等權威媒體公眾號，每日分享疫情信息和權威知識。在海外社交媒體上，臉書、推特、油管，俄羅斯知名社群網站「Vkontakte」也成為輿論競技場。社群媒體帶來的資訊多樣化，其個人化聲音被大量展現，也成為此次幫助中國消除「污名化」以及「自我形象建構」的重要推手。

##### （一）TWITTER: 疫情話語權高地

目前傳統外交受到諸多的挑戰，利用社群媒體開展外交成為新外交思維。中國的微博（Weibo），美國的推特以及臉書在國際傳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希拉蕊前辦公室主任謝麗爾·米爾斯（Cheryl Mills）曾表示：「在外交新時代，運用

<sup>35</sup> 〈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實錄〉，外交部，2020年4月30日。

<sup>36</sup> 張毓強，〈信息失序與溝通可能：疫情中的中國與世界自媒體景觀〉，《對外傳播》，2020年5月，頁53。

<sup>37</sup> 「信息疫情」：指疾病暴發期間在數字和物理環境中的過多信息，包括虛假或誤導性信息。它引起混亂和冒險行為，可能危害健康。它還導致對衛生當局的不信任，並破壞公共衛生對策。當人們不確定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來保護自己的健康以及周圍人們的健康時，信息病會加劇或延長爆發時間。隨著數字化的發展（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使用的擴展），信息可以更快地傳播。這可以幫助更快地填補信息空白，但也可以放大有害消息。

Infodem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infodemic#tab=tab\\_1](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infodemic#tab=tab_1)>

社群媒體是關鍵。利用社群媒體發揮美國外交巧實力並擴大交流，對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目標至關重要。」「美國駐華大使館」2010年5月21日在新浪微博開通微博賬號，比中國外交部官方微博早了近一年，截止到2021年4月，其微博已有近297萬粉絲，微博數近達30000條。並且與領事館微博、使館工作人員微博形成微博群，在中國微博使用者中造成很大的影響。

在海外，推特成為近年來各國所爭奪的重要輿論陣地。世界各國政論家和政府官員都通過此平台發表看法，推特也成為記者報導的主要信息來源之一。現任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加拿大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等國家首腦都開通了個人推特帳號，通過推特發佈大量信息，與民眾互動。推特成為政治人物與一般民眾交流的工具，加深政客和民眾的相互瞭解，通過推特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此外也通過推特塑造對中看法。

對中國來說，國外社群媒體的「荒漠化」近年也慢慢消除。中國自2019年起，外交官及駐外大使館開始大規模使用推特。據BBC統計，2019年推特新增19個中國外交官帳號，13個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帳號；2019年一年增長量是2010年至2018年總增長量的139%（2010-2018共增長23個帳號），逐漸形成「推特上的外交部」，充分反映了中國外交活動日益重視起國外社群媒體平台的事實。

不僅使用量升高，外交官在推特上的聲量也不斷提升，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體現的淋漓盡致。新冠疫情下初期，一些外國首腦及政府要員利用推特發佈不切實的言論，極大的影響民眾的判斷及輿論風向，形成一股對華人種族歧視，對疫情污名化的浪潮，國外民眾標記 #武漢肺炎標籤，並發佈謠言及大量負面虛假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僅一改「安靜外交」模式，直接與其交涉，在外交部網站公開發表聲明，還利用推特對「污名化」進行即刻回擊，華春瑩、趙立堅等人在推特實名「開懟」。陸慷也在4月通過推特回擊前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說：「謊言就是謊言，說上一千遍還是謊言，蓬佩奧先生可以休矣！」

除了回應不實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副司長耿爽和趙立堅還頻頻用推特發文，展開外交活動。華春瑩（@SpokespersonCHN）、趙立堅（@zlj517）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MFA\_China）這3個已認證的官

方帳號，成為疫情期間，外交官員推特互動中的「鐵三角」。在推特上中國官方互動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 （二）發文數量多，發文時間早

根據報導者新聞統計，華春瑩、趙立堅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三個帳號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在推特的發文資料，共計 4,574 筆。而最多時一天發文數量為 198 篇，並集中在 1 月 26 日至 2 月 10 日。<sup>38</sup>

首篇與新冠疫情有關推特貼文則是 1 月 22 日，正是 1 月 23 日武漢封城的前一天。這是趙立堅第一次應對新冠疫情發送推文。他在第一時間定下中國積極抗擊疫情的形象。「中國面對這次疫情，比起 2003 年的非典有很大的進步；而且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新聞報導也非常及時。」<sup>39</sup>並強調「強大醫療能力」，「短時間採取控制措施」，「不會奪走更多人生命」，「減少經濟損失」，在疫情爆發最開始對可能會對中國造成負面輿論的問題上先發制人。

在 1 月，2 月疫情在中國還處在緊張期間時，三個帳號發文的類別主要為疫情現況說明、展現「中國抗疫成果」和以及傳播中國的「正能量」。正能量信息也以鼓勵加油話語、以及轉發外國對於中國的祝福加油。1 月 31 日，趙立堅也轉發火神山醫院建設影片，獲得超過 2 萬次觀看量；許多網友點讚、對中國的加油打氣以及對中國快速建成醫院的讚嘆。

發文渠道雖然不是通過主流媒體，但推文的態度是緊跟政府的路線的；同時三個帳號會轉發《新華社》、《人民日報》的文章，將官媒上的觀點轉至推特，並配以英文的解釋以及評論。如 2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主席習近平提出「習近平講好中國抗疫故事，讓正能量始終充盈網絡空間」，<sup>40</sup>此方針政策在疫情期間的推特互動中始終如一。據統計，從 1 月 1 日到 4 月 10 日共 4,574 則推文中，與「中國疫情發展狀況」有關

<sup>38</sup> 〈100 天疫情推特戰：從中國外交部推文解讀大外宣布局〉，報導者，2020 年 4 月 29 日。  
<<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ccp-grand-external-propaganda-twitter>>

<sup>39</sup> 趙立堅 Twitter 1 月 23 日貼文，<<https://twitter.com/zlj517/status/1219877031325753345>>。

<sup>40</sup> 〈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5/c\\_1125578886.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5/c_1125578886.htm)> (2020 年 2 月 15 日)

內容只有 167 條，與「正向能量」相關的推文是它的 9 倍。<sup>41</sup>我認為，借助推特力量大規模發文，想外宣傳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疫十分成功，以此傳遞「應對有方」的積極形象。

除了「正能量」，這三個推特帳號還持續強化「命運共同體」以及中外「國際合作」訊息。據報導者新聞統計，從 1 月 22 日起幾乎每日都出現「命運共同體」字眼，最少為 1 次，最多為 3 月 20 日，共提到 20 次。<sup>42</sup>「命運共同體」是此次疫情中中國的外交核心理念，通過不同形式的不斷重複強化加深他國的瞭解，以及認同。

### （三）國家形象不斷變化

在推特上中國塑造的「國家形象」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1 月-2 月中，中國國內疫情還處在緊張期間，發文的類別主要為疫情現況說明、展現中國抗疫成果，以緩解疫情帶來國外對中的緊張氣氛；並且以受援國身份感謝他國的援助並爭取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

隨著中國國內疫情的不斷好轉，中國在推特上推文風格逐漸改變。2 月 20 日，華春瑩發出第一篇有關向他國援助的推文，其內容是用日文所寫的，主要表達了中日一直是鄰居和朋友，中國向日本提供實驗試劑盒的幫助。<sup>43</sup>此推文下面獲得 790 則評論回覆，其中也不乏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援助提出感謝。此推文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第一次在推特上發送有關中國援助他國的事實，在這之前，發文都集中在中國受到他國援助。2 月 20 日推文是中國從「受援國」到「援助國」形象開始轉變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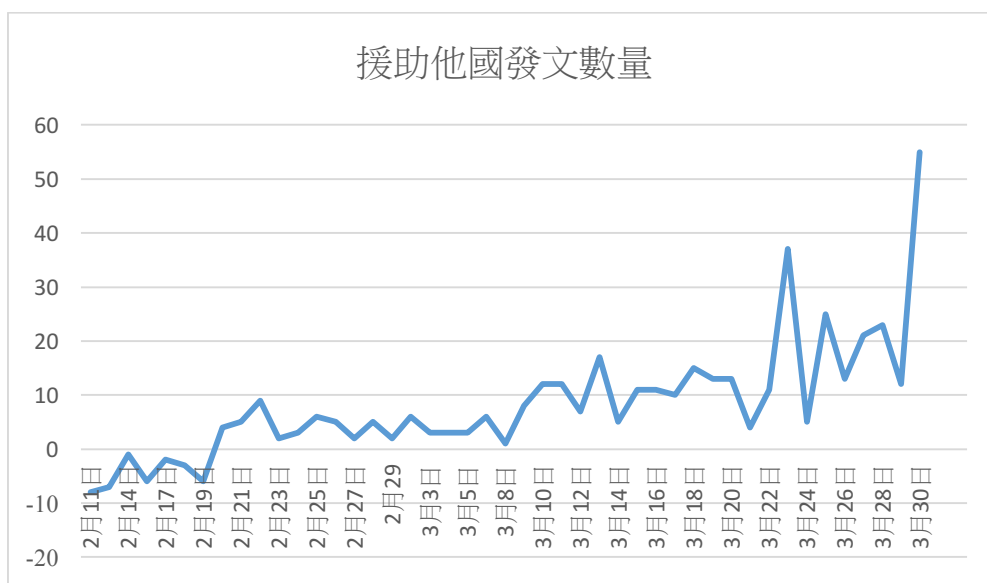
---

<sup>41</sup> 〈100 天疫情推特戰：從中國外交部推文解讀大外宣布局〉，報導者，2020 年 4 月 29 日。

<sup>42</sup> 同上。

<sup>43</sup> 2 月 20 日華春瑩推特推文：中國日本為鄰居，中國向日本援助病毒檢驗試劑。

<https://twitter.com/SpokespersonCHN/status/1230429607767109632>



資料來源：報導者新聞報導統計數據<sup>44</sup>

根據報導者新聞統計，從 2 月 20 日起，華春瑩、趙立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三個官方帳號每日都發出中國對外援助相關推文；據統計，2 月 20 日到 3 月 18 日武漢首次無確診病例前，中國「援助他國」推文總量增加；3 月 18 日隨著全國確診數量清零後，相關推文數大幅度增加，當日總發推文量為 15 則；在 3 月 30 日到達高峰、當天共計 55 則呈現中國向義大利、委內瑞拉、柬埔寨、美國等國家運送防護服、N95 口罩等醫療物資，並派遣專家小組前往救災的援助推文。<sup>45</sup>

除了援助他國外，中國還發文表達與他國的密切互動、信息的即時傳遞及公開透明且及時地向世界更新疫情資訊。3 月 9 日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發文稱：「中國一直在以開放透明的態度向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更新 COVID-19 的信息；為抗擊這一流行病所做的努力全世界有目共睹。」<sup>46</sup> 希望以此建構中國「負責任大國」，「援助大國」，「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國家形象。

#### （四）宣傳風格因地制宜

<sup>44</sup> 註：中國在 2 月 20 日前，均為他國援助中國的推特貼文，圖表中呈現為負值；2 月 20 日後援助他國貼文則以正值體現。

<sup>45</sup> 〈100 天疫情推特戰：從中國外交部推文解讀大外宣布局〉，報導者，2020 年 4 月 29 日。

<sup>46</sup> 發言人辦公室 (@MFA\_China) 3 月 9 日推特貼文。

<[https://twitter.com/MFA\\_China/status/1237000481219571713](https://twitter.com/MFA_China/status/1237000481219571713)>

外交部鐵三角在推特上的推文風格一改在官方外交的強硬態度，而是較為輕鬆，貼近民眾，並熟練使用標籤（#hashtag），標記（@）功能；也結合如 LOL（laugh out loud, 大笑）以及表情符號等。除了風格輕鬆，在語言上也呈現多樣化，會使用中文、英語以及其他國家語言，如華春瑩 2 月 20 日的向日本提供實驗試劑盒的推文則使用日語，拉近與當地國民眾的距離。

#### （五）輿論競爭戰場

此次推特成為疫情之下中國回擊美國及西方不實言論的重要戰場。3 月 21 日，針對美國宣稱中國對外疫情公佈「不透明」的指責，以及要求世界審視所謂疫情「時間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推特上連續發文回懟：「謊言和誹謗不能讓美國變得偉大。面對全球性流行病，正確的做法是將公共健康置於政治之上。」<sup>47</sup>趙立堅在 2 月 2 日轉發華爾街日報《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一文，並稱「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其道德、理性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歧視，挑釁及誹謗。」<sup>48</sup>這些強硬的回覆在海外以及國內都引發一定迴響。一些國外民眾積極回覆表示：「我能看到的是中國在好轉，而我們越來越嚴重。」同時也呼籲停止相互污名化。

中國此次在推特上正面回擊西方污名化是外交態度上的進步，在第一時間導正輿論風向，停止其發酵。另外，推特上強硬捍衛「中國形象」的做法也被 BBC 新聞、中國日報、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報導並轉至國內微博平台，形成了在微博平台上的聚合並引起又一討論高峰；其輿論影響力從推特轉至微博，從國外轉至國內，凝聚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國家自豪感，以此可以看出推特成為對內與對外宣傳融合的橋樑。

筆者認為，中國「推特外交」也有可優化之處。外交官趙立堅 3 月 12 日發文指責美國軍方將該病毒帶到武漢，並要求美方作出回應。（It might be US

<sup>47</sup> 〈中美外交發言人推特對戰！華春瑩連發三推：謊言與誹謗不能讓美國變得偉大！〉，環球網，<<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xWYHuvIze5>>（2020 年 3 月 22 日）

<sup>48</sup> 趙立堅（@zlj517）2020 年 2 月 6 日推特貼文。  
<<https://twitter.com/zlj517/status/1225350162408779776>>

army who brought the epidemic to Wuhan. Be transparent! Make public your data!)<sup>49</sup>此推文獲得超過 4000 個評論，8000 餘次轉發，在推特上評論區形成激烈且對立的兩派爭論，使美中關係緊張情勢升高。美國也對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發出嚴厲警告。美國總統川普更在一週後的公開演說中直接把 COVID-19 稱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筆者認為，在面對負面輿論之時需要以客觀事實正面回擊，而非帶有主觀意識的判斷。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轉發醫學期刊《刺絡針》(The Lancet)3 月 19 日由全球 27 位公共衛生領域專家發布的聲明，強調新冠病毒絕不是從武漢實驗室流出，十分有力地對美國提出的病毒來源中國進行回擊。<sup>50</sup>

所以，國家間對於病毒來源地的相互指責對誰都無好處，還會使得本就有意識形態差異的中西方民眾在網路上形成論戰，形成更加對立的局面。客觀真實的數據及內容呈現已是最有力的證明，國外民眾從心理層面更容易接受，這也是樹立國際形象的有效方式。

## 五·自媒體個人力量凸顯

此次疫情中除國家首腦，官方發言人，衛生領域專家、企業家等菁英階級外，也體現了個人化聲音被大量展現，一般民眾利用自媒體傳播的力量不可小覷。許多民眾記錄下中國封城期間的點滴，通過臉書等平台發佈，其中不乏一些居住在中國的外國友人，他們成為幫助中國消除「污名化」的重要推手。

2 月 5 日「第六聲」發表了南京大學的意大利學者安德里亞·巴爾迪尼 (Andrea Baldini) 撰寫的評論文章《新冠反應和排外政治》(Coronavirus Re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Xenophobia)。他敘述了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他也從專業角度理性分析，「網路已經成為西方政客操縱民意的工具，這也造成西方民眾恐慌乃至

<sup>49</sup> 趙立堅 (@zlj517) 2020 年 3 月 12 日推特貼文。

<<https://twitter.com/zlj517/status/1238111898828066823>>

<sup>50</sup> 發言人辦公室 (@MFA\_China) 2 月 20 日推特貼文。

<[https://twitter.com/MFA\\_China/status/1230475462469509120](https://twitter.com/MFA_China/status/1230475462469509120)>



排華的根本。」<sup>51</sup>因為他瞭解西方的思維模式，所以該文取得了非常好的外宣效果，是「第六聲」抗疫報道中點擊量、轉發量最高的文章之一。

瑞典網友艾米·布洛姆奎斯特 (Amie Blomquist) 在 Facebook 發表貼文《中國是如何「欺騙」世界的？》用對比和反諷的手法，對比在疫情面前中國和亞洲表現出的團結理性以及西方的「甩鍋」及混亂。她發帖初衷是想向家人介紹中國疫情控制的真實情況，卻意外獲得許多網友留言支持，如「將一切罪過歸咎於中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只不過不願意承認中國更好！」，「我也試圖勸人們戴口罩，但我被嘲笑了。現在他們明白了，但不願意承擔責任。」<sup>52</sup>

從此事件評論區可以看出兩點，首先中國的成功「抗疫」確實被西方民眾看到且認可，且西方報導對中國的「妖魔化」並未完全影響群眾，這是值得肯定的。其次，自媒體是宣傳及交流的重要管道，民眾利用平台表達其看法，而且相對於主流媒體及官方報導會更加容易被他人接受。所以，擴展在新媒體上的聲量是重要的，西方群眾藉此真正瞭解中國的抗疫脈絡和實況，若無人將中國故事講出來且被其聽到，群眾仍然會被帶有一定偏見的西方媒體影響。總之，應利用社群媒體和民眾交流，並發佈民眾易懂資訊；同時借助網路較有影響力群體力量，利用其發聲，以此達到較有效傳播效果。

各駐外大使通過國外電視、廣播等接受採訪、答疑解惑的頻率也逐漸增高。大眾傳媒不只是一家所獨有的平台，更是全人類共同的交流空間，因此，有效利用這種平台塑造良好的外交形象和國家形象就顯得意義重大。

#### 第四節、小結

總的來說，在新冠疫情下，中國自我建構過程的指導核心是秉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原則，自我宣傳重點為兩部分：第一，通過多方管道、多樣方式的宣傳，建構中國積極抗疫、援助他國的「負責任大國」的核心形象。第二，回擊負

---

<sup>51</sup> Andrea Baldini, *Coronavirus Re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Xenophobia*, sixth Tone,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5158/coronavirus-reactions-and-the-politics-of-xenophobia>>(Feb 05, 2020)

<sup>52</sup> 〈抗疫的中國 VS 嘴炮的西方！一個瑞典小姐姐 po 了篇「考古」文，為中國抱不平，結果留言區爆了〉，新民晚報，<<https://wap.xinmin.cn/content/31705857.html?cantowap=yes>>(2020 年 4 月 9 日)

面言論成為自我形象建構重點，因為對於不實言論不及時回擊，會產生自我宣傳和他者宣傳的偏差，會造成國外民眾更大的誤解。

政府第一時間公佈官方信息並進行一些可以建構本國形象的消息源進行報導，這使得在「自我形象」建構上佔據主動權，也對輿論形成有效的政治引導。因為在「西強東弱」的傳播環境下，很多國家都被動地接受著西方媒體所形塑的形象。而在此次抗擊新冠疫情下，由於政府對信息來源進行有效監管，中國媒體所發佈的新聞，反而被西方主流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所轉載讓更多的人知曉。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只要有好的內容，完全可以達到逆向「二次傳播」，借助西方媒體之力，在國際上發出本國聲音。從形式上，通過官方信息及生命的海內外發佈、利用推特、Facebook 社群媒體直接回擊，甚至以製作視頻動畫等更形式將西方的不實言論呈現，體現了中國在此問題上的定力，維護在海外形象，還激發並凝聚國內民眾的民族精神。自我形象建構呈現幾個特點。第一，對外宣傳聲量提高。第二，傳播平台多樣，運用官方海外宣傳平台、海外社交媒體、自媒體力量，讓中國的聲音傳到海外；宣傳形式因地制宜，避免制式化。第三，宣傳形式不再單一，依靠官方出版品、圖書、視頻、動畫，滿足不同需要。

但自我宣傳上也存在風險性。首先，對外宣傳需要以事實為基礎，做到平衡報導，若過分強調它的其中一個屬性，卻忽略了其他方面，則會產生「逆向效應」。造成受傳者形成逆反心理，任由宣傳部門再如何宣傳，在心理層面都選擇不接受，嚴重影響宣傳效果的機制。「戰疫」期間，固然有許多正能量事跡值得大書特書，但如果過分沈迷於近乎吹捧性質的語境，忽視了某些客觀事實，就會形成民眾的抗拒和鄙夷。所以不一味求全、也不妄自菲薄，不掩蓋信息，也不做到信息的轟炸，則會有最好的宣傳效果。另外，任何事均過猶不及，敢於發聲可以有效維護自我形象並且贏得本國喝采和國內凝聚力。但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同樣方式「攻擊」他國，或是刻意強調疫情數字上的此消彼長，以「某國今日病例反超中國！」為標題報導，則有「幸災樂禍」之嫌，與自我建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極不相符，而且在信息全球傳播的當下，這種言論甚至有可能對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努力帶來直接影響。所以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導下的「中國形象」自我建構過程：既要堅持原則，敢於發聲，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態度；又要理性，以大國心態從容應對，才能贏得尊重。

## 第六章 疫情外交階段：他者建構

### 第一節、雙邊互動：首腦電話會議

#### 一、與多國進行通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自 1 月 22 日起，與多國領導人舉行電話會議。截止至 2020 年 7 月 8 日，習近平與多國領導人共通話 60 次；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MANUEL DE OLIVEIRA GUTERRES)於 2020 年 3 月 13 日通話一次。電話首腦會議交流面向廣泛，且疫情不同階段通話重點也有所不同。截止至 2020 年 7 月，通話國家涉及四大洲共 43 個國家。

表：電話首腦會議通話國家列表<sup>1</sup>

所處大洲	國家	數量
亞洲	韓國、老撾、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阿聯酋、哈薩克斯坦、沙特、吉爾吉斯斯坦、伊朗、尼泊爾、烏茲別克斯坦、斯里蘭卡、緬甸、孟加拉、菲律賓、塔吉克斯坦	17 國
歐洲	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俄羅斯、英國、比利時、白俄羅斯、土耳其、芬蘭、捷克	13 國

<sup>1</sup>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方網站。<<https://www.fmprc.gov.cn>>

美洲	美國、古巴、智利、巴西、委內瑞拉、墨西哥、秘魯、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	9 國
非洲	南非、埃塞俄比亞、埃及、納米比亞	4 國

## 二．法德俄三國與中通話最多

值得關注的是，在 1 月 22 日，習近平主席分別與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通電話。這也是習近平主席與別國領導人通過電話溝通疫情的最早兩通。電話內容包括中國疫情現況，向兩國匯報中國已採取嚴密防控防治舉措，同時及時發佈疫情防治信息，並向世衛組織以及有關國家和地區通報疫情信息；兩國也對中方表示慰問及鼓勵。

除通話時間最早，法國、德國及俄羅斯也是與中國通話次數較多的國家。習近平主席與法國分別在 1 月 22 日、2 月 18 日、3 月 24 日以及 6 月 6 日進行四次通話；和德國在 1 月 22 日、3 月 5 日以及 6 月 4 日進行三次通話；與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 在 3 月 19 日、4 月 16 日、5 月 8 日以及 7 月 8 日共通話四次。主要內容為報告目前中國國內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中國有信心有能力取得抗疫勝利，在 4 月 16 日通話中習近平也表示中俄對疫情合作體現了中俄關係的高水平。<sup>2</sup>

德、法、俄三國在經濟政治上都是中國的重要夥伴，而且三國都是在歐洲較有話語權以及聲望的國家。首腦溝通是國家間交往的重要環節，在疫情發生當下及時與這三國進行匯報，首先是為了穩固中國和夥伴國的關係；其次，從疫情最初重視與他國溝通協調重要性，避免非典疫情初期中國未及時和國際其他國家告知此事而產生的輿論以及造成的負面形象。同時將中國現況及疫情向好的訊號不斷釋放給具有話語權的三國，增強其對中國的信心；直接

<sup>2</sup> 〈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外交部，2020 年 4 月 16 日。

的外交溝通也避免不切實際的輿論產生，並影響三國對於中國抗疫的評價及「中國抗疫形象」的建構過程。

### 三· 通話內容多樣

「電話首腦會議」另一特徵是通話內容的多樣性。不同階段電話內容有相同也存在不同。無論何時，「疫情」都是通話的重點。據新華社 5 月 18 日統計，截止到 5 月 4 日，「疫情」二字共出現了 463 次。此外，「合作」「支持」「防控」都是通話的高頻詞，分別出現了 261、168、135 次。此外，「共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也是通話高頻詞匯，幾乎出現在每次電話會議中。<sup>3</sup>內容可分為三個階段，疫情初期，中國主要向各國匯報抗疫成果及對抗疫情的信心，同時感謝其他國家慰問以及援助；3 月起面對疫情在全球蔓延，給予其他國家慰問同時承諾給予毫無保留的援助。2 月的電話內容主要涉及「疫情防控處於關鍵階段，中國有信心打好疫情狙擊戰」，到 3 月轉變為中國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再到 4 月表示中國「渡過了最困難時期」、「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每個階段中國的抗疫進展，中國都通過電話形式及時傳達給國際社會，同各國保持密切溝通。2020 年 6 月起，「疫苗」也逐漸出現在電話首腦會議內容之中，並強調「命運共同體」重要性。除了疫情，通電話的內容還包括雙邊關係發展、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多邊框架內加強交流等。<sup>4</sup>

通過高層溝通引領，可以從國家層次凝聚抗擊疫情的國際力量，也讓其他國家知曉中國目前的狀況，將中國方案、中國倡議、中國願意幫助他國的態度，中國抗疫決心不斷傳遞，讓世界聽到中國聲音。同時維護與多國間友誼，穩固雙邊關係，通過溝通，影響他國建構中國積極抗擊疫情的「國家形象」。

---

<sup>3</sup>〈第一觀察 | 「50+1」通電話，都和這件大事有關〉，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5/16/c\\_112599463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5/16/c_1125994633.htm)〉（2020 年 5 月 11 日）

<sup>4</sup>〈第一觀察 | 「50+1」通電話，都和這件大事有關〉，新華社，（2020 年 5 月 11 日）

## 第二節、雙邊互動：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

此次「疫情外交」中，中國積極與世界衛生組織積極合作，世界衛生組織作為聯合國系統中專責衛生事務的機構，在全球衛生領域有極大的公信力、話語權及影響力。根據 2005 年版的《國際衛生條例》給予世衛組織蒐集和評估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報告，以及在必要時協調國際社會對該事件作出響應的責任和權力。

合作的面向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疫情初期向世衛組織及時匯報中國現況，共同應對突發疫情；中國疫情得到緩解，全球其他國家爆發時，中國全力協助世衛組織開展工作；與世衛組織共同舉辦多場線上經驗分享會，多國學者進行包括疫情治理、疫苗研發的學術交流；第三，在美國停止資助世衛組織，甚至退出世衛組織之時，中國給予世衛組織支持以及資金援助。

### 一· 疫情初期及時報告

12 月 31 日凌晨，「國家衛生健康委派工作組」在收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報告同日就向世衛組織報告了新冠疫情最新現況，做到匯報「零延誤」。1 月 9 日，在初步判斷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時，中國向世衛組織通報疫情信息，將病原學鑒定取得的初步進展與其分享。當日，世衛組織發佈聲明，認為在短期內中國已初步鑒定出新冠病毒是一項成就。在 1 月 10 日，國家衛健委負責人與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疫情應對工作通話，並通報「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引物探針序列信息」。1 月 12 日，中國在全球流感共享數據庫（GISAID）發佈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做到信息全球共享。對此世衛組織在泰國發現新冠病毒病例的聲明中指出，「中國共享的基因組測序結果，使更多國家能夠快速診斷患者。」1 月 28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總幹事譚德塞時表示，「中國政府將秉持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向國內外發佈疫情信息並加強與國際社會合作；同世衛組織及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等承諾。」<sup>5</sup>

---

<sup>5</sup>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 年 6 月 7 日）。

世衛組織也在 1 月 22 日及 2 月 24 日到中國實地深入考察兩次，並給出中國疫情防控的好評。2 月 29 日經過聯合考察後世衛組織的報告指出，「面對前所未有的病毒，中國採取了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盡可能迅速地遏制病毒傳播。」筆者認為，中國疫情在初期疫情的及時控制，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及時報備與合作是分不開的。擁有衛生領域話語權的世衛組織給予中國高度評價，這無疑對國際對中輿論以及中國國家形象有正向影響作用，雖然西方一些媒體與政客認為世衛組織在偏袒中國，但中國疫情不斷下降的數字則是極好的回應。

## 二·積極協助世衛組織開展工作

中國積極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組織的多邊會議，向多國介紹中國防控經驗。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在武漢通過視頻連線參加由世衛組織舉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通報會」，向來自俄羅斯、巴西、埃及等多國的 500 余人分享中國抗疫經驗。3 月 20 日，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參加世衛組織「疫苗研發電話會議」。外交部部長王毅在 4 月 28 日出席「金磚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特別外長會」特別強調金磚國家應該支持世衛組織，因為其是協調推進全球抗疫合作的核心力量，在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兄弟姐妹抗擊疫情方面更是不可或缺。支持世衛組織，就能幫助更多生命。<sup>6</sup>

資金支持上，中國向世衛組織提供兩批共 5000 萬美元現匯援助，以支持世界衛生組織開展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國際合作；同時積極協助世衛組織建立物資儲備庫，積極協助世衛組織籌集「團結應對基金」，參與世衛組織發起的國際倡議。

## 三·中國獲得世衛組織讚賞

中國的抗疫舉措及合作得到世衛組織高度稱讚和肯定。2020 年 1 月 31 日，世衛組織總幹事在關於《國際衛生條例》新型冠狀病毒的應急聲明中指出：「中國

---

<sup>6</sup>〈王毅：支持世衛組織，就能挽救更多生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bdyyq\\_699171/t1774257.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bdyyq_699171/t1774257.shtml)（2020 年 4 月 28 日）

發現疫情、隔離病毒、測序基因組並與世衛組織和全世界分享的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難以言表。中國對透明度和支持其他國家的承諾也是如此。」<sup>7</sup>

中國也明確表示，「將繼續堅定支持你和世界衛生組織在國際抗疫合作中發揮積極領導作用」。中國與世衛組織在此次疫情中的良好合作，對應對疫情和維護世衛組織的地位都是積極的。同時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在衛生領域以及國際組織之中有極高的話語權，所以對「中國抗疫」做法的認可十分重要，不僅提高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中的地位和話語權，而且借助世衛的口對中國進行「形象」上的證明宣傳，要遠過於自我宣傳的效果。

所以與世衛的合作是一個「借力」的過程，不僅借助世衛組織的專業性以及影響力在疫情爆發初期消除中國的負面輿論，是破除污名化最有力的推手，其效果優於中國自己反駁污名化言論；另外也是對中國正面形象的有力宣傳。長遠來看，提升在世衛組織的話語權，有望取代美國在該方面的主導地位，這不僅符合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同時扭轉中國在非典疫情中留下的拒絕與世衛組織合作的負面形象，提升中國正面的「國家形象」。

### 第三節、雙邊互動：對外援助

中國從2月27日，國內疫情還沒完全得到控制，國際疫情出現爆發態勢之時，就開始對國際各國展開醫療救援、物資援助以及利用現代通訊技術，與各國進行經驗分享。此次對外抗疫援助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緊急人道主義行動。

#### 一、派出醫療救援隊

截止5月31日，中國向27個國家派出了近30支醫療專家組，向15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援助；其中包括28個亞洲國家、16個歐洲國家、26個非洲

---

<sup>7</sup>〈世衛組織總幹事關於《國際衛生條例》新型冠狀病毒應急委員會的聲明(2019-nCoV)〉，經濟觀察網，〈<http://m.eeo.com.cn/2020/0131/375273.shtml>〉（2020年1月31日）。



國家、9 個美洲國家、以及 10 個南太平洋國家。<sup>8</sup>並指導長期派駐在 56 個國家的援外醫療隊，協助當地開展抗疫工作，並向國外民眾進行衛生習慣以及防治教育，舉辦線上線下培訓共計 400 余場。<sup>9</sup>

中國共向義大利三次派出救援隊，幫助義大利度過疫情。3 月 13 日，中國派出 9 名專家攜帶中國紅十字會為義大利紅十字捐贈的援物資降落於羅馬時，義大利外交部部長易吉·迪·馬約 (Luigi Di Maio) 親自接待，並在紅十字會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講話，「今天我們並不孤單，我們需要團結一致。中國在今天已經從疫情中崛起，很快我們也將崛起。」義大利最具影響力、閱讀人數最多的第一大報晚郵報晚郵報 (Corriere Della Sera) 在 3 月 13 日也進行大篇幅報導，特別提到：「中國救援隊不僅帶來了專家和醫療物資、甚至帶來了中國特有的中藥。」

<sup>10</sup>

中國對兄弟國家的「疫情外交」鞏固了國家間的友誼。3 月 22 日中國救援隊抵達塞爾維亞後，受到該國「最高規格」的禮遇，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 (Aleksandar Vučić)、衛生部長等政府官員親自迎接。在表示歡迎後，武契奇對塞國國旗及中國國旗深情一吻，並將本國國旗與五星紅旗系在一起，以示在塞爾維亞困難時刻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支持與幫助的深深謝意，<sup>11</sup>此景讓許多人動容。武契奇親吻五星旗的畫面引發熱議，不少中國網友高潮直呼「患難見真情，記住你的朋友叫中國」、「中塞友誼長存，鐵桿兄弟」、「這次疫情後，可見中國政府是世界最靠普的政府，塞爾維亞一起加油」。

## 二·向多國捐贈物資

在拉丁美洲地區，中國除派遣兩個「抗疫醫療專家組」赴委內瑞拉及秘魯外，至 7 月下旬已向拉丁美洲 30 國捐贈口罩、防護衣、檢測試劑等緊急醫療物資 2,700

<sup>8</sup> 〈中國已組織實施對 89 個國家和 4 個國際組織的抗疫援助〉，中國人民共和國駐名古屋領事館官方網站，〈[http://nagoya.china-consulate.org/chn/zt\\_1/ngyfy/yqdt/t1761617.htm](http://nagoya.china-consulate.org/chn/zt_1/ngyfy/yqdt/t1761617.htm)〉(2020 年 3 月 26 日)

<sup>9</sup>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頁 22。

<sup>10</sup> Coronavirus, Di Maio: «Arrivati 40 ventilatori dalla Cina, Italia non è sola», CORRIERE DELLA SERA, 2020 年 3 月 13 日

<sup>11</sup> 趙昱迪，叶琦，〈總統親吻五星紅旗、民眾感謝「鐵桿朋友」 塞爾維亞最高禮遇迎接中國專家〉，環球時報，〈<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q3A0>〉(2020 年 3 月 23 日)

多萬件，呼吸機11100餘台。舉辦30餘場經驗交流視訊會議，並積極協助拉方在中國採購抗疫物資。<sup>12</sup>

據統計，中國向兩百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防疫物資。其中包括，防護服3.4億套，護目鏡1.15億個，口罩706億只，呼吸機9.67萬台，檢測試劑盒2.25億人份，紅外線測溫儀4029萬台，出口規模不斷增大。1月至4月，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和發送貨物量分別增長24%和27%，累計運送抗疫物資66萬件。<sup>13</sup>中國同時向77個發展中國家宣布暫停債務償還，並向50多個非洲國家和非盟援助醫療援助物資，開展醫療合作，並且派了更多醫療專家組趕赴非洲，幫助非洲地區提升疫情防控水平。

除了國家官方援助，中國許多企業也對外給予援助。根據數據統計，字節跳動（ByteDance）捐款數最多，達4.36億；騰訊控股（Tencent Holdings）為1.73億美元；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捐款1.44億美元；其他知名互聯網公司如百度（Baidu）捐款4300萬美元；中國大陸外賣平台美團點評（Meituan Dianping）捐款2800萬美元，快手（Kuaishou）捐款1400萬美元。<sup>14</sup>中國地方政府，企業以及民間個人也向150個國家、地區及國際組織給予援助。

#### 第四節、多邊合作：國際交流 合作抗疫

「多邊外交」是全球化下國家間合作的重要途徑，主席習近平指出，「加強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是發揮我國負責任大國作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體現。繼續與世衛組織合作，同相關國家密切溝通。」

中國的多邊「疫情外交」踐行其外交理念，主要從參與多邊會議、地區性合作以及支持聯合國及世衛組織地位著手，並通過「多邊外交」互動展現中國作為以及體現以世界為整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sup>12</sup> Coronavirus, medici cinesi a Roma: anche erbe medicinali fra le 31 tonnellate di materiali, 13 MARZO 2020, Corriere Della Sera, <[https://roma.corriere.it/notizie/cronaca/20\\_marzo\\_13/coronavirus-aiuti-cinesi-anche-erbe-medicinali-le-31-tonnellate-materiali-04e4543c-6512-11ea-ac89-181bb7c2e00e.shtml](https://roma.corriere.it/notizie/cronaca/20_marzo_13/coronavirus-aiuti-cinesi-anche-erbe-medicinali-le-31-tonnellate-materiali-04e4543c-6512-11ea-ac89-181bb7c2e00e.shtml)>

<sup>13</sup>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頁23-24。

<sup>14</sup> “Announced donations to combat Coronavirus from tech giants in China”,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06335/china-covid-19-tech-companies>> (Aug.24 2020)

## 一·地區性多邊組織合作

中國從疫情開始時首先和周邊國家開展抗疫多邊合作。作為東盟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在2020年2月20日召開「中國東盟特別外長會」，進行政治層面溝通，對戰勝疫情的決心和信心形成共識，並發表了《中國—東盟關於新冠肺炎問題特別外長會聯合聲明》，而後又多次就疫情進行經驗分享。4月12日，東盟與中日韓三國召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中國總理李克強在講話中倡議各方「全力加強防控合作，提升公共衛生水平」並做出一些新的承諾，包括繼續根據需要向東盟國家派遣醫療專家組；支持東盟設立抗擊疫情特別基金；建立「10+3 應急醫療物資儲備中心」等。<sup>15</sup>

非洲作為目前中國最為緊密的夥伴，在疫情發生後，中國與非洲地區國家積極進行多邊合作以及幫助。疫情發展初期，中國與非洲地區 24 個國家自 3 月 19 日起開展多次「中非連線、攜手抗疫」線上疫情防控會議；<sup>16</sup>在「第 73 屆世界衛生大會」上習近平主席也宣佈無條件進一步支持包括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抗疫行動；在「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非洲疫情得到一定緩和時，習近平主席強調後疫情時代，將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快推進非洲疾控中心總部建設；承諾新冠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率先惠及非洲國家；除了衛生共同體建設外，免除有關非洲國家截至 2020 年底到期對華無息貸款債務，給予經濟上支持。<sup>17</sup>種種對非的表現可以看出中國十分重視與非的關係，在疫情方面，不僅提供雙邊的援助還聯合非洲各國國際組織開展多邊會議，擴展其影響力；並承諾在疫情後期持續的對非的經濟及衛生援助，從而穩固對非地區的關係以及獲得更穩固政治支持。

<sup>15</sup> 李克強：〈在東盟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 年 4 月 15 日，第 2 版。

<sup>16</sup> 〈「中非連線、攜手抗疫」系列專家視頻交流會舉行第二次會議〉，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78112.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78112.shtml)> (2020 年 5 月 12 日)

<sup>17</sup> 〈習近平在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上的主旨講話〉，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789549.shtml>> (2020 年 6 月 7 日)。

除了中國與東盟的密切合作以及交流外，中國與歐盟、非盟、亞太經合組織、加共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和地區組織，以及韓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國家，開展70多次疫情防控交流活動。<sup>18</sup>

## 二· 中國在多邊會議上積極發聲

2020年3月26日，習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介紹了中國抗疫經驗，並提出堅決打好新冠疫情防控全球阻擊戰、開展國際合作、積極支持國際組織、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等4點主張；以及提出與各國合作倡議。

5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再一次呼籲各國團結合作，強調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迫切性；並提出全力搞好疫情防控、發揮世衛組織作用、加強對非洲國家支持、加強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恢復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國際合作等6點建議。在資金方面，宣佈兩年內提供20億美元國際援助、與聯合國合作在中國設立全球人道主義應急倉庫和樞紐、建立30個中非醫院合作機制。並承諾中國新冠疫苗研發完成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同時落實「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sup>19</sup>

可以看出，中國在參與多邊會議上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強調：聯合抗議的重要性；建構「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支持國際組織的正當性。並在不僅在抗疫方面給予承諾，在後疫情時代的疫苗研發、經濟發展以及衛生醫療保障上中國也做了承諾，可以看出中國希望在衛生領域擔負大國責任的決心以及重構衛生秩序的野心。

## 三· 專家學者展開多邊外交

此次，除了中國政府的「多邊疫情外交」，醫生、學者、傳播領域也展開不同程度的外交工作，展現中國在抗疫中的積極參與。

<sup>18</sup>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頁22。

<sup>19</sup>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頁22。

國家衛健委將診療和防控方案彙整以及翻譯成3個語種，分享給全球180多個國家、10多個國際和地區組織參照使用。並與世衛組織聯合舉辦「新冠肺炎防治中國經驗國際通報會」。媒體部門開設「全球疫情會診室」、「全球抗疫中國方案」等欄目，同時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中醫藥抗疫全球直播」，邀請了專家和醫護工作者介紹中國抗疫經驗和做法。<sup>20</sup>智庫專家與醫學方面學者開展國際科研交流合作已經共享科研數據信息以及研究防控救治有關方法，並且發揮「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推動成員國之間就新冠肺炎開展合作工作；中國科學院發佈「2019新型冠狀病毒資源庫」，建成「新型冠狀病毒國家科技資源服務統」以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科研文獻共享平台」。

## 第五節、小結

在此次新冠疫情下的外交實踐中，中國是通過與「雙邊外交」及「多邊外交」兩種方式。「雙邊外交」上，國家以及在衛生領域最具有話語權的世界衛生組織是主要的外交對象。國家之間通過高層的電話往來互通有無，前期向各國通報中國現況，規避不實輿論產生；疫情全球爆發期向各國傳達慰問以及提供幫助；此外，重視世衛組織作用，樹立在世衛組織中的良好形象以及利用世衛組織的肯定向全球傳遞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正面形象。

通過疫情的「多邊外交」，在國際平台和傳播渠道分享中國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經驗與教訓，中國藉此實現與多個國際組織的連動，並在合作中展現中國積極幫助各國的正面形象。積極的區域多邊合作可以穩固重要區域夥伴關係，也可以消除國際社會的誤會、偏見與隔閡。

---

<sup>20</sup> 同上，頁 22。

「多變互動」也有戰略考量，積極開展「多邊外交」也讓各國意識到共同解決疫情的重要性及優勢，潛移默化將「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多邊主義」思維深植各國心中。第三，中國通過「多邊互動」獲得了衛生領域更多的話語權和認可度，也後疫情時代在衛生領域會承擔更重要角色。



## 第七章 國家形象建構成效

### 第一節、媒介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建構

中國在全球抗疫全過程中通過「自我宣傳」以及多種形式的「疫情外交」所發生的「國家形象」轉變是具體且顯著的，主要體現在媒體報導態度、報導方向以及對如「封城」等問題上觀點的轉變上。

中國在媒體上「國家形象」從1月較為負面到3月、4月呈現更多中立報導，出現一些正面報導的利好現象，筆者認為基於以下幾個理由。中國身份的變化：中國從接受援助的「受災者」變成提供經驗及物資援助，醫療援助的「賑災者」；並且秉持著「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理念，在他國受到疫情衝擊下無私提供幫助，讓國際真切感受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作為。二是基於共同的時空背景下，全球都受到疫情衝擊時，西方才真正的瞭解「封城」，「隔離」，「戴口罩」的重要性，才理解中國做法。從這一點也可以說明，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以及國家政治制度不同，在許多面向上很難產生共識，但若國家間在交往中可以基於同樣的背景進行討論與互動，會更容易產生理解與認同。而各國在衛生領域的需求以及期待較為相同，在後疫情時代也應該將衛生作為國家間交往，建構認知與認同的重要平台。第三，在美國在此次疫情緊要關頭，奉行「單邊主義」，未做到衛生領導者的角色，中國卻積極行動，履行負責任大國職責，幫助其他國家；兩國對疫情防控的能力、態度高下立判。

#### 一、西方主流媒體中的中國國家形象

西方主流媒體對涉華事件上存在偏見，已是公認事實，其對中設置的「議題框架」常常影響民眾認知。新華社新聞研究編輯毛利梳理2020年北美、歐洲、亞洲、中東等國家的有關中國新冠疫情的報導，其中英美媒體佔比為18.5%，佔據較強輿論導向。西方媒體對華報導呈現用政治視角解讀公共事件情況，其中政治類比最高，佔據36%，衛生類僅佔34%，經濟類佔16%。

<sup>1</sup>而且在這些報導中，發生「框架偏離」的輿論引導。如李文亮醫生事件，《華

爾街日報》報導《這個吹哨人，是真正的英雄》（This Whistleblower Really was a Hero），將焦點偏移，聚焦在中國是否有言論自由，而非醫生及疫情本身。可以看出，西方已經習慣從政治化角度解讀中國公共衛生事件，而且觀點態度較為負面。但隨著新冠疫情的推動、國際形式的不斷變化以及中國的疫情防控實踐，西方媒體也存在一些態度上的轉變。

### （一）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在中國疫情暴發初期，對華負面報道佔據絕對優勢；在2月到3月之間，對中國負面報道明顯下降，中立的報道佔據了主流，正面報道也有上升。進入4月以後，西方主流媒體把主要矛頭轉向國內，集中向川普政府應對疫情不力開炮。雖然美國朝野對華態度上至今仍然不夠理性和客觀，但是中美的防疫成效的明顯對比也讓《紐約時報》態度發生改變。<sup>2</sup>

《紐約時報》的新聞《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政治體制深層缺陷》（Coronavirus Exposes Core Flaws and Few Strengthen in China's Governance），《如果我們都生病了怎麼辦？：冠狀病毒使中國的衛生系統癱瘓》（What if We All Get Sick?: Coronavirus Strains China's Health System），<sup>3</sup>從政治視角解讀的公共衛生事件並且使用大量意識形態的詞彙批評中國。在1月的報導中也將新冠肺炎稱為「武漢肺炎」（Wuhan Coronavirus），可以看出《紐約時報》呈現西方對中方的負面報導態勢。

隨著中國抗疫成效的產生，自2月起，《紐約時報》對中輿論態度有所轉變。首先數量上對中報導呈現下降趨勢，而是將重點轉向國內，對美國疫情防控以及川普行為予以批評。4月1日的報導中，明確表示川普從不反省新冠的錯誤，在未來幾周和幾個月內，美國死於冠狀病毒的美國人比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4月5日發表標題為《中美必須聯合抗擊疫情》文章，表示中國一直以負責任態度提供疫情資訊並提供美國等國家援助。僅4月1日一天，疫

<sup>1</sup> 毛利，〈海外媒體涉華新冠肺炎報導的話語建構與建構分析〉，中國記者，第4期（2020年）。頁82-83。

<sup>2</sup> 周鑫宇，〈中國的“抗疫外交”：成效與啟示〉，國際問題研究，第5期（2020年），頁26-27。

<sup>3</sup> “What if We All Get Sick?: Coronavirus Strains China's Health System”，*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27/world/asia/27china-coronavirus-health.html>>(Jan 27, 2020)



情相關文章共 25 篇，指責川普「抗疫」不力，「美國疫情滯後」的文章有 7 篇，其中包括將「川普疫情政治化」，「美國診斷為何滯後於疫情」等字眼。可以看出，中國疫情外交的成功以及國際形勢的改變與中美疫情控制對比使得中國在《紐約時報》中的形象有一定改變。2021 年 2 月紐約時報發表《中國如何戰勝病毒並產生共鳴》一文（Power, Patriotism and 1.4 Billion People: How China Beat the Virus and Roared Back），指出「中國在抗疫過程中，做了許多其他國家不願意做或不能做的事情，這一成功也使中國在經濟和外交上處於有利位置。」<sup>4</sup>這篇報導是中國因「抗疫外交」在西方媒體固定新聞框架下的突破。雖然西方主流媒體目前還存在較不理性的觀點，但數量下降且越來越具客觀性，一定程度反映外交成效。

## （二）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對中國也呈現較負面報導，但隨著時間推移，美國疫情越發嚴重，中國抗疫效果顯現出來，《華爾街日報》的態度也有所改變。

### 1. 美國的失敗無法再忽視

在 3 月，中國本土疫情得到控制，美國病例卻逐漸增多之時，3 月 7 日《華爾街日報》卻發佈文章《中國早期失誤助長疫情》（China's Early Missteps Fed Epidemic），稱政府耽誤了公開疫情時間，造成疫情大面積擴散。然而在報導當時，中國疫情已經呈下降趨勢，當日中國新增 44 例，而美國當日為 112 例，而且朝著不斷擴大的方向發展。<sup>5</sup>可以看出這是美國媒體固有的報導偏移手段，在美國疫情嚴重之時，《華爾街日報》並未將重點放在抗疫上，而是通過抨擊中國試圖轉移閱聽人的注意力及焦點，試圖轉嫁責任。

4 月隨著中國疫情清零，美國疫情已近崩潰之勢，《華爾街日報》無法再忽視中國抗疫成功經驗及美國的不作為，對中態度趨近於中立。《為什麼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不能給您戴口罩》（Why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Can't Get You a

<sup>4</sup> Power, Patriotism and 1.4 Billion People: How China Beat the Virus and Roared Back, *The New York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05/world/asia/china-covid-economy.html> > (Feb. 5, 2021)

<sup>5</sup> 李嬋，〈他國的苦難——華爾街日報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德費爾媒體呈現研究〉，《對外傳播》，第 5 期（2020 年），頁 70。

Face Mask)一文稱美國在醫療保健上的支出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但美國現在卻無法保護其公民免受冠狀病毒感染的必要設施。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據報告死亡人數不到 4,000；美國行政部門卻拒絕承認新冠威脅嚴重性而篩查卻十分緩慢。(Most obvious are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weekslong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severity of the threat, and the slow ramp up in testing.)<sup>6</sup>該報導承認了中國疫情的有效控制，並且正視美國的「失敗」。

## 2. 世界與經濟影響

作為美國經濟方面具有權威的媒體，《華爾街日報》著重圍繞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影響進行報。因為中美間近年來的經濟抗衡以及經濟指標對國家實力的影響力上，《華爾街日報》對於疫情下中國的經濟走向則是著重報導。在疫情初期，該報對中國經濟層面報導較為負面。形塑中國成為無益於世界經濟共同發展的負面形象：3月10日題為《中國麻煩壓縮公司利潤》(China woes Pressure Companies' Profits)一文稱，「此次疫情會重創中國經濟，美國在華企業還沒為此次經濟潰敗做好準備。」<sup>7</sup>這種報導方式看似是針對美國經濟體，但其實是希望塑造中國是造成美國及世界經濟放緩的源頭的且是造成跨國公司受到影響的「罪魁禍首」從而轉嫁美國國內經濟下滑矛盾。但實際上，中國在3月在國內開始復工復產，據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日前介紹，不僅中資企業，在華外資企業也在3月復工復產。截至3月30日，8756家重點外資企業中，66.9%的企業產能恢復率超過70%。241個在建外資大項目中，238個已復工，正加快建設。<sup>8</sup>

4月開始，報導呈現為中國GDP開始增長，經濟復甦，「有望超過美國」。8月24日報導《中國經濟正在反彈》明確表示，「中國成功遏制新冠疫情，生活恢復正常，並有助於縮小與競爭對手的經濟差距(Success in containing Covid-19 is bringing life back to normal and helping close the economic gap with a rival)。

<sup>6</sup> Nathaniel Taplin, "Why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Can't Get You a Face Mask"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he-richest-country-on-earth-cant-get-you-a-face-mask-11585741254>(April,1,2020)

<sup>7</sup> 李嬋，〈他國的苦難——華爾街日報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德費爾媒體呈現研究〉，頁71。

<sup>8</sup> 〈外企復工復產進程加速 近七成產能恢復率超過70%〉，人民日報海外版，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9/content\\_5500457.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9/content_5500457.htm)) (2020年4月9日)

」<sup>9</sup>在副標題用了「成功」(success)一詞，文中對中國經濟描述為「快速復」，「不斷增長」，對美國則認為是「不斷萎縮」。10月18日報導，《中國經濟增長4.9%，世界其他地區都在與冠狀病毒鬥爭》(China Economy Grows 4.9% as Rest of World Struggles With Coronavirus)，並承認了中國是2020年世界上唯一一個避免經濟萎縮的主要經濟體。

### (三) 英國廣播公司 (BBC)

BBC新聞報導相較於美國的兩家媒體對中報導呈現較中立態度，並因為中國從1月起允許外媒前往武漢拍攝，所以因其對實際情況更加了解，報導內容更為真實。BBC從1月22日起對新冠疫情進行報導。1月22日介紹了新冠疫情的現況，並特別指出，「此次與非典疫情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官方特別表示禁止任何形式的掩蓋疫情，而且中國從非典流行中吸取了「痛苦的教訓」，並呼籲公眾保持知情。」1月26日BBC記者進入武漢進行拍攝和採訪，客觀記錄武漢封城樣貌；拍攝了武漢人民的隔離生活；超市中的物資充足等場景。<sup>10</sup>不僅直接用畫面回擊了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隔離狀況的不實報導，並通過西方視角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現況，滿足了知情權。

BBC新聞在2020年12月28日製作時長近4分鐘的視頻，回顧中國在抗擊疫情的這一年中的舉動，視頻開頭說：「中國從恐懼走向自由，中國是如何狙擊疫情」(From fear to freedom, how china fought the virus?)，視頻客觀的呈現了中國在這一年中的抗疫舉動，並在結尾強調「現在的中國十分安寧。」(It makes all of us living in Wuhan feel peace)。<sup>11</sup>

BBC作為國際主流媒體，從1月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進行追蹤報導，並深入武漢拍攝報導，並肯定了中國的隔離政策以及抗疫努力。在非典爆發時，BBC每日頭條新聞也均以SARS為主，但報導態度較為負面。在2003年6月24日中國

<sup>9</sup> Jonathan Cheng, "China's Economy Is Bouncing Back—And Gaining Ground on the U.S.", *WSJ*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conomy-is-bouncing-backand-gaining-ground-on-the-u-s-11598280917?mod=article\\_inline](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conomy-is-bouncing-backand-gaining-ground-on-the-u-s-11598280917?mod=article_inline) (Aug. 24, 2020)

<sup>10</sup> "China coronavirus 'spreads before symptoms show'",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1254523> (Jan.26, 2020)

<sup>11</sup> Tessa Wong and Saira Asher, "Covid-19: China's Painful year fighting the voronavirus" *BBC*, <https://www.bbc.com/news/av/world-asia-55362462> (28 December 2020)

已經抑制非典傳播時，記者在新聞報導中並未正面評價中國抗擊非典的情況，而是寫道：「中國官員們在這過程中從否認逐漸轉變為勉強承認，中國信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sup>12</sup>兩次傳染病疫情，同一媒體報導態度卻截然不同，這體現出中國在兩次疫情應對上的進步，使得西方媒體對中國做法的態度及報導不同。二是此次疫情開始當下，中國政府便允許外媒進行採訪以及畫面的拍攝，也允許外媒發表看法，哪怕是負面的；在 BBC 影音報導中也呈現出中國 1 月醫院病人過多，病人需要長久等待，醫療物資緊張；藥店中口罩短缺等情況。雖然這些是對中國的批評，但這些真實呈現的平衡性報導，對於閱聽人於報導的接受度以及公信力提升，達更好的傳播效果。

## 二·非洲主流媒體

近年來中非關係較好，中國與非洲是緊密的夥伴關係，中國對非洲的貿易、援助以及經貿往來也越發頻繁。

新冠疫情下，中國更是對非洲大量的援助，疫苗的輸送以及債務的減免。非洲主流媒體如何呈現中國，看待中國的全球疫情治理值得研究。學者李洪峰以塞內加爾三家主流媒體進行「內容分析」，以小見大看非洲地區對中國此次新冠疫情下的報導取向。

從「議題設置」上看，「中國病毒論」「中國起源論」「中國脫責論」等多出現在國外主流媒體中的字眼並未進入塞內加爾三大報這一時期的報道。傳統媒體和主流媒體在議程設置方面往往比社交媒體具有更高的權威性，而塞內加爾三大報並未緊跟西方部分媒體和人士污名化中國的步伐，發揮了較好的輿論引導作用。另外，塞內加爾防疫措施和中國對非減債問題；擁有話語權的非洲人士對中國防疫措施肯定都是報導常見話語。<sup>13</sup>

報紙中也多出現對中的正向評論，如雄獅中間派黨團（Bloc des centristes Gaïndé）主席讓-保羅·迪亞斯（Jean-Paul Dias）在質疑現任政府防疫措施力度時提到，「中國政府是負責任的政府」，在報道中表示應學習中國應對措施，多次提到「應

<sup>12</sup> Jill McGivering, "China's Sars triumph", *BBC*,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3016214.stm>>(June.23 2003)

<sup>13</sup> 李洪峰、趙啟琛，〈新冠肺炎疫情時期非洲法語主流媒體涉華報道研究——以塞內加爾為例〉，對外傳播，第8期（2020年），頁74-76。

該以中國為榜樣」，要堅持「人類共同體」理念。<sup>14</sup> 在三家非洲主流媒體中，頻頻對中國對非的對外援助報導。3月26日，《太陽報》刊登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我們將為我們的作為和不作為付出代價》的報道，作者在文中發問：「馬雲向非洲捐助物資的時候，我們的富人都在幹什麼？」晨報中也寫道：「遙遠的中國都比近處的歐洲給塞內加爾送來了更多的援助，這時那個號稱非常強大的歐洲去哪了？」<sup>15</sup>非洲國家雖然在近幾年和中國關係越發緊密，但是歐洲在非洲殖民時間更長，影響力更深，所以歐洲的價值觀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地位近年來都是無法動搖的。而新冠疫情中的非洲媒體對中、歐不同的觀感也會影響其民眾，有利於中國在塞內加爾的國家形象提升，體現了中國「疫情外交」的成功。

所以塞爾維亞的報導可以看出一些受中國援助國家的態度。首先，報道文本極少傳播或複製西方污名化中國的言論，更多表現出以援助，減債等以非洲利益、本國利益為出發點的觀察視角。另外可以看出此次抗疫使中塞的關係更加緊密，通過共同抗疫謀求兩國的共同發展。主流媒體信息較為正面積極，但表述話語仍力持中立，說明非洲在全球治理格局的變更中還在審慎考慮自身與大國之間關係的調整。<sup>16</sup>但總體來說，非洲媒體報導折射出了非洲對中國抗疫的讚賞以及對中國未來國際角色的期待。

### 三· 西方媒體態度轉變：封城問題

1月23日，中國政府為了抑制新冠疫情的擴散，採取「封城」舉動。許多西方國家及媒體最初呈現不理解的態度，認為這種行為是對人權的侵犯，做法太過殘酷。中外自由主義人士紛紛站出來指責中國政府限制了個人自由，並對隔離有效性提出質疑。然而，隨著中國對疫情的控制，這種指責的聲音逐漸減少。直到3月中國因有效封城疫情得到控制，法國、義大利等國因為民眾外出而導致大面積傳播，疫情一度失控。至此，西方媒體逐步對中國此舉動改變其看法，開始讚揚「封城」手段的有效性，並在本國疫情失控時紛紛效仿，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歐美國家逐步宣布封城，並依照疫情發展延長封城時間。

---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李洪峰、趙啟琛，〈新冠肺炎疫情時期非洲法語主流媒體涉華報道研究——以塞內加爾為例〉，頁76-77。

<sup>16</sup> 同上，頁78。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積極探討中國封城與人權的關係：「封城的中國在4月確診人數已經降到各位，而在「自由」的美國，有2300萬人被感染，超過40萬人死於Covid-19併發症。」<sup>17</sup>在這次疫情中，西方學者及民眾也意識到自由主義是无法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困境的，在危難面前，個人自由應向集體利益讓步，否則將付出慘痛的代價。「捍衛公共利益，才能保障个人权利」的思想及「人類共同體」理念也因為中國抗擊疫情成效被西方逐步接受。

中國做法也受到西方學者的肯定，許多美國學者也將兩國進行對比。「國際與全球研究」專家烏雷茨基(Elanah Uretsky)2020年11月23日發表文章表示：「我生活在民主國家，隨著感恩節的臨近，我渴望中國那樣的自由。」她認為，此次新冠疫情下中國「封城」不是專制政策的結果，而是國家對健康的優先考慮。相反，她認為，「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公共衛生系統中的類似缺陷，而且政府不僅採取了完全相反的方法，還逐漸破壞公共衛生系統，減少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資金減少。」<sup>18</sup>西方學者通過新冠疫情中國的實踐逐漸改變對於人權的定義，從廣義上講，「對人民健康的剝離，才是對人權的藐視。」

## 第二節、其他國家和地區視角

通過中國的「疫情外交」援助，中國和他國官方政府交往頻繁且深入，也獲得很好的效果。學者陳先紅通過分析疫情期間國家領導人間的通話通信，對各國對中國抗擊疫情的評價進行分析。<sup>19</sup>

### 一· 官方政府對中國態度

各國對中態度資源統計(共833條)

<sup>17</sup> Yaqiu Wang, "China's Covid Success Story is Also a Human Rights Tragedy", *Human RightWatch*, <<https://www.hrw.org/news/2021/01/26/chinas-covid-success-story-also-human-rights-tragedy>>.

<sup>18</sup> Elanah Uretsky, <How China Is Containing the Coronavirus>,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20-11-23/china-contains-the-coronavirus-with-science-and-strong-public-health-measures> (Nov. 23, 2020)

<sup>19</sup> 陳先紅，〈世界各國對中國抗擊疫情的積極話語分析〉，對外傳播，第7期(2020年)，頁50-52。

		關鍵詞	
情感資源	合作與交流	合作、共同、團結、交流	232 條
	支持與幫助	支持、站在一起、幫助	52 條
	情感與態度	感謝、對中國有信心、對中國對全世界貢獻的讚賞、反對污名化。	189 條
判斷資源	價值觀、國家形象評價。	負責任大國、命運共同體、大國擔當、無私奉獻	22 條
鑑賞資源	疫情本身	挑戰、嚴峻、公共衛生	62 條
	對中國抗疫過程評價	及時、有力、努力、有效。	87 條
	對中抗疫成效評價	經驗、成效、成果、榜樣典範。	67 條

通過數據可以看出，「合作與交流」，「支持與幫助」是各國領導人與中國交流的常涉話題。這一方面傳遞出各國在疫情下與中國建立團結合作關係的期望，

保持長期密切交流的願景。<sup>20</sup>「合作與交流」成為主流，也證明共同抗擊疫情成為國家共識，反映出各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同。

國家官方的交流展現了各國對中國持有的積極情感和肯定態度，肯定中國在疫情暴發後採取措施的速度和效率，認為中國在危機面前展現出了及時且高效的應對能力；對於「中國經驗」認為應值得借鑑。而且在疫情下官方的積極態度的展現構建了一個有能力、肯擔當、負責任、可信賴的「中國形象」。

另外，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建構及「命運共同體」理念滲透已經獲得一定成效。伊朗外交部部長扎里夫在推特公開發文感謝中國的無私幫助，<sup>21</sup>埃塞俄比亞總理阿里（Abiyii Ahimad Alii）稱贊「中方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首位」，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認為中國是「負責任大國」，多國領導人認為中國充分展現「大國的擔當」。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英文、法文、德文三種語言發表視頻講話，對中國提供的支持表示高度讚賞和十分感謝。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Order of Liberty）表示，「中國作出了了不起的努力。聯合國堅定支持中國政府和人民採取的應對疫情舉措，希望所有國家本著團結合作精神攜手應對疫情。」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中國控制病毒源頭，為世界其他國家的防控工作爭取了寶貴時間。如果沒有中國努力，全球病例會遠高於此。世衛組織堅定支持中方為防控疫情作出的努力。」<sup>22</sup>

這些評價體現中國所建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在與多國的疫情外交中充分體現，也獲得他國的認同。從他國官方的反饋中都反映出中國在世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已有成效。

## 二·中日關係出現破冰

「公共衛生領域」常被看作是政治敏感度較低的「低級政治」領域。而新冠疫情下的「疫情外交」正是基於政治敏感度低的特點，在處理國與國關係問題上常

<sup>20</sup> 陳先紅，〈世界各國對中國抗擊疫情的積極話語分析〉，對外傳播，第7期（2020年），頁50-51。

<sup>21</sup> 〈王毅同伊朗外長扎里夫通電話〉，外交部官方網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hd/t1770259.shtml>>

<sup>22</sup> 外國政要積極評價和支持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外交部網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dbdfyyq\\_699171/t1743290.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dbdfyyq_699171/t1743290.shtml)>（2020年2月11日）



常發揮關鍵作用。眾所周知，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較為複雜，兩國關係因為歷史問題和領土主權爭端問題曾降至冰點。在疫情初期，日本社會也向中國施以援手。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離任後長期擔任「日中友好協會」會長，一直在為促進中日友好做積極貢獻。他得知中國疫情形勢複雜嚴峻，對中國表示關切，在家中面對中國媒體的視頻鏡頭喊出：「武漢加油！」。除了村山富市外，2020年2月，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表示，將從自民黨從每位自民黨籍國會議員3月份的年費中扣除5000日元，以幫助中國應對疫情。另外，中國也在疫情全球爆發開始，首先向日本提供實驗試劑盒的幫助，在華春瑩發送的中日互助推文中，獲得網友積極評論回覆，其中不乏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援助提出感謝。

### 三·歐洲態度不同

歐洲對中國的態度在時間以及國家上呈現不同。在中國剛陷入疫情危機時，歐洲對中國的態度較為負面，德國主流媒體《明鏡》在2020年2月發佈：「新型冠狀病毒：中國製造」的封面圖片，塑造出中國與病毒相聯繫的效果。而在歐洲疫情爆發而中國疫情向好時，歐洲對華態度趨於緩和，德國、法國等國家政府對中國抗疫成果給予肯定；而當中國加大對歐物資援助後，迫於民間壓力，歐洲各國也因擔心中國影響力上升對歐洲造成威脅，所以在對其立場表述上有一定修正。所以在中國3月底開展大規模對歐援助時，歐洲因預防中國在歐影響力提升以及為歐洲抗疫不利轉移民眾視角，開始對中國進行制度層面進行「政治化」批評。<sup>23</sup>

除時間上，不同國家呈現不同的對中態度。疫情較為嚴重、受中方援助支持較多的國家涉華輿論環境較好，疫情相對較輕、強調與中國「對等援助」的國家涉華輿論環境較差。意大利、西班牙與中國抗疫合作密切，中國政府向義大利三次

<sup>23</sup> 崔洪建，〈「敘事之爭」——疫情期間歐洲涉華輿論的變化及其特點〉，對外傳播，第6期（2020年），頁55。

派出救援團隊，所以政府和民間對中的好感較高，兩國政要還通過發佈視頻和接受採訪方式公開表達對中方援助的感謝和對雙邊關係的信心。

相反，在法國以及德國等意識形態和自身抗疫能力較強的國家，人民對於中國的批評色彩更濃，官方因為要考慮到民意所以其輿論模糊度較高，呈現官方與民間的意見不統一狀況。在區域差異上，西歐、北歐國家涉華輿論較為消極，南歐和中東歐國家官方輿論則總體保持了積極立場。<sup>24</sup>具體來說，歐洲涉華輿論的差異源於疫情期間與中方的互動的差異。如中國對義大利，西班牙，塞爾維亞「雪中送炭」的積極援助，被該國政和媒體宣傳。成為歐洲地區「中國形象」塑造的輿論導向，在民眾心中的中國的「國家形象」因此提升。

在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肆虐歐洲、個人防護用品極缺之際，德國作出禁止向歐盟候選國塞爾維亞出口醫療防護品的決定。作為塞爾維亞友邦，中國則向其援助大量醫療援助物資，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公開稱讚「中國是唯一幫助我們的國家」。<sup>25</sup>並用「患難見真情」來形容兩國友誼。在巴爾幹半島目前只有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為民眾接種疫苗。中歐的不同做法，使得塞爾維亞民眾對歐盟則越來越缺乏信心。根據《德國之聲》報導，中塞的友誼也獲得塞爾維亞民眾的肯定。2020 年 11 月的民調，16%的公民認為中國是塞爾維亞「最大的朋友」，但對俄羅斯的好感明顯更強，達 40%。<sup>26</sup>

意大利紅十字會會長弗朗切斯科·羅卡（Francesco Rocca）認為：「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團結」的真正含義；中國目前也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卻依舊幫助世界上許多國家。相較於一些國家政府阻止醫療物資出口，中國的行動確實是慷慨的。」<sup>27</sup>

<sup>24</sup> 崔洪建，〈「敘事之爭」——疫情期間歐洲涉華輿論的變化及其特點〉，頁 55。

<sup>25</sup> 〈一帶一路進入巴爾幹 歐盟關注家門口的中國影響力〉，BBC NEWS，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611457>〉（2021 年 1 月 12 日）

<sup>26</sup> Linda Vierecke, Nemanja Rujevic, 〈塞爾維亞：中國是最中意的合作伙伴〉，德國之聲中文網，  
〈<https://www.dw.com/zh/%E5%A1%9E%E5%B0%94%E7%BB%B4%E4%BA%9A%E4%B8%AD%E5%9B%BD%E6%9C%80%E4%B8%AD%E6%84%8F%E7%9A%84%E5%90%88%E4%BD%9C%E4%BC%99%E4%BC%B4/a-56654768>〉（2021 年 2 月 23 日）

<sup>27</sup>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主席：只有全球團結才能拯救世界〉，光明日報，  
〈[http://news.cnr.cn/native/gd/20200506/t20200506\\_525079798.shtml](http://news.cnr.cn/native/gd/20200506/t20200506_525079798.shtml)〉（2020 年 5 月 6 日）

另外，在疫情歐洲各國對中國的態度上，雙邊關係的基礎也是重要考量。對華輿論環境較好的歐洲國家大都參與了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合作，例如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為中東歐地區較好的涉華輿論環境打下了基礎。所以對於形象的建構講求持久性，並非一朝一夕可看到成效。對於意識形態差異較大的歐洲國家應加大互動的頻率以及時間長度，在未來對國家形象可能有更好的收穫。

德法的態度更多是對歐洲「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Fontelles）3月24日發表聲明，「中國正在積極宣傳一個與美國相對的負責任和可靠的夥伴的形象，歐盟必須意識到中國通過宣傳和「慷慨政治」爭取影響力的鬥爭。」<sup>28</sup>可以看出，中國在新冠上的做法已經受到歐盟的重視，基於歐洲利益考量而呈現出的不同態度實屬合理。然而在後疫情時代，歐洲的很多做法已經顯示出對中國實力的整體信任，以及不再「一邊倒」的站到美國陣營之中，而是尋找自己的發展之路。中國外交部長首次出訪則前往歐洲，於2020年8月25日起訪問歐洲五國，商談中歐未來發展；2020年底的「中歐貿易協議」的簽署則是很好的佐證。在行動上可以佐證中國是歐洲可信任的貿易夥伴。並且通過持續的貿易往來更多的外交接觸，中國在歐洲的全方位形象提升大有機會。

### 第三節、疫情後的國家形象民意調查

#### 一· 2021 最佳國家調查（BEST COUNTRY）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News&World Report）2021 全球綜合評價報告，最佳國家（Best country）榜單中，中國總排名為第17位（前5位為：加拿大、日本、德國、瑞士、澳大利亞）。<sup>29</sup>

<sup>28</sup> 〈美國和歐盟同意重啟中國問題雙邊對話〉，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eu-china-russia-0324-wedn-idCNKBS2BH04C>>(3月24日，)

<sup>29</sup> 最佳國家/地區於2016年首次推出，基於BAV諮詢公司前首席執行官John Gerzema和David Reibstein教授創建的國家品牌評估模型。調查了世界各地超過17000人，對78個國家及地區採用10大類76項指標進行評估，有10,068位是知情精英，有4,919位是商業決策者，有5,817位被認為是普通公眾。<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overall-rankings>, 2021.

不同於往年，經過了 2020 較特殊的一年，為了更好反映各國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的硬度措施以及國家實力，引入了兩個新的子等級：敏捷性（Agility）和社會目（social-purpose）。

### （一）敏捷性

2021 年，最佳國家(Best country)研究引入了一個新的指標——敏捷性(Agility)。敏捷性包含五個指標：適應性(adaptable)，動態性(dynamic)，現代性(modern)，進步性(progressive)和響應性(responsive)。在經歷了具有歷史意義的 2020 年裡，世界不僅見證了 COVID-19 大流行引起公共衛生危機和世界範圍內急劇的經濟衰退，這些事件都加劇了政治動蕩和能源危機帶來的壓力，被視為各國面臨的持續風險。所以不同國家在此次新冠疫情應對以及處理中展現出的不同能力、調控力度都反應在疫情的控制效果上，而這些對於一個國家的綜合能力而言是重要的指標。<sup>30</sup>

敏捷度排名中，中國排名第 13 位。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新加坡分列前五位，中國在此項指標中得分較高，也超過如挪威、比利時、義大利等歐洲發達國家。其中進步性(progressive)得分 83.3 分；響應性(responsive)得分 71.3 分；動態性得分 87.9 分(dynamic)。這三項子指標的較高得分反應了中國在此次新冠疫情應對上的及時以及有效管控、政府的快速反應及實施已經受到全世界的肯定。

### （二）社會目的指標(Social-Purpose)

社會目的指標(Social-Purpose)包含以下子指標：關心人權(whether they care about human rights)，關心環境(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性別平等(support gender equality)，宗教自由(religious freedom)，尊重財產權(respect property rights)，值得信賴(trustworthy)，分配良好政治權力(well-distributed political power)以及種族平等(racial equity)，關心動物權利(care about animal rights)，致力於氣候目標(committed to climate goals)，致力於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在此項指標中，加拿大排在首位，其次是丹麥、瑞典、荷蘭、挪威、芬蘭。歐洲國家在公共衛生保健，公共教育和社會安全長期處於國際領先地位。瑞典在發達

<sup>30</sup> Best-countries——Agility, U.S.News&World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gility-rankings>>, 2021.

的公共衛生保健和公共教育系統方面均排名第一。丹麥憑借完善的公共衛生保健系統排名第三，加拿大排名第四，而瑞士、荷蘭和挪威在兩項指標上均位居前十。英國排在第 14 位，美國排在第 19 位，僅次於日本。而中國在此項指標中表現較差，總得分為 2.3 分，總排名為 68 位，嚴重拉低中國的總排名。其中關心人權得分為 0.0；財產權為 0.3 分；關心環境得分為 1.4 分，宗教自由為 2.3 分，政治權利分配為 8.9 分。<sup>31</sup>中國在這項指標中得分較差，反應了中國一直以來人權、環境、人權問題上被世界所批評的問題，是中國在 2021 年亟待需要關注且解決的問題。

### （三）最有實力國家（POWER）指標

最有實力國家（Power）指標中，<sup>32</sup>中國在此項的總排名和 2020 年相比超過俄羅斯，居第二位。其中經濟影響力（Economically influential）得分為 100，出口能力（Has strong exports）為 100，政治影響力（Politically influential）為 95.9 分。這說明，中國在國際上的「硬實力」一直得到國際上的肯定。

除了「硬實力」，國家也會通過如食物、文化等方面向外形塑自己的「國家影響力」。以中國為例，其在新冠疫情上在醫療、援助等方面的國家影響力已經逐步顯現出來。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大國間則通過與他國家進行「疫情外交」、「疫苗外交」的比拼來提升「國際影響力」。在最佳國家（Best country）榜單中，「最具影響力國家」調查中，中國在「國際影響力」排名上位列第三名，前兩名分別為美國、英國；第四名為俄羅斯、五為德國、第六名為法國。<sup>33</sup>

### （四）前瞻性思維

前瞻性思維（Forward thinking）指的是國家預期變化的能力。疫情的突如其來擾亂了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考驗所有國家應對機制的建立。「前瞻性思維」方面，中國在此排名中排名第六位，前五位為南韓，新加坡，美國，日本，

<sup>31</sup> Best-countries—social-purpose, U.S.News&World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social-purpose-rankings,2021>.

<sup>32</sup> 國家實力指標包括：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出口能力、聯盟能力、強大的軍事、強大的國際聯盟五項指標。<<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china>。

<sup>33</sup> Best-countries—Most Influential Countries, U.S.News&World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most-influential-countries,2021>.

德國。在這項指標中，中國的排名較為靠前，說明中國在疫情中的及時應對以及疫情防控能力也被全球認可。

### （五）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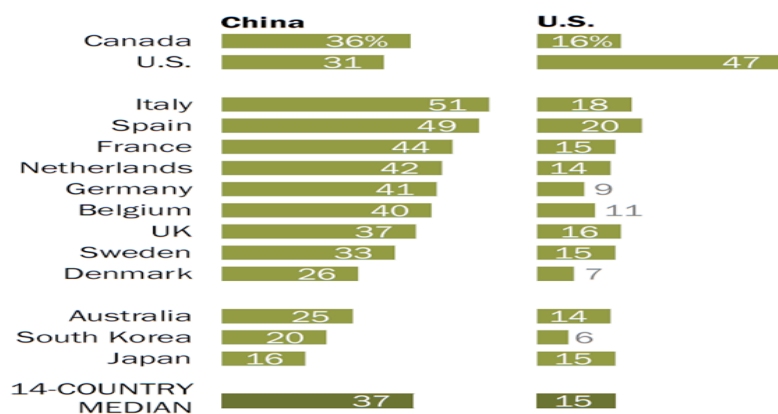
在「生活質量指標」中（Quality of life），中國在「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Well-developed public health system）子指標的得分為 19.4 分，<sup>34</sup>雖然相較發達國家還是有一定差距，但相較 2016 年中此指標僅獲 0.6 分相比，已經有顯著進步，這說明，隨著中國衛生領域的不斷投入，以及此次新冠疫情下，世界對於中國抗疫舉措以及對其他國家的醫療援助，對於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信心增加，並給予一定肯定，但中國還需要認識與西方國家的衛生系統的差距，進行彌補。

## 二·皮尤民調

### （一）抗疫成效看法

#### Few say the U.S. handled the pandemic well in countries surveyed

% who say \_\_\_ has done a **good** job deal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圖片來源：2020 年皮尤民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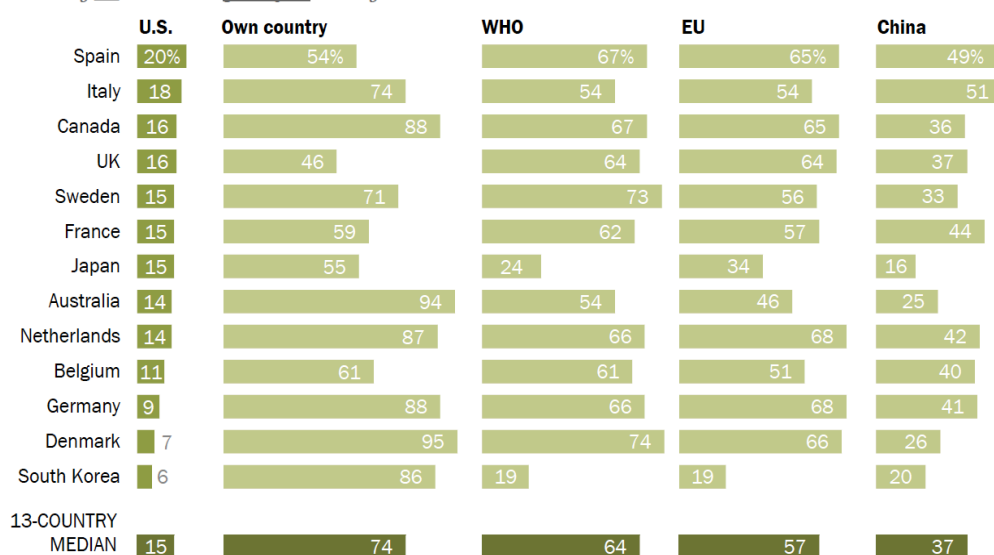
<sup>34</sup> Best-countries—quality of life, U.S.News&World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quality-of-life-rankings,2021>.

根據皮尤民調（Pew Research）調查，可以看出對於中美的抗疫成效上國家間的態度保持一致，除美國本土外，均認為中國的抗疫成效高於美國，而且此次疫情期間和中國外交互動較頻繁的義大利、西班牙兩國對中國的評價最好，與官方態度保持一致；法國、德國兩大歐洲領導大國民眾也認為中國的做法優於美國。

對中美抗疫態度上的一致性也體現在對中美兩國領導人的評價上，在大多數國家中，對習近平主席的信任程度高於對川普總統的信任。在墨西哥、土耳其對兩國領導人評價相差 40%，在歐洲德國、法國對習近平評價也高於美國。

### All publics surveyed rank the U.S. coronavirus response lowest

% who say \_\_\_ has done a **good job** deal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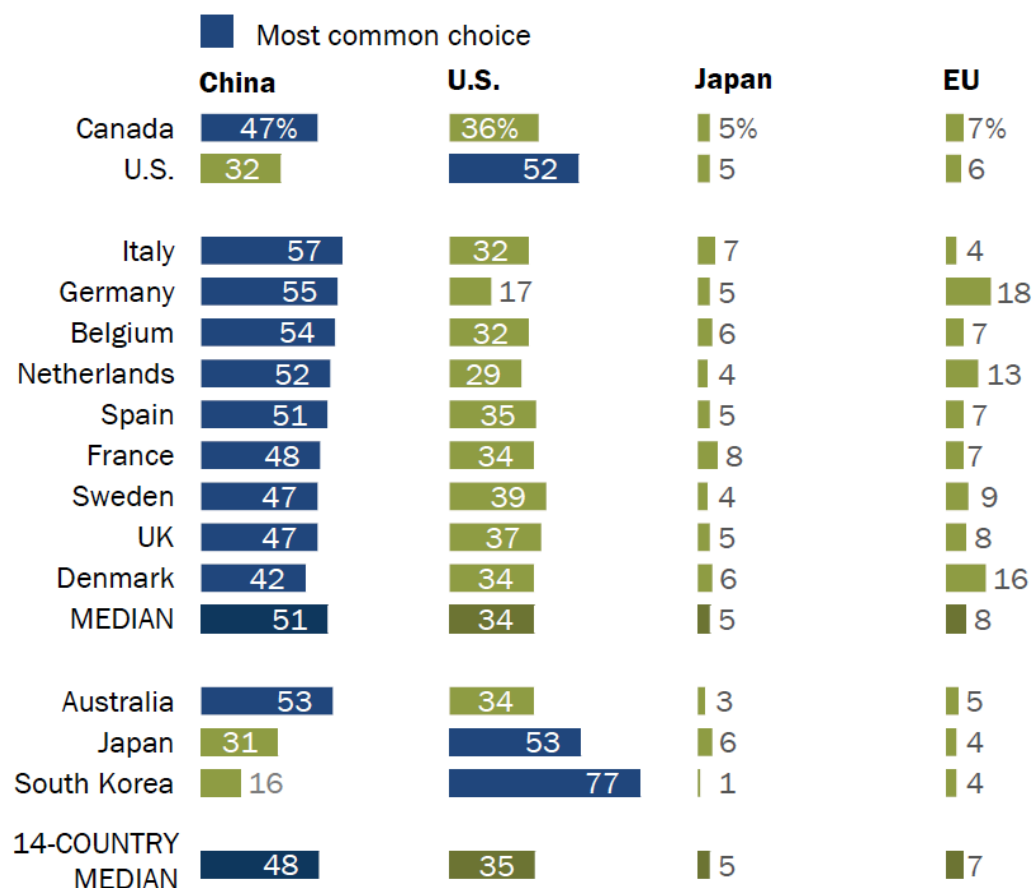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2020 年皮尤民調

而在本國、歐盟、世界衛生組織、中國以及美國的抗疫做法上的民調來看，各國家民眾均認為中國的做法優於美國，但普遍低於本國、歐盟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而西班牙及義大利對中的積極評價基本與歐盟和世界衛生組織持平。筆者認為，各發達國家均承認中國抗疫做法優於美國，但因為大部分都是歐盟國家，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對中印象基礎較差，所以態度偏見的存在正常，這也可以看出，「國家的形象」塑造是長期互動的結果，並非「疫情外交」就可一蹴而就。

(二) 經濟領導者

## Europeans see China as world's dominant economic power

% who say \_\_\_ i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圖片來源：2020 年皮尤民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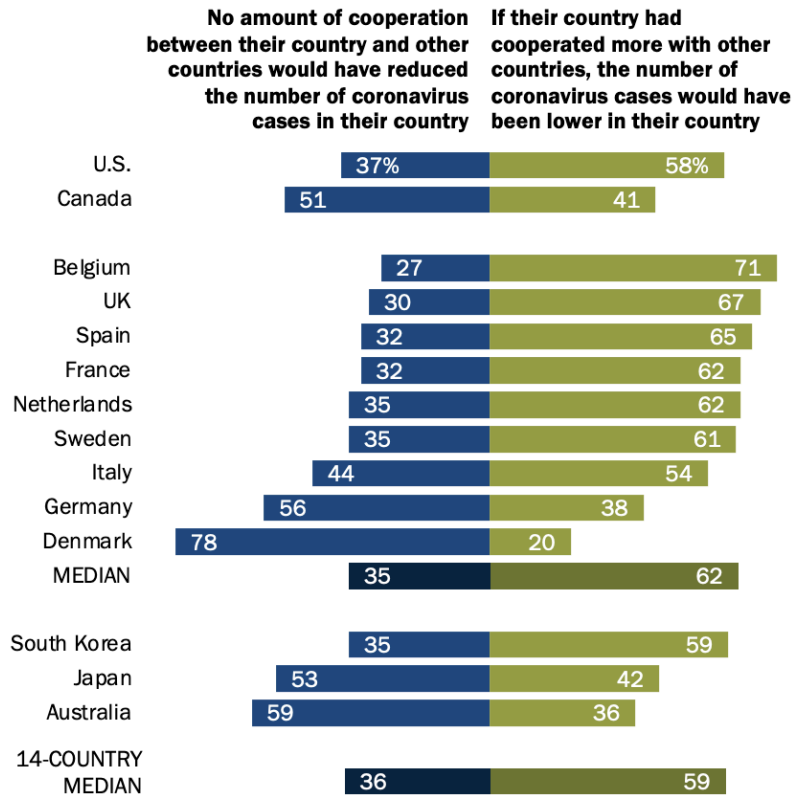
關於經濟實力的看法，中國在調查中表現相對較好。大多數接受調查的國家及地區民眾均認為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頂級經濟體」。在歐洲尤其如此，在接受調查的每個歐洲國家，都表示中國將是世界領先的經濟大國。



(三) 合作

### Prevailing view is that great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ould have reduced COVID-19's impact

% who say ...



Note: Those who did not answer are not shown. In Australia and Canada, question asked about "COVID-19." In Japan, asked about "novel coronavirus." In South Korea, asked about "Corona19."

Source: Summer 2020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Q4.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lcomed Across 14 Advanced Economies"

圖片來源：2020年皮尤民調

此項調查可以看出，大部分國家均認為抗擊疫情中，全球合作應成為「主旋律」。在疫情中，全球的人民都真正體會到「全球抗疫」的必要性，這是符合「命運共同體」理念。此結果顯示出未來的世界將是「多邊主義」的世界，中國推行的「命運共同體」理念也已經逐漸植入全世界人民心中，在打破西方固定霸權理念以及美國「單邊主義」上是一大推進。

#### (四) 美國的領導地位下降

##### In many countries, favorable views of U.S. are at 20-year lows

% who have a *favorable* view of the U.S.

	'00	Mar		May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9-'20 change
		%	%	%	%																		
Japan	77	72	-	-	-	63	61	50	59	66	<b>85</b>	72	69	66	68	72	57	67	68	<b>41</b>	<b>▼27</b>		
South Korea	58	52	-	<b>46</b>	-	-	58	70	78	79	-	-	78	82	<b>84</b>	-	75	80	77	59	<b>▼18</b>		
Italy	76	70	<b>34</b>	60	-	-	53	-	-	-	-	74	76	78	<b>83</b>	72	61	52	62	45	<b>▼17</b>		
Australia	-	-	-	59	-	-	-	46	-	-	-	-	-	<b>66</b>	-	63	60	48	54	50	<b>33</b>	<b>▼17</b>	
France	62	62	<b>31</b>	42	37	43	39	39	42	<b>75</b>	73	75	69	64	<b>75</b>	73	63	46	38	48	<b>31</b>	<b>▼17</b>	
UK	<b>83</b>	75	48	70	58	55	56	51	53	69	65	61	60	58	66	65	61	50	50	57	<b>41</b>	<b>▼16</b>	
Canada	-	<b>72</b>	-	63	-	59	-	55	-	68	-	-	-	64	-	68	65	43	39	51	<b>35</b>	<b>▼16</b>	
Netherlands	-	-	-	-	45	-	-	-	-	-	-	-	-	-	-	-	<b>65</b>	37	34	46	<b>30</b>	<b>▼16</b>	
Germany	<b>78</b>	60	<b>25</b>	45	38	42	37	30	31	64	63	62	52	53	51	50	57	35	30	39	26	<b>▼13</b>	
Spain	50	-	<b>14</b>	38	-	41	23	34	33	58	61	64	58	62	60	<b>65</b>	59	31	42	52	40	<b>▼12</b>	
Sweden	-	-	-	-	-	-	-	46	-	-	-	-	-	-	-	-	<b>69</b>	45	44	45	<b>33</b>	<b>▼12</b>	
Denmark	-	-	-	-	-	-	-	-	-	-	-	-	-	-	-	-	-	-	-	-	34	-	
Belgium	-	-	-	-	-	-	-	-	-	-	-	-	-	-	-	-	-	-	-	-	24	-	

Not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hown in **bold**. 2000 trend is from 1999 or 2000 and provid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 Italy, 2020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telephone; surveys were conducted face-to-face in 2002 and 2007-2019. Source: Summer 2020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Q8a. "U.S. Image Plummetts Internationally as Most Say Country Has Handled Coronavirus Badly"

圖片來源：2020 年皮尤民調

美國的「國家形象」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在皮尤民調中，對美國的好感度相較去年明顯下滑，下滑程度最高的則是美國盟友日本，下降幅度為 27%，可以看出美國在疫情中的不作為確實對其形象影響很大。《外交政策》雜誌對美國國內 982 位國際關係學者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高達國際關係學者認為美國在協調全球對這一大流行病的反應中的作用時幾乎一致否定。97% 的參與者並沒有把美國視為「領導者」，而是認為美國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很有效」或「根本沒有任何效果」。85.2% 的學者認為美國沒有履行國際承諾。<sup>35</sup>總的來看，美國此次未積極應對會對美國國際聲譽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導致對該國家國際領導力喪失以及外國政府及外國民眾對美國的信心下降。

<sup>35</sup> Emily Jackson, et. al., "Snap Poll: What Foreign Policy Experts Make of Trump's Coronavirus Respons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8/snap-poll-what-foreign-policy-experts-think-trump-coronavirus-response-election/>> (May 8, 2020)

## 第八章 結論

### 一．「自我建構」：對外外宣水平提升

中國長期以來對外宣傳效果都是中國整體宣傳的軟肋，而此次新冠疫情中的外宣方式有所提高。表現在渠道及外宣手法多樣化，以及「因地制宜」，更接近外國民眾。宣傳主體增多，政府、官方媒體、社群媒體、自媒體都是發聲渠道：國家政府進行信息及時發布；官方媒體海外平台進行媒體輿論引導；外交部利用推特與國外民眾更親近交流；在華外國人以及華人都利用自媒體向國外介紹中國情況。實現外宣傳從官方到非官方，從集體到個人做到全覆蓋宣傳。

宣傳方式上進行創新，通過視頻影片、動畫、書籍等形式用外國人「能聽懂，願意聽」的語言宣傳。宣傳態度上改變「貴人語遲」的問題，面對負面輿論第一時間回擊，避免輿論的發酵；並且找到適合不同平台「發聲」方式，杜絕以往外宣與內宣無分別，方式生硬問題。

面對國際話語權嚴重不均情況，中國很聰明的在重點問題上「炒熱點」，吸引西方主流媒體跟進報導，實現逆向「二次傳播」，從而借別人之口講好中國故事。

### 二．外宣對內「二次傳播」形成內宣

筆者認為，此次中國在對外進行外宣中，媒體也實現由外而內的「二次傳播」過程，將外宣事件轉為內宣的助力。如在推特上的發送推文、公開回應國外輿論行為、製作宣傳動畫等外宣行為都通過國內的社交媒體或新聞報導呈現給國內民眾，從而達到凝聚民心效果。此次可以看出，國內民眾對於國家直擊「污名化」或是推特發送推文等行為都大力稱讚，一定程度可以將疫情造成的國內不穩定情緒通過此種方式向外轉移達到國內消解。所以中國對外「自我形象」建構過程，很大程度也是基於國家內部戰略，讓國內民眾了解到中國的對外外交形式、對外輿論回擊從而增強民眾信心、穩固國家內部形象。

### 三．「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深化

此次中國的「自我建構」過程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核心，以樹立符合國際道德準則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為目標進行對外宣傳。筆者認為，

此次疫情是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深化的契機。全球因為共同抗擊疫情而對於此理念形成更強烈的共感和共同體悟，從而更有機會形成共識。所以此次疫情使得中國「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推行，動搖美國長期的「霸權」理論壓制，有機會在未來得到更多話語權以及認同。

#### 四·「疫情外交」：樹立符合國際制度的國際形象

筆者認為，此次中國在新冠疫情下的做法及發力重點，針對於長久以來西方對中負面輿論的主要「重災區」，目的是為塑造遵循國際制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打下基礎。

長期以來，中國被西方塑造為挑戰國際制度的「極權」國家，所以此次疫情中中國對內對外的行為都有針對性的回應在中國在衛生領域以及「非典」疫情中被西方批評的議題：如不與世衛組織合作、只注重經濟、瞞報數據；讓世界看到中國的改變；並且利用疫情的國際傳播重新解讀帶中國特色的「人權」以及「多邊互動」意涵。

#### 五·「他者建構」——雙邊多變多樣互動

此次中國的外交方式為「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通過和各國家及國際組織溝通、協作；從而增進其對中國的瞭解，並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雙邊外交」上，中國主要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國家元首之間的電話首腦會議；二是向各國提供醫療資源以及物資援助；三是和衛生領域最重要的世界衛生組織時刻匯報以及合作；從而實現從國家層次到民眾；國家間到國家與國際組織的溝通全覆蓋。「電話首腦會議」成為疫情特有的國家領導的交流方式；通話內容涉及面向廣泛，包括疫情、經濟、政治多個層面，不僅是首腦間交換意見也是增強他國對中信心的重要方式。中國政府及企業都在疫情爆發下通過向多國提供最及時的援助，包括派遣救援隊以及提供醫療物資。與世衛組織的互動分為三階段，疫情爆發期的及時匯報；疫情平穩期共同合作，幫助他國渡過難關；後疫情時期向世衛組織的資金投入以及支持。「多邊外交」中，中國集中參與區域性外交合作，多邊會議，力求擁有更多話語權及向世界各國展現中國責任感以及擔當。

## 六·「國家形象」——建構效果初見成效

中國通過對外宣傳的「自我建構」以及「多邊」及「雙邊」外交互動的「他者建構」從而樹立「負責任國家形象」的目的已初見成效。

針對對國外媒體分析，西方主流媒體《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對中看法初期態度較為負面，但隨著中國抗疫成效產生而呈現更多中立報導。英國廣播電視台對於中國「非典疫情」時期以及「新冠疫情」時期報導態度不同，筆者認為這得益於中國第一時間公布信息源、進行輿論引導、允許外媒採訪，使得西方媒體方向得以把控。另外，與中國關係較好非洲媒體未添加西方的報導偏向，而是主要以非洲利益為考量，整體對中報導較為積極正面。

從國家視角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國家對中態度不同。中國此次援助及互動較為積極的國家明顯對中態度較好，對中國的形象呈現較正面的肯定；而本身與中國存在意識形態差異的歐美國家因地緣政治及民眾壓力以及輿論導向原因，民眾對中態度改變不大，但在未來與中合作上比之前更為積極。第三，與中國在疫情前就存在交往的國家在疫情過程中對中態度好於其他國家。

可以看出，中國通過「疫情外交」確實拉近與一些國家之間的距離以及提升了本身的國家好感度，但對本身意識形態差距較大國家的效果不明顯，這說明，好的「國家形象」建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長期的互動過程。所以中國還需在疫情後持續國際合作及互動。目前，「疫情外交」已經形成一定程度的民意基礎，好的持續互動過程對於「國家形象」改變則更有幫助。

從「最佳國家調查」以及「皮尤民調」數據中可以看到，中國在此次疫情中表現出的及時調控以及積極應對在國際上是有目共睹的；其次，「疫情外交」的重要性也彰顯出來，作為擁有強勢話語權的美國也會因「疫情外交」不利爾受到猛烈衝擊，所以這也體現了在 21 世紀，衛生問題已經成為足以撼動國家形象及地位的根本問題。第三，民眾普遍認為中國在抗擊疫情各方面都優於美國，這可以顯示出中國國家形象相較於美國呈上升趨勢。但也可以看出，「疫情外交」效果並未體現於中國長期被西方批評的議題上，「衛生資源」、「人權」等問題的國際得分仍較低，未來還應該致力於在這些領域的外交投入。

## 七·「中國形象」建構未來方向

雖然此次美國因為在抗擊疫情的不利在國家形象上受到毀滅性打擊，但是因為美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基礎較好，而且隨著美國總統改選的完成，未來美國將會聚力於國家形象的塑造上以及在衛生領域的努力，所以未來衛生領域話語權搶奪將非常激烈。

中國在此次新冠疫情下的國家形象雖有所改變，但是「形象建構」是長期互動的過程，而且西方民眾對中國固有的意識形態改變較為困難。中國應借助此次在衛生領域「中國形象」有所改善之契機，加強與它國基於衛生等軟性議題上的持續溝通以及合作，加深國家間的友誼。另外，中國還需要開拓「衛生領域」話語權通道，在關鍵議題上及時發聲；並針對外國民眾關心的中國「衛生醫療」、人權等問題進行科普以及宣傳；持續國家政府、學者、菁英、民眾間互動。在自我宣傳方式上，仍需避免「個人崇拜主義」式宣傳方式；而是「因地制宜」做好國際宣傳，發掘熱點問題，利用西方主流媒體聲量實現逆向「二次傳播」，從而對外樹立可愛、可敬、可信的「中國形象」。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一、官方出版品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81801/1681801.htm>〉（2020年6月7日）。

「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769820.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769820.shtml)〉  
（2020年4月15日）。

〈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就美官方為《華爾街日報》發表辱華標題文章張目向美方提出交涉〉，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49761.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49761.shtml)〉（2020年2月26日。）

〈美國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外交部，2020年5月9日。

〈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實錄〉，外交部，2020年4月30日。

〈王毅：支持世衛組織，就能挽救更多生命〉，外交部，2020年4月28日。

#### 二、專書

安瑪麗·布蕾迪，《推銷中共：中宣部運作：讓黨繼續掌權》（明鏡出版社，2005）

李壽源，《國際關係與中國外交——大眾傳播的獨特風景線》（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

秦亞青，《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經典導讀》（北京大學出版社）。

秦亞青譯，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劉李勝，時永松，〈政治宣傳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郭鎮之等譯，沃納·賽佛林（Werner J. Severin）、小詹姆斯·坦卡德（James W. Tankard），  
《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用》（華夏出版社，1999年）。

鄭志國、何向東、楊德、唐建文譯，約瑟夫·奈伊（Joseph Samuel Nye, Jr.），《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麼美國不能獨斷專行》（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

晉繼勇譯，馬克·紮克（Mark W.Zacher）、塔尼亞·科菲（Tania J.Keefe），《因病相連：衛生治理與全球政治》（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三、 期刊

布賴恩·霍金等：〈外交的未來〉，《國際政治研究》，第4期（2012年），頁65-88。

程曼麗，〈「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對外傳播〉，《現代視聽》，第6期（2020年），頁14。

程曼麗，〈大眾傳播與國家形象塑造〉，《國際新聞界》，第3期（2007年），頁5-10。

程曼麗，〈談中國特色國際傳播理論體系的構建〉，《現代視聽》，12月（2020年），頁88。

程曼麗，〈論議題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第45卷第2期（2008年）。

陳先紅，〈世界各國對中國抗擊疫情的積極話語分析〉，《對外傳播》，第7期（2020年），頁49-52。

陳開和，〈試論政府國際公共關係〉，《國際廣告與跨文化傳播》，第4期（2006年），頁79-83。

崔洪建，〈「敘事之爭」？—疫情期間歐洲涉華輿論的變化及其特點〉，《對外傳播》，第6期（2020年），頁54-56。

蔡文軒，〈從 COVID-19（武漢肺炎）事件看中國大陸的治理〉，《展望與探索月刊》，18卷第3期（2020年），頁25-30。

傅新，〈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形象——兼對中國謀求發展的思考〉，《國際問題研究》，第4期（2004年），頁13-17。

董興杰，才華〈中共宣傳思想工作機構建設的歷史考察——以宣傳部系統為例。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CPC publicity institutions〉，《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12年），頁143-147。

盧業中，〈論國際關係理論之新自由制度主義〉，《問題與研究》，41卷第2期（2003年），頁43-67。

毛利，〈海外媒體涉華新冠肺炎報導的話語建構與建構分析〉，《中國記者》，第4期（2020年），頁82-86。

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第58期（1996年），頁85-111。



- 史安斌、童桐，〈全球危機與中國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公共外交季刊》，第3期（2020年），頁7-15。
- 李丹陽，〈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中國公共衛生外交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長江論壇》，第2期（2020年），頁12-17。
- 李安山，〈為中國正名：中國的非洲戰略與國家形象〉，《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8年），頁1-20。
- 李正國，〈國家形象構建：政治傳播及傳媒影響力〉，《現代傳播》，第1期（2006年），頁157-159。
- 李安娜，〈後真相時代主流媒體公共安全事件報導策略研究——以新冠肺炎報導為例〉，《新聞研究》，第11卷第18期（2020年），頁80-81。
- 李嬋，〈他國的苦難——華爾街日報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德費爾媒體呈現研究〉，《對外傳播》，第5期（2020年），頁69-72。
- 李洪峰、趙啟琛，〈新冠肺炎疫情時期非洲法語主流媒體涉華報道研究——以塞內加爾為例〉，《對外傳播》，頁74-78。
- 季乃禮，〈國家形象理論研究評述〉，《政治學研究》，第1期（2016），頁124-128。
- 郭小平，〈西方媒體對中國的環境形象建構——以《紐約時報》“氣候變化”風險報道(2000-2009)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卷（2010年），頁18-30。
- 夏倩芳、葉曉華，〈從失語到喧嘩：2003年2月～5月國內媒體“SARS危機”報道跟蹤〉，《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期（2003年），頁56-65。
- 晉繼勇，〈淺析公共衛生外交〉，《外交評論》，總第104期（2008年8月），頁82-88。
- 晉繼勇，〈全球衛生治理的「金德爾伯格陷阱」與中國的戰略應對〉，《國際展望》，第4期（2020年），頁42-59。
- 晉繼勇，〈美國全球衛生治理的戰略、實質及問題〉，《美國研究》，第1期（2011年），頁91-109。
- 晉繼勇，〈美國衛生外交：一種歷史與現實的考察〉，《太平洋學報》，第20卷第5期（2012年），頁27-34。
- 晉繼勇，〈美國全球衛生安全戰略及其對世界衛生安全體系的挑戰〉，《國際安全研究》，第38卷第3期（2020年6月），頁76-95。
- 晉繼勇，〈二十國集團與全球衛生治理〉，《國際問題研究》，第3期（2020年）。
- 秦亞青，〈外交轉型和全球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2期（2015年），頁11-32。

- 秦亞青，〈關係本位與過程建構：將中國理念植入國際關係理論〉，《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2009年），頁69-86。
- 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2006年），頁7-13。
-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歐洲》，第3期（2001年），頁4-11。
-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2006年），頁1-23。
- 秦亞青，〈關於構建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若干思考〉，《外交評論》，總第101期（2018年2月），頁9-17。
- 秦亞青、亞歷山大，〈建構主義的發展空間〉，《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期（2005年），頁8-12。
- 秦亞青，〈合作：命運共同體發展的鐵律〉，《國際問題研究》，第3期（2020年），頁27-32。
- 邱坤玄，〈台灣的中共外交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東亞研究》，第40卷第2期（2009年），頁3-22。
- 尚會鵬，〈關於國際政治「關係理論」的幾個問題：與秦亞青教授商榷〉，《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第2期（2017年），頁141-143。
- 石源華，〈後新冠疫情時代的中國外交課題〉，《世界知識》，第9期（2020年），頁72。
- 談東晨、鈕維敢，〈公共外交原理：基於建構主義視角的闡釋〉，《戰略決策研究》，第4期（2019年），頁65-104。
- 王昱、劉培龍，〈中國對外衛生援助的歷程、挑戰和對策〉，《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7年），頁94-106。
- 王勇，〈全面競爭與疫情交織背景下的中美輿論與溝通〉，《對外傳播》，第6期（2020年），頁4-7。
- 吳海雲，〈堅持與應變—英語媒體網站「第六聲」的抗疫報道〉，《對外傳播》，第5期（2020年），頁36-38。
- 約瑟夫·奈，〈從「軟實力」到「巧實力」〉，《南風窗》，第13期（2019年），頁3-16。
- 袁靖華，〈建設共同體話語：後疫情時代國際傳播的思維與路徑〉，《對外傳播》，第6期（2020年），頁57-60。
- 張生祥，〈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對策分析〉，《對外傳播》，第10期（2020年），頁17-19。

- 張清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重塑中國外交議程〉，《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2020年），頁84-106。
- 張清敏，〈新冠肺炎疫情與全球衛生外交〉，《當代世界》，（2020年4月），頁35-41。
- 張清敏，〈專題研究:全球衛生問題與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2期（2015年），頁9-10。
- 張清敏，〈援助外交〉，《國際論壇》，第9卷第6期（2007年11月），頁17-22。
- 張清敏，〈外交轉型與全球衛生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36卷第2期（2015年4月），頁11-32。
- 張清敏、任衛東、周方銀、劉建，〈當前外交策略:該“軟”?該“硬”?〉，《人民論壇》，第3期（2012年）。
- 張業亮，〈美國的全球衛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區域為例的國際政治分析〉，《美國研究》，第28卷第3期（2014年6月），頁9-38。
- 張業亮，〈加強全球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合作機制〉，《世界知識》，第4期（2020年），頁68-70。
- 張小明，〈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美國研究》，第19卷第1期（2005年），頁20-36。
- 張法，〈國家形象概論〉，《文藝爭鳴》，第7期（2008年），頁23-29。
- 張毓強，〈信息失序與溝通可能：疫情中的中國與世界自媒體景觀〉，《對外傳播》，2020年5月，頁53-56。
- 張毓強，〈變動不居與確定性追求：關於國家「形」與「象」的再討論上〉，《對外傳播》，第7期（2020年），頁64-67。
- 張毓強，〈變動不居與確定性追求：關於國家「形」與「象」的再討論下〉，《對外傳播》，第8期（2020年），頁58-61。
- 蔣華傑，〈中國援非醫療隊歷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議國際援助的效果與可持續性問題〉，《外交評論》，第4期（2015年），頁61-81。
- 羅艷華，〈試論“全球衛生外交”對中國的影響與挑戰〉，《國際政治研究》，第32卷第2期（2011年），頁45-61。
- 陳竺，〈中國衛生外交〉，《中國衛生人才》，第7期（2012年），頁23-34。
- 楊巧燕，〈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以《紐約時報》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5期（2020年9月），頁30-54。
- 梁爽、徐雪，〈中國負責任大國身份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影響——建構主義視角分析〉，《智富時代》，第2期（2017年），頁170-172。

- 劉嫦、任東升，〈對傳媒「自塑」和「他塑」國家形象的價值學思考〉，《天府新論》，第4期（2014年4月），頁130-133。
- 強月新，葉欣，〈西方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的轉變及其啓示〉，《湖北大學學報》，第40卷第2期（2013年3月），頁101-106。
- 湯光鴻，〈論國家形象〉，《國際問題研究》，第4期（2004年），頁18-23。
- 劉朝暉，〈抵制“政治病毒”，全球戰“疫”〉，《新民周刊》，第8期（2020年），頁8-12。
- 楊定都，黎黎，〈把故事講好——《病毒往事》動畫走紅海外社交媒體的啓示〉，《對外傳播》，第7期（2020年）。
- 劉文博，〈“戰疫”期間我國外交形象塑造的轉變傾向——以話語秩序理念為參照〉，《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第27卷第3期（2020年9月），頁35-39。
- 劉小燕，〈關於傳媒塑造國家形象的思考〉，《國際新聞界》，第2卷（2002年），頁61-66。
- 瀋正賦，〈突發公共事件的危機管理、輿情應對和共情傳播——基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檢視與思考〉，《對外傳播》，（2020年2月），頁42-45。
- 謝曉娟，〈論軟權力中的國家形象及其塑造〉，《理論前沿》，第19期（2004年），頁19-21。
- 徐彤武，〈全球衛生：國家實力、現實挑戰與中國發展戰略〉，《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2016年），頁9-40。
- 莊國平，〈國家形象與公眾外交：中共新國家形象建構之分析〉，《復興崗學報》，第92期（2008年），頁317-346。
- 周鑫宇，〈中國的“抗疫外交”：成效與啟示〉，《國際問題研究》，第5期（2020年），頁19-34。

#### 四、報紙

- 〈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7年12月2日）。
- 新華社記者，〈中國發佈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紀事〉，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06/c\\_1125819214.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06/c_1125819214.htm)>（2020年4月6日）

任佳暉、呂騰龍，〈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新華社，<<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0/0923/c64094-31871241.html>> (2020年9月23日)

〈第一觀察 | 「50+1」通電話，都和這件大事有關〉，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5/16/c\\_112599463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5/16/c_1125994633.htm)> (2020年5月11日)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主席：只有全球團結才能拯救世界〉，光明日報，<[http://news.cnr.cn/native/gd/20200506/t20200506\\_525079798.shtml](http://news.cnr.cn/native/gd/20200506/t20200506_525079798.shtml)> (2020年5月6日)

〈專訪：中塞是患難與共的真正朋友——訪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2/10/c\\_1127089007.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2/10/c_1127089007.htm)>(2021年2月10日)

〈社評：誰造謠誰舉證，請 BBC 拿出證據〉，環球時報，<<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1nUM0pR8X1>> (2021-02-04)

〈社評：誰造謠誰舉證，請 BBC 拿出證據〉，環球時報，<<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1nUM0pR8X1>> (2021-02-04)

〈抗疫的中國 VS 嘴炮的西方！一個瑞典小姐姐 po 了篇「考古」文，為中國抱不平，結果留言區爆了〉，新民晚報，<<https://wap.xinmin.cn/content/31705857.html?cantowap=yes>>(2020年4月9日)

## 五、網路資料

〈100 天疫情推特戰：從中國外交部推文解讀大外宣布局〉，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ccp-grand-external-propaganda-twitter>> (2020年4月29日)

張泳，〈習近平訪問官媒 呼籲增強國際話語權〉，BBC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2/160219\\_china\\_xi\\_media](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2/160219_china_xi_media)>(2016年2月19日)

〈守望相助，共同戰疫 中外聯合抗疫短視頻引關注〉，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20/0513/c14677-31707028.html>>(2020年5月13日)

〈做好宣傳思想工作，習近平提出要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8/0821/c164113-30242126.html>> (2018年8月21日)。

鄒宗翰，羅法，〈美列中國官媒為「外國使團」有什麼影響？〉，德國之聲中文網，

<<https://www.dw.com/zh/%E7%BE%8E%E5%88%97%E4%B8%AD%E5%9B%BD%E5%AE%98%E5%AA%92%E4%B8%BA%E5%A4%96%E5%9B%BD%E4%BD%BF%E5%9B%A2-%E6%9C%89%E4%BB%80%E4%B9%88%E5%BD%B1%E5%93%8D/a-52427282>> (2020 年 2 月 19 日)

〈美國和歐盟同意重啓中國問題雙邊對話〉，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eu-china-russia-0324-wedn-idCNKBS2BH04C>> (2020 年 3 月 24 日)

〈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5/c\\_1125578886.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5/c_1125578886.htm)>  
(2020 年 2 月 15 日)

〈世衛組織總幹事關於《國際衛生條例》新型冠狀病毒應急委員會的聲明 (2019-nCoV) 〉，經濟觀察網，<<http://m.eeo.com.cn/2020/0131/375273.shtml>>  
2020 年 1 月 31 日。

李思，〈世衛組織總幹事關於《國際衛生條例》新型冠狀病毒應急委員會的聲明 (2019-nCoV) 〉，經濟觀察網，<<http://m.eeo.com.cn/2020/0131/375273.shtml>>  
(2020 年 1 月 31 日)。

「Sars 爆發後的相關事件表」，國際厚生健康園區，<<http://cn.24drs.com/sars/2-5.asp>>.

〈世界衛生組織應對疫情時間線〉，世界衛生組織，  
<<https://www.who.int/zh/news/item/29-06-2020-covidtimeline>> (2020 年 9 月)。

〈馬曉偉：深化抗擊疫情國際合作 共筑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0/0417/c64102-31677502.html>> (2020 年 4 月 17 日)

〈抗疫與外宣：中國外交官叫板西方媒體〉，德國之聲，<<https://is.gd/cF3zy1>>(2020 年 4 月 17 日)

〈外企復工復產進程加速 近七成產能恢復率超過 70%〉，人民日報海外版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9/content\\_5500457.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9/content_5500457.htm)> (2020 年 4 月 9 日)

〈美國吹噓對外援助成績遭打臉〉，新浪新聞，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614/35463402.html>> (2020 年 6 月 14 日)

陳冰，〈守望相助，中國的救援、分享和回贈〉，新民週刊，  
<<https://m.xinminweekly.com.cn/content/13975.html>> (2020 年 4 月 1 日)

〈多文版圖書《大國戰「疫」》近期出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http://www.scio.gov.cn/37236/1/Document/1674142/1674142.htm>> (2020 年 2 月 26 日)

趙成、杜一菲、楊迅，〈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人民網，

<<http://dangjian.people.com.cn/BIG5/n1/2017/1204/c117092-29683581.html>> (2017年12月4日)

〈《大國戰「疫」》近期出版〉，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26/c\\_1125627516.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26/c_1125627516.htm)> (2020年2月26日)

〈中國外交官的2019推特「元年」，行文風格酷似特朗普〉，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734343>> (2019年12月27日)

〈中美外交發言人推特對戰！華春瑩連發三推：謊言與誹謗不能讓美國變得偉大！〉，環球網，<<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xWYHuvIze5>> (2020年3月22日)

〈英國通訊管理局 Ofcom 吊銷 CGTN 牌照 中方反應強烈〉，BBC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946384>>(2021年2月5日)

〈德媒爆川普搶購武漢肺炎疫苗專利 美官員批報導誇大〉，法新社，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9e6jrE>>(2020年3月16日)。

〈美國 COVID-19 疫情每日統計圖〉，NCHC，  
[https://covid-19.nchc.org.tw/dt\\_002-csse\\_covid\\_19\\_daily\\_reports\\_city\\_unique\\_mycountry.php?countryCode=US/%E7%BE%8E%E5%9C%8B](https://covid-19.nchc.org.tw/dt_002-csse_covid_19_daily_reports_city_unique_mycountry.php?countryCode=US/%E7%BE%8E%E5%9C%8B)

## 英文文獻

### 一、官方出版品

Coronaviru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oronavirus#tab=tab\\_1](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oronavirus#tab=tab_1)>

Diamond, Larry.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Hoover Institution, 2018.

Infodem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infodemic#tab=tab\\_1](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infodemic#tab=tab_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bout the office of Global Healthy Diplomacy>,  
<<https://www.state.gov/policy-issues/global-health/>> , Jan 9, 2016.

### 二、專書

Carr, E.H.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4.

- Kelman, Ilan. *Disaster Diplomacy: How Disasters Affect Peace and Conflict*.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 Nye, Joseph S.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三、 期刊

- Hotez, P. J. “Vaccine as Instruments of Foreign Policy.” *EMBO Reports*, Vol. 2, No. 10 (2001) , pp. 862-868.
- Hotez, P. J. “Vaccine Diplomac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LOS Negl Trop Dis*, Vol. 8, No. 6 (June 26, 2014), pp. 1-7.
- Kelman, Ilan. “Pandemic Diplomacy: Peace in our Time?”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s*, Vol. 1 (Dec 3, 2020), pp. 1-7.
- Kelman, Ilan. “Catastrophe and Conflict: Disaster Diplomacy and Its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Vol. 1, No. 1 (2016), pp. 1-76.
- Lee, Kelly and Richard Smith. “What is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 Conceptual Review.”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2011), pp.1-24.
- Lee, Kelley, Harley Feldbaum, and Joshua Michaud. “Global Health and Foreign Policy.” *Epidemiologic Reviews*, Vol. 32 (2010), pp. 82-88.
- Roy, Denny. “China’s Pandemic Diplomacy.” *East-West Center*, June 2021, pp.1-8.
- Soula, E., Luetge, F., Ladner, M., and Reuter, M. “Masks Off: Chinese Coronavirus Assistance in Europ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No.9(2021), pp.1-11.
- Shambaugh, David.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No.57(Jan 2007), pp. 26-58.
- Shambaugh, David.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Vol.57(2007), pp.25-58.
- Tsai , Wen-Hsuan. “Enabling China’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World : Idea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ternal Propaganda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64(2017), pp. 203-213.
- Wendt, Alexander.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Vol. 41(1987), pp. 335-370.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2): 391-425.



Xue, K., Deng, Y., and Wang, S. “What factors influence national image in disaster re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 *Quality and Quantity*, Vol. 49, Iss. 3 (May 2015), pp.1257-1265.

#### 四、 報紙

“Announced donations to combat Coronavirus from tech giants in China”,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06335/china-covid-19-tech-companies>> (Aug 24, 2020)

Bradsher, Keith. “Coronavirus Seemingly Tamed, Chinese Economy Starts to Recover”, *The New Yorks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5/business/china-economy-coronaviru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 May 15, 2020).

Cheng , Jonathan . “ China’s Economy Is Bouncing Back—And Gaining Ground on the U.S”, *WSJ*,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conomy-is-bouncing-backand-gaining-ground-on-the-u-s-11598280917?mod=article\\_inline](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conomy-is-bouncing-backand-gaining-ground-on-the-u-s-11598280917?mod=article_inline) >(Aug. 24, 2020)

Conger, Kate and Isaac, Mike. “Twitter Permanently Bans Trump, Capping Online Revolt”, *The New Yorks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08/technology/twitter-trump-suspended.html?\\_ga=2.25878783.318546261.1619874555-870196791.1619410615](https://www.nytimes.com/2021/01/08/technology/twitter-trump-suspended.html?_ga=2.25878783.318546261.1619874555-870196791.1619410615)>(Jan 8, 2021).

Cumulative Cases By Days Since 50th Confirmed Ca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edecin, < <https://coronavirus.jhu.edu/data/cumulative-cases>>

Erlanger, Steven. “Another Virus Victim: The U.S. as a Global Leader in a Time of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0/world/europe/trump-leadership-coronavirus-united-states.html>>(March 20, 2020)

“China coronavirus 'spreads before symptoms show.’”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1254523>> (Jan.26, 2020)

Garrett, Laurie. “Trump is in a Coma on Public Health,” *Foreign Policy*, May 21,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21/trump-is-in-a-coma-on-public-health/>>.

Garrett, Laurie. “Ebola is Back. And Trump is Trying to Kill Funding for It ”, *Foreign Policy*, May 9,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09/ebola-is-back-and-trump-is-trying-to-kill-funding-for-it/>>.

Gramer, Robbie and Lynch, Colum . “Trump Seeks to Halve U.S. Funding fo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Coronavirus Rages,” *Foreign Policy*, Feb 10,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2/10/trump-world-health-organization-funding-coronavirus-state-department-usaid-budget-cuts/>>

- Gladstone, Rick. "Coronavirus Outbreak Risks Reviving Stigma for China", *The New Yorks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0/world/asia/china-epidemics-coronaviru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Feb.10, 2020).
- Garrett, Laurie. "Trump is in a Coma on Public Health."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21/trump-is-in-a-coma-on-public-health/>>(May 21, 2018).
- Hohmann, James. "The Daily 202: As 2,798 Americans die, Trump's 'most important speech' makes only passing reference to pandemic", *Washingtonpost*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The Daily 202: As 2,798 Americans die, Trump's 'most important speech' makes only passing reference to pandemic>>(Dec 4, 2020)
- Paul Mozur. <Live From America's Capital, a TV Station Run by China's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Times*,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301/cctv-china-usa-propaganda/zh-hant/>(Feb. 28, 2019)
- Qiu, Linda. "Analyzing the Patterns in Trump's Falsehoods About Coronavirus", *The New Yorks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7/us/politics/trump-coronavirus-factcheck.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March 27, 2020).
- Jackson, Emily. "Snap Poll: What Foreign Policy Experts Make of Trump's Coronavirus Respons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8/snap-poll-what-foreign-policy-experts-think-trump-coronavirus-response-election/>>(May. 8, 2020)
- Jill McGivering, "China's Sars triumph." *BBC*,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3016214.stm>>(2003,June.23)
- Jacobs, Andrew. "Rescuers struggle to reach China quake victims", *The New Yorks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8/05/15/world/asia/15ihtquake.2.12917472.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 (May 15,2008).
- Taplin, Nathaniel. "Why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Can't Get You a Face Mask", *WSJ* ,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he-richest-country-on-earth-cant-get-you-a-face-mask-11585741254?page=1>>(April 1,2020).
- Rabin, R.C."First Patient With Wuhan Coronavirus Is Identified in the U.S", *The New Yorks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21/health/cdc-coronaviru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Jan.21,2020).
- Taplin, Nathaniel. "Why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Can't Get You a Face Mask", *WSJ*,<<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he-richest-country-on-earth-cant-get-you-a-face-mask-11585741254>>(April,1,2020)

Wong, Tessa and Saira Asher, “Covid-19: China's painful year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BBC, <<https://www.bbc.com/news/av/world-asia-55362462>> (Dec.28, 2020)

Mead, Walter Russell.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WSJ*,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Feb 2,2020).

Zhong, Raymond and Paul Mozur, Jeff Kao, Aaron Krolik. “No ‘Negative’ News: How China Censored the Coronavirus.” *The New Yorks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19/technology/china-coronavirus-censorship.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Dec. 19, 2020).

## 五、 網路資料

McGivering, Jill. “China's Sars triumph”, BBC,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3016214.stm>>(June.23 2003)

Silver, Laura and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Negative views of both U.S. and China abound across advanced economies amid COVID-19.” Pew Research Centr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0/06/negative-views-of-both-us-and-china-amid-covid-19/>>(DEC 18, 2020).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rofit 2020—United Kingdom, oecd-ilibrary. ”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ff4da321-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5e331623-en&\\_csp\\_=b14d4f60505d057b456dd1730d8fcea3&itemI GO=oecd&itemContentType=chapter#section-d1e41484](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ff4da321-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5e331623-en&_csp_=b14d4f60505d057b456dd1730d8fcea3&itemI GO=oecd&itemContentType=chapter#section-d1e4148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 September 19, 2017) .

Wong ,Tessa and Asher,Saira. “Covid-19: China’s Painful year fighting the voronavirus”, BBC, <<https://www.bbc.com/news/av/world-asia-55362462>> (28 December 2020)